

Almond Flowers 2012, Vol. 3

二〇一二年第三期 总第二十一期

冬季号



杏花

基督信仰对世俗化文化趋向的反省
基督教救国情结对教会观的影响
中国人的坐标系



有人声从西珥呼问我说：
“守望的啊，夜里如何？
守望的啊，夜里如何？”
守望的说：
“早晨将到，黑夜也来。
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
可以回头再来。”

赛 21:11—12



卷首语

主耶稣把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要爱邻人如己这两条诫命，看作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40）并且，当人问起爱邻人这条诫命中，谁是我的邻人时，耶稣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 11：25—37）说明了邻人不只是教会中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包括在这个社会中神让我们遇到的凡需要帮助的人。爱邻人如己的诫命与传福音到地极的使命两者都是教会从基督那里领受的命令，因此都是教会当承担的责任。虽然两者是不能分离的，但爱我们周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不只是传福音给他们的工具，或仅仅是一个途径；不，从基督里出来的爱本身就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教会承担的使命及其责任不当缩减为只剩传福音给万民这一个方面。

如果爱邻人也是教会的责任，那么教会就有其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当我们说教会有其社会关怀或责任时，我们并不是非常字面地将某种“社会”或“体制”或“国家”当作这种关怀的对象。圣经中只教导我们爱身边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种抽象的群体或非人格化的制度。因此对社会的责任是基督徒通过爱自己的邻人而传递出来的，并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由这些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所构成的社会，无论是其潜规则、政策体制还是文化习俗。当教会鼓励那些在职场中的信徒要诚实、不以欺诈的手段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时，就是在对抗这个社会流行的某些潜规则；当教会鼓励弟兄姊妹去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缺衣少食的人的时候，就可能触及到这个社会的救助甚至是信访的体制；当教会明确反对那些再次怀孕的妇女去医院堕胎时，就会与这个国家当下的计生政策产生冲突；当一些信徒的家庭不让他们的孩子参加少先队的作法得到教会的肯定时，教会就是在支持这些家庭拒绝政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行渗透到青少年教育中；当教会明确地反对婚前同居时，就是在拒绝当下的某种流行文化；……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教会的社会责任虽然不一定是直接提交一份要求改变当下计生政策的议案，但明确地反对堕胎，并以从基督来的爱去关怀教会内外每一个因再次怀孕而陷入到困境中的家庭，却不能不是教会的责任。上面教会鼓励信徒所作的，也是要他们作为榜样影响和鼓励身边的邻人去作的。如果在这个道德不断失去其底线的社会，教会想要鼓励自己的信徒活出符合圣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出于从基督而来的爱用这真理去影响身边的人，那么教会就不当害怕而是要肯定这种生活方式对社会的某些潜规则、政策体制及文化习俗所表达的态度及其影响。

本期主题是“教会与社会文化”，虽然这个题目有点大，但它却是教会今天生活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所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盼望本期的文章及见证能够关注这个问题的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带来启发与帮助。■

目录

教会与社会

- 3 ▶ 基督信仰对世俗化文化趋向的反省/陈宗清
- 9 ▶ 宣教从基础开始/刘同芬
- 12 ▶ 没有信仰便没有底线/张坦
- 17 ▶ 基督徒的饶恕与社会正义/天明
- 24 ▶ 北京家庭教会的身份坐标：守望教会个案部分/邓颖翹
- 34 ▶ 基督教救国情结对教会观的影响/孙毅

灵性操练

- 41 ▶ 基督徒与争战/杰拉德·思策 (Gerald L. Sittser) 著 汪咏梅译
- 43 ▶ 灵修心得分享辑录之一

敬虔生活

- 47 ▶ 一家人的福音之旅/阿淘妈妈
- 54 ▶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基督徒儿子写给父母的信/钟林
- 56 ▶ 关于加入少先队的讨论/Hilary Zhang
- 60 ▶ 他爱我，我深知道——婚礼感恩见证/牧马人
- 70 ▶ 从神来的爱与恩典是我们服侍的动力/小雪

读书沙龙

- 74 ▶ 爱德华兹对中国教会的意义/新恩
- 76 ▶ 难以看透的千面鲁迅——读《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阿信

文化透视

- 79 ▶ 这个世界没好过——虚拟采访鲁迅先生 / 潘采夫
- 84 ▶ 中国人的坐标系/许宏
- 92 ▶ 《一九四二》中的中国饥荒史 / 杜君立

艺术广角

- 96 ▶ 在井边 (之二) / 书拉密
- 103 ▶ 幸福的战士——写给守望者/张鹤



编辑

《杏花》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一月出版

本刊浏览及下载网址：

<http://www.xhjournal.com/>

投稿邮箱

xinghua2007@gmail.com

内部刊物
免费赠阅

基督信仰对世俗化文化趋向的反省

文 / 陈宗清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世俗化是没法避免的趋势。环视四周，许多人在思想领域中寻求更大的自由，尽力远离传统的信条。近代欧洲历史中，不少战争与冲突都和宗教有关。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教会排拒在政治圈之外，甚至逐渐被孤立。

20世纪人文主义在美国日渐抬头，进而对基督教大肆批判，以致原本受基督信仰熏陶的地区，逐渐变成多元文化汇集的所在。如今，美国主流思想早已告别保守的传统信仰，被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所驾驭。奥巴马总统2009年4月8日在土耳其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

薛华（Francis Schaeffer）早在四十多年前就痛心地指出，西方到了20世纪中叶，已完全放弃基督教对“真理”的看法，而这正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传统认为真理是绝对的，这是建立在圣经的预设上。可是大约在1890年，欧洲的观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真理不再是“绝对的”。在美国，这情形延后45年发生。大体而言，1935年之后，西方世界对真理采取相对化的思维，基督教信仰被边缘化，薛华把它视为“绝望之线”（the line of despair）。¹ 东方文化向来是由非基督教或民间信仰主宰，但由于全球化的浪潮，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使愈来愈多东方人的思维与生活形态不具任何宗教特征。

一、世俗化趋向的几方面表现

世俗化的倾向使福音的传扬遇到重大的阻力，让教会的成长面临困境。过去三十年来，抵挡基督信仰的普罗大众文化思想，最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 后现代主义的横行

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 (Jean Francois Lyotard) 这些大师们对传统宗教的批判, 不论是宗教权力说、解构主义、或是否定“宏观叙事”等看法, 都让人对基督教持怀疑的态度。不仅如此, 后现代主义认为, 人根本没法知道客观真理的存在, 更不用说是掌握这些永恒不变的真理, 结果人只能在虚无中度日, 在混沌中揣摩人生的不确定性。

2. 宗教多元主义的诱惑

20 世纪下半叶, 洲际之间的移民相当普遍, 大都市中不同宗教的信众充斥。既然种族文化各具特色, 无法比较优劣, 有人便主张所有宗教各有所长, 都是鼓励人寻求真善美。希克 (John Hick) 与奈特 (Paul Knitter) 是宗教多元主义最负盛名的倡导者, 他们以为, 每种宗教或传统只掌握部分真理, 无法洞悉一切真理的实貌。

3. 世俗主义的高涨

世俗主义和世俗化有所区别。前者是相对主义和进化的乐观主义所揉和的各种现代自然主义, 而后者只是描述现象, 并未给予评价。世俗主义必然驱使人远离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卡森 (D. A. Carson) 一针见血地指出, 事实上, 世俗主义本身已形同一种宗教, 强烈拥护它自己所主张的“终极之善”, 标榜它的信仰系统, 也建立了它的伦理规范。²

4. 新无神论的崛起

新无神论是由美国《联机杂志》(Wired) 在 2006 年倡导而流行的。³ 从 2004 年至 2008

年, 有六本相关的书在西方大为畅销, 由五位作者所撰: 哈里斯 (Sam Harris)、邓耐特 (Daniel Dennett)、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司丹格 (Victor J. Stenger) 和希金斯 (Christopher Hitchens)。他们的主要论点为, 当今科学的证据已不容许任何宗教的存在, 且历史上太多事件说明宗教对人类的危害。他们批判的对象针对基督教, 冲击了不少知识分子。

二、基督信仰面对世俗化的反省

面对以上世俗化的文化潮流, 本文尝试整理出过去二十年来西方基督教内的反省, 说明从中衍生出的教会发展及宣教的理念, 使基督的福音能继续在罪恶横行、异教丛生的世代中发光, 引领人得着永恒的生命。

首先要澄清, 神和基督是不会有困境的。主耶稣宣称: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太 16:18) 保罗说: “然而, 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提后 2:9) 无论世界文化氛围如何改变, 基督的福音总能在险峻的环境中得胜。面对来势汹汹的世俗文化, 以下五方面宣教反思很值得华人教会参考。

1、以基督为中心的宣教模式 取代以教会或传统为中心的模式

富勒神学院的教授范恩肯 (Charles Van Engen) 在 1996 年出版的《宣教在前进》(Mission on the Way) 中提到宣教的四种范式, 第一种是多元主义所主张的“创造范式”, 这一模式为宗教多元主义者所赞同, 强调没有任何宗教可以独占绝对真理。第二种是包容主义所倡导的“普世救恩论范式”, 主张在异

教中也可以找到救恩，不过所有人最终都是因基督而得救。第三种是排他主义所主张的“教会中心范式”，常把建制性的教会视为人得救的范畴。第四种则是以传福音为主的“基督中心范式”。⁴

范肯恩认为，今天我们必须肯定第四种宣教范式，许可文化上的多元，对不同教会传统采取包容的态度，但必须高举基督的独一性。换言之，我们不应把自己宗派的体制、形式或教义绝对化。这模式对文化某些内涵持正面肯定，但也洞悉其中因罪而来的负面影响；它要让一切文化和宗教都尊“基督为主”，因他是唯一使人得救的道路。这模式可以有效地开启与其他宗教对话的管道，让基督徒明白圣灵在所有文化和宗教中的作为。

2、发展宣教型的教会——以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为范例

“宣教型的教会”（missional church）是指，当教会处于异文化或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整个教会事工的思考、设计和安排当以如何有效赢得周遭的人归向基督为导向。1998年哥伦比亚神学院的库德教授（Darrell L. Guder）主编《宣教型教会》一书，探讨北美教会所面对的宣教挑战，如今相关的讨论在许多基督徒群体中正热络展开。

盖乐德（Craig Van Gelder）和芝薛理（Dwight J. Zscheile）认为，“宣教型的教会”必须把握以下四个概念：⁵

1）神是一位宣教的神，他差教会进入世界。这观念将差派的单位由教会转为神。神的使命致使他有了教会；而不是教会有个使命。

2）神在世上的使命与神的国度有关。这观念意指神在世界上的工作比教会的使命更

大，不过教会乃是直接参与在神的国度中。

3）宣教型教会是道成肉身式（与吸引式成对比）的事工，受差遣进入当今后现代、后基督教及全球化的情境中。这观念要求每个教会以宣教的心态进入当地的处境，让教会的一切作为都以宣教的关切为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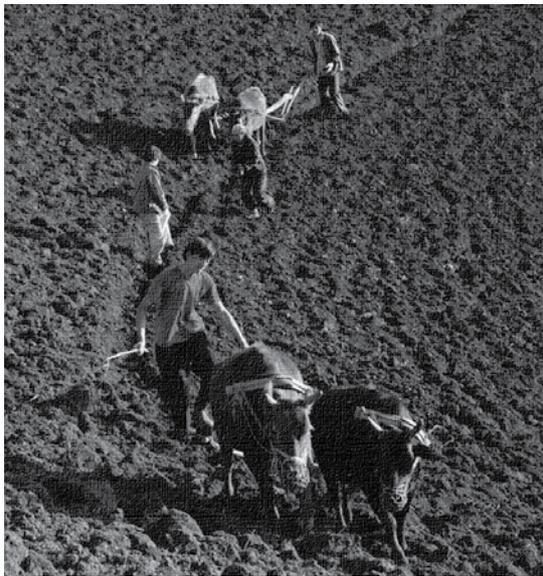
4）宣教型教会内在的生命建造，专注在使每位信徒的生活成为投入宣教的门徒样式。这观念意指教会每个肢体都是传道人，在建造全身的时候，当以门徒的灵命成长为栽培的焦点，使教会能更全备地投入神在世上的使命。

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是纽约救赎主教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创办人，1989年神带领他去曼哈顿建立新的教会。22年后的今天，他的教会成为当今城市宣教的楷模。其实，在他去纽约之前，完全没有城市布道的经历。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后，他曾在弗吉尼亚州牧会九年，在美国长老教会按立为牧师。

曼哈顿以暴力犯罪、毒品生意等大都市病态闻名，每平方英里挤着七万人，聚集不少艺术家和音乐家、忙碌的医生、每周工作80小时的华尔街上班族。凯勒大胆前往这个地区，以爱、智能和博览群籍的知识，去面对各种挑战。

凯勒的妻子凯西（Kathy）与丈夫同心事奉，带着三个男孩一起拓荒教会。他们持守几个牧会原则。首先，绝对不谈论政治。凯勒讲道时总是顾及非基督徒的心态，努力从圣经中找到对信者和不信者都有益的内容。教会也在音乐和艺术上保持卓越的水平，并且鼓励信徒去爱纽约，祝福这个城市。

凯勒的作法完全符合“宣教型教会”的原则，以致看见教会明显的成长。从五十个



人开始，到2008年时，主日崇拜已经达到五千人，在三个租借的场所聚会。根据纽约警察局的报告，北曼哈顿区，也就是救赎主教会聚会的所在地，谋杀案件1990年有379件，2008年降低为43件；强暴案从482件减低到180件。

凯勒也注重植堂的事工。救赎主教会在大纽约市和世界其他地区，帮助175间教会植堂，采取同样的事奉哲学，同时强调慈善和服务事工，把基督的爱传播出去。凯勒被无数人视为“最成功的城市布道家”，救赎主教会被列为全美第十六有影响力的教会。

3、改变文化土壤的宣教策略

在撒种的比喻中，主耶稣清楚指出，听道者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路旁，二是土浅石头地，三是荆棘地，最后则是好土。如此看来，永恒的道面对不同的对象时，总会有不同的结果。同样，不同的文化对于基督福音的反应也会不同，这取决于所谓的“文化土壤”。宣教士在日本、中国、乌克兰、巴西、

法国传道，因着这五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宣教果效也不同。

什么是文化土壤？简单地说，文化土壤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经过若干时日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它包括价值理念、宗教倾向、族群意识、民主素养等等。例如，五十年前台湾的社会封闭，以佛教为主体的民间信仰独领风骚，人们惯于到庙里烧香拜佛、在家中摆设神像祭祀；若去基督教堂作礼拜，则被视为异类，违反传统，行为忤逆。

唐斯（Tim Downs）多年在学园传道会担任传福音的训练工作，他深知“文化土壤”在宣教策略中的重要性。1999年他出版了《预约心灵沃土》（*Finding Common Ground*）一书，呼吁教会领袖要努力耕耘文化土壤，以致可以期待另一波丰硕的收割。他以自身的经验为例，说明三十年前用“属灵的四律”传福音还颇有效，但到了90年代，这种方式遇到许多从文化而来的挑战，成效大大减低，因为文化土壤不同了。

过去一百年，神州大地由于种种变迁，社会与政经情势动荡，明显的影响人对福音的态度。20世纪20—30年代，基督教在知识分子的眼中是洋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工具”，甚至1922年至1927年爆发一连串反教运动，所以传福音十分不易。文革时期，所有的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教堂遭关闭，当时的文化氛围让人以信教为耻，信教被视为愚昧无知。然而，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马列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感到失望，于是对西方文化产生向往和追求，对基督教更是普遍存着正面的态度。很明显，这三个不同的时期，知识分子对福音的态度有相当的变化。

美国社会学者贝格尔（Peter Berger）在

他的名著《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中,探讨了“世俗化”的原因。他提出“看似有理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的学说:某种概念不再被社会大众接受,是因为看似有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意识形态和以前不同了。说穿了,也就是文化土壤改变了!为了要防止文化土壤变得对基督信仰不利,基督徒应积极地投入影响文化的行列。

毫无疑问,学术界和媒体是基督徒绝对不能忽略的两个文化领域。过去三十年美国福音派学者在学术界的努力,至今已有明显的绩效。洛杉矶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的莫能(J. P. Moreland)、瑞伊(Scott Rae)两位哲学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计划为美国大学培养更多基督徒哲学教授。目前,在美国大学教哲学的老师中,竟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正统基督徒,这与三十年前只有百分之一的情形相较,真是天壤之别。

另外,二十年前,基督教思想家暨社会学家金能斯(Os Guinness)曾大声疾呼,神的儿女要主动献身具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和新闻界。若有一个信徒到基督教电视台CBN工作,就应该要有二、三十位信徒进入CBS、ABC、或NBC等电视台,这样,基督徒才有机会扭转颓风败俗。

假如基督徒在宣教上急功近利,只盼望“收割”,却不在文化土壤上下功夫,防止文化氛围变得更不利传福音的环境,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天欧洲世俗化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传福音相当困难,因为文化土壤久已坚硬,福音种子难以成长。因此,在期待任何一波福音的收成时,基督徒必须先清除石头、拔掉杂草、挖松土壤、施肥浇灌,否则即使我们殷勤撒种,恐怕成果仍极为有限。

4、以背十字架的精神投身社会与文化更新

2010年10月,南非开普敦洛桑会议中⁶,美国牧师派博(John Piper)传讲主题信息,强调要默默背起十字架来面对苦难。接着,国际医疗队的队长之妻为过世的丈夫作见证,提起两个多月前在阿富汗发生的惨剧,这是十字架道路会有的牺牲。

当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时,周围各种人群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和期待,但耶稣心中所萦绕的,却是十字架的酷刑,所以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这是诠释宣教或教会增长最生动的经文。事实上,两千年的教会历史证实了这句触人心弦的宣告。

3世纪初期,北非迦太基的教父德尔图良写道:“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正好回应了上述耶稣的宣告。在教会诞生的头三百年里,基督徒以殉道者的精神,前仆后继地摆上,虽然罗马帝国的逼迫持续不断,但到了第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时,福音却在这庞大的帝国取得奇妙的胜利。

18世纪末期,由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所倡导的“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竭尽所能要改革当时英国的社会和政治,他们抱持着十字架牺牲的精神,使得19世纪的英国社会出现一连串的更新运动,其中废除奴隶制度更是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5、以整全的圣灵论面对宣教的挑战

萧马可(Mark Shaw)在非洲肯尼亚作宣

教士多年，分别在爱丁堡大学、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博士学位。他长期研究普世基督教的发展，2010年出版《全球大觉醒》(Global Awakening)，阐述神在世界各地奇妙的作为。其中第八章描写非洲过去三十年来的奋兴与教会增长，这些无一不与圣灵超然的作为紧密相连。⁷

任何客观严谨研究普世基督教的书籍，都会触及“圣灵更新运动”带给教会的祝福。20世纪圣灵在普世大大地运行作工。著名的宣教学者巴雷特(David Barrett)在“普世圣灵更新”(The Worldwide Holy Spirit Renewal)一文中指出，自1900年起至20世纪的末了，共有七亿九千五百万的信徒经历了圣灵的更新。这种圣灵更新的工作，不仅仅局限在美洲白人的教会中，更是扩及至各大洲。

圣灵更新运动横扫全球，在白人、非洲土著、非裔美人、巴西及葡萄牙人、菲律宾人、华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韩人、拉丁或西班牙裔当中，都曾出现。根据《圣灵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一书作者塞南(Vinson Synan)的统计，到2000年时，全世界的人口共计六十亿余，而基督徒的总数为十九亿九千万余，其中天主教徒占十亿余，而受圣灵更新运动影响的基督徒达到五亿三千万。换言之，全世界有五亿以上的基督徒投身在这股浪潮中。⁸

使徒时代，教会也无异置身于“去基督教文化”的氛围中，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主要是受希腊文化、宗教和罗马皇帝崇拜所影响。可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却告诉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1:8)

三、结语

目前，英国最大的教会“王道国际基督徒中心”(Kingsway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entre)在周末有好几堂崇拜，通常总共有两万两千人参加聚会。不仅如此，这间教会在伦敦和尼日利亚已经建立了十间分会。这间教会的创始牧师阿实摩洛哥窝(Matthew Ashimolowo)是尼日利亚裔黑人，他原本为伊斯兰教徒。

2005年圣诞节，萧马可参加了这间教会的圣诞节崇拜。阿实摩洛哥窝以《路加福音》第一章来宣讲圣诞节的信息，他认为，基督是圣诞节的第一个神迹，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则是圣诞节的第二个神迹。整篇信息的中心是37节“对神而言，没有一件事不可能！”(For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⁹这是阿实摩洛哥窝的事奉哲学。在面对世俗化潮流的今天，我们仍然深信，对神来说，任何环境都不是“宣教困境”，他总是能让我们看见“出路”，因为没有一件事，他无法成就！

(作者为恩福文化宣教使团会长，《恩福》刊物主编。本文转引自《恩福》2011年7月刊V.11 N.3[第十一卷第三期]，原文标题为：“去基督教”文化潮流中的宣教反思)

- 1 Francis Schaffer, *The God Who Is There*, 14-15页。
- 2 D. A. Carson, *Christ & Culture Revisited*, 117页。
- 3 参《恩福》37期, (10, 2010): 14-18。
- 4 Charles Van Engen, *Mission on the Way: Issues in Mission Theology*, 169-187页。
- 5 Craig Van Gelder, Dwight J. Zscheile, *The Missional Church In Perspective: Mapping Trends and Shaping the Conversation*, 4页。
- 6 王东,“洛桑会议札记”,《杏花》杂志,2010年第四期: 38-48页。
- 7 Mark Shaw, *Global Awakening*, 159-175页。
- 8 Vinson Synan, *The Century of the Holy Spirit*, 372页。
- 9 和合本圣经译为：“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文 / 刘同苏

宣教就是教会向一种文化介绍基督教信仰，让基督教信仰逐渐在该文化里面扎根，从而最终改变该文化的信仰—文化运动。所谓“文化”，就是人的整体生活方式。信仰也是人的整体生活方式；基督教信仰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整体生活方式；从而，基督教信仰也是一种文化。若没有达到文化的高度，信仰就不是真正的信仰。即使对个人，也是如此。信仰的对象是文化人（即全人）；只有触及了一个人的文化层面（即整体生活方式），该人才算具有信仰。信仰不是文化内部的一种领域，或者低于文化的一种文化要素，而是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从而，信仰在外延上等宽于文化。宣教就是以一种文化形式展开基督教信仰。之所以强调基督“教”信仰，因为基督教信仰必须采取外在的宗教形式，这种信仰必须实在化于教会的“肉身”之中。只有在教会群体中，基督教信仰才达到文化的高度。教会是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形式。由此，只有以教会的实在形式，基督教信仰才可能真正进入从而改变一种文化。宣教就是信仰与文化的对话；只有在文化（即整体生活方式）的高度，才能够与文化对话。故而，只有采取教会的形式，基督教信仰才可

能与一种文化对话。宣教的主体是教会，因为只有通过教会，基督教信仰才可以与文化对得上话。

宣教的核心是植堂，即建立地方教会。教会，在广义上包括一切以实体形态展开的信仰组织，在狭义上特指地方教会。地方教会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高实体形式。地方教会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全面展开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或独立的组织。在地方教会以外的教会组织都具有临时或片面的性质，从而无法独立存在。一个片面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地方教会的日常性质与全面性质，使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而独立存在。作为唯一可以独立存在的教会组织，地方教会构成了广义教会的基础。没有地方教会，基督教信仰与一种文化的对话，就只是片面性地达到了某个文化领域，还不具有整体文化的意义，由此，也算不上整体文化层次上的对话。实际上，离开了地方教会，基督教信仰甚至不能在一种文化中持续生存下来。不日常的生活，能够长多久呢？1949年以后，在文化逼迫之下，于华夏文化里面生存下来的不是“燕京”，“湘雅”，“协和”，而是家庭教会。这大概就是

最好的证明了。从“燕京”，“湘雅”，“协和”生不出家庭教会，但是，从家庭教会可以再次生出“燕京”，“湘雅”，“协和”。宣教若没有产生地方教会，就仅仅是临时的、片面的，从而是工具性的。建立地方教会，是永久性和整体性的宣教，在这一意义上，是自在的运动。从文化（即宣教的对象）角度，植堂以外的宣教活动都仅仅是文化里面某个领域的活动，唯有建立地方教会，才是整体文化事件；也就是说，只有地方教会的建立，才最终实现了宣教的目的。

在现代文化环境里面，以地方教会为中心的全民宣教也许是最具有长久效力的宣教运动。“以地方教会为中心”意味着“以地方教会为出发点，也以地方教会为落脚点”。目前以宣教机构为主导的宣教运动，一方面将宣教的根渐渐从差遣的地方教会里面拔了出来；职业化的宣教阻止了地方教会一般会众的生命参与，由此，宣教逐渐成为地方教会的一项事工，而不是整个教会全面参与的生命形态。另一方面，职业化的片面宣教也产生了以自身为目的的领域性宣教；这种以自我为目的的片面宣教，其效力很难还原为地方教会里面的整体信仰生活，从而，宣教的根也无法扎进被宣教文化中的地方教会，往往反倒阻碍了那里地方教会的整体生命建造。从“以宣教机构为主导”到“以地方教会为中心”是复兴宣教运动之活力的关键转变。既然地方教会是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里面全面展开的场所，不以地方教会为中心，宣教怎么可能获得持续而整体性的力量呢？只有以地方教会为出发点，“全民”才能够被调动起来。以地方教会为中心的投入，使得地方教会中的全体会众都有可能直接参与，从而，让地方教会不再只是一个片面的赞助人，一个只能出钱或偶尔出力的业余宣教者，而是以主体生命全方位参与的宣教教会。只有以地方教会为落脚点，宣教才能够真正完成自身的目的。

宣教就是为了建立能够生活在地方教会里面的信仰生命；不还原为地方教会里面的整体生命，宣教就没有达到最终目的。以地方教会为落脚点，就使侍奉的位置向所有的会众开放，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差会会众的实际生命投入，并由此而建立起两边教会的实际生命连接。从临时或批量（即片面）的角度看，一个职业化的专业机构的宣教效力大于地方教会；但是，以能够在地方教会里面全面活出基督生命为终极效力来看，则从地方教会到地方教会的宣教远远强过职业化的专业机构。由于信息资源、语言、交通、财力等方面的局限，以往的地方教会不得不将宣教的主导地位交给专业的宣教机构，而当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为地方教会提供了直接投入宣教前线的条件。对于地方教会，所需的只是异象和策略。

中国不是一个宣教大国，甚至谈不上是一个宣教国家，目前的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宣教的“潜力股”，一个未来可能的宣教力量。坊间对中国在宣教方面的预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中国内部迅速兴起的福音运动；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从而一旦中国福音化可能带来的数目惊人的基督徒；福音运动初起时的灵命活力。然而，这些潜在要素仅仅是中国成为普世宣教力量的可能条件。我们需要克服一些重大障碍，才可以将可能变为现实。首先，“迅速”不等于“成熟”，而“输出”却以一定程度的成熟为条件。一个自身不成熟的教会有可能建立一个可以长到成熟的教会吗？就像一个自己都不知道能否长大的小孩子可以养出长成大人的孩子吗？其次，热情不等于能力。作为一种实际生命运动，宣教的能力需要在宣教里面获得。没有长时间的实际宣教实践，中国教会不可能获得宣教的能力，而空洞的宣教热情反倒可能造成眼高手低或自我挫折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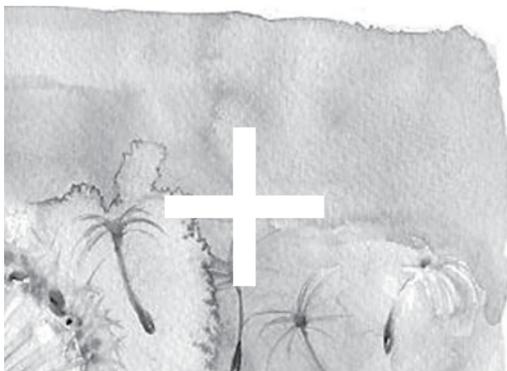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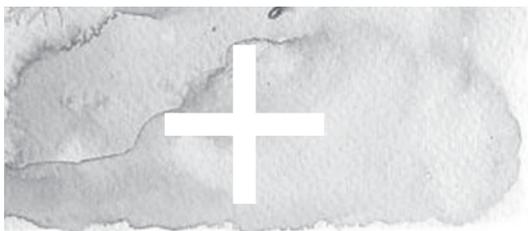
既然地方教会是宣教运动的中心，先行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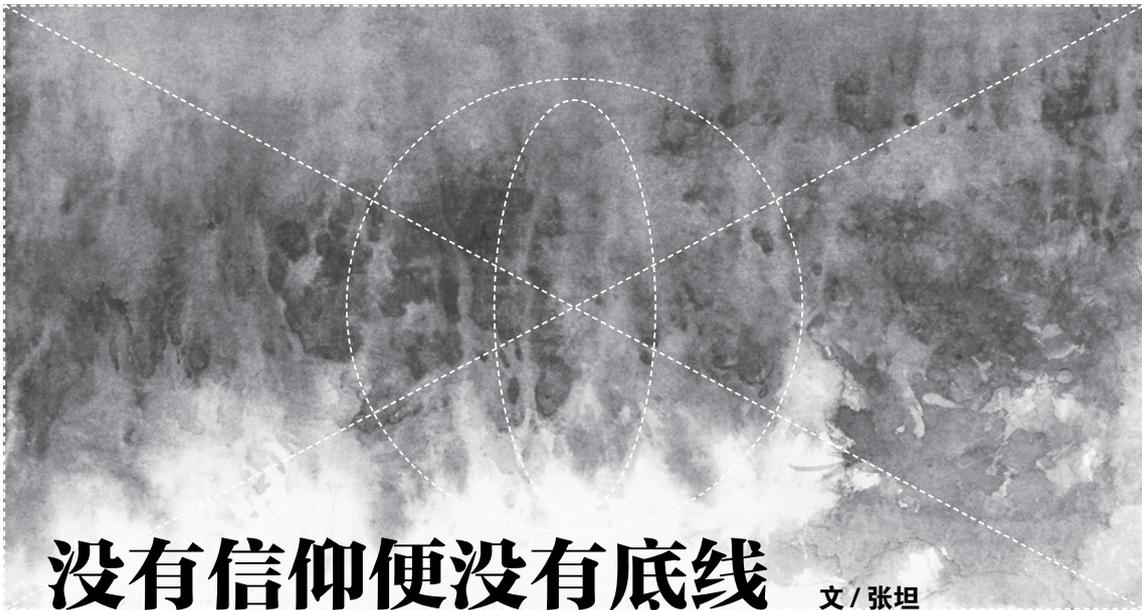
立可以宣教的地方教会，也许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必须的前提。没有坚固的地方教会，就没有广泛并持续的宣教运动。目前紧要的是在中国自身建立初步成熟的地方教会，以便这些地方教会在生命上真知道教会是什么，从而，可能以自身的生命样式复制出地方教会。植堂就是复制，就是效法。从不健全的教会，如何可能复制出健全的教会呢？建立可供效法的榜样，效法关系才可能开始。有什么样的婴孩，就发育出什么样的成人。地方教会在建立初期，就应当将宣教作为教会生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不仅教导与培育宣教的意识，而且通过有计划的实践操练能够宣教的生命，这样，在教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可以自主地开始宣教事工。

宣教可以类比足球。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最终决定于基础而不是尖端。硬性拔出几个尖子凑出一个国家队，送几个明星到外国学习，短期的密集培训去冲击世界杯，花钱请几个大牌教练，并不可能全面并长久地提高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最终取决于基础训练。有没有广泛的群众足球活动，有没有坚实的青少年足球训练，有没有高水平的足

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足球是否可能持续保持高水平的状态。中韩两国之间的足球水平差距，不是国家队之间的高低，而是足球运动基础的差别。同理，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不能靠凭热情冲出去的几个宣教明星，不能靠硬凑强堆出来的短宣队，不能靠国外支持的宣教活动；真正的“中国”宣教运动应当是以中国自己的地方教会为基础而自然流淌出来的生命运动。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广泛并持续的宣教运动，就必须在中国教会内部发展“业余”（即全民）的宣教活动，培训未来可能承担宣教重任的“青少年队”（即初信者与新堂会），建立具有强烈宣教意识并具有宣教能力的“俱乐部队”（即地方教会）。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才有可能出现强有力的“国家队”（即宣教机构），才可能在宣教的“世界杯”赛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为作者2011年8月17日在韩国首尔“中国宣教”大会上发言的草稿）





没有信仰便没有底线

文 / 张坦

易中天先生是能仗义执言又言之有理的学者，对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往往有独树一帜的精辟见解，是我所尊敬的为数不多的体制内学者之一，因此他的言论我会较多地关注。今天看到易先生关于信仰问题的坦率谈话，更加倍引起我的注意。

2012年8月5日“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上海问答上（见易中天博文“教师不是蜡烛”），易先生对（中华民族的）信仰问题有这样的阐述：“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信仰。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无信仰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意识、彼岸观念和信仰的。因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艺术精神。这就决定了我们没有宗教意识，没有信仰。”对于这样的判断，我表示完全赞成，这比任继愈等人“中华儒教”的见解深刻得多也中肯得多。

我认为，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世界上的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讲求“对错”，一类讲求“输赢”。讲求对错的人一定要导向终极关怀，讲求输赢的人一定只导向现实关怀。整体来看，有信仰的人属于前一类，无信仰

的人属于后一类。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属于前一类，而最大的一个族群华夏民族属于后一类。“对错”的原则是“追求真理”，为了“追求真理”，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输赢”的原则是“追求成功”，为追求成功，会不择手段（虽然也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说辞，那不过是冬烘的自欺或猾贼的欺人）。不信你翻开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只有一句话：“成王败寇”。“成王败寇”不但是我们中国人看待一时一世的文化标准，也是整体华夏民族的精神底色——除了“王”、“寇”，看不到“人”。

因为中国文化看不到“人”，所以和易中天不同，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以下两大特色。

一、“神道设教”的结果是没有道德底线

中国文化里虽然没有宗教，但有一个“神道设教”的传统。我们重点分析一下易先生推崇的周代“礼乐”制度的“神道设教”观念。

“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示部》：“礼，

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从示”，就是显示给人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

“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已经不是如西方那样虔诚敬神，而是做作，这已经透露出了中国文化核心内容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神道设教”更是赤裸裸地告诉统治者说：“对老百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欺骗。”

“神道设教”的提法，出自《周易》的《观卦·彖辞》：“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由宗庙的祭祖典礼而讲到政治教化，所以彖辞用“神道设教”进行概括。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是观卦的卦辞。“盥”是敬酒灌地以降神的仪式，“荐”则只是向神位献豆等物的小礼仪。按照彖辞作者对观卦的理解，百姓看到君王在宗庙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圣人于是根据神道制立法教，使天下百姓服膺，达到有序的治化。

《观卦》的卦象，上卦为巽风，下卦为坤地。从上下卦来说，是“风行地上”。风从天来，遍吹地上，无所不至，有“教化”之意。《毛诗序》中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

所以，《象传》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贲卦·彖辞》接着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就是中国最本来意义的“文化”。换句话说，中国“文化”的根本意义，是与“神道设教”联系在一起的。

钱钟书先生说：“神道设教，乃秉政者以民间原有信忌之或足以佐其为治也，因而损益依傍，俗成约定，俾用之倘有效者，而言

之差成理，所谓‘文之也’。”（《管锥编》第一册）意为统治者借用民间已有之宗教信仰，对其加以改造后，用作治民之具。关于“神道设教”之功用，钱先生以为有二：一是“为治人者言，法令之力所不逮，得宗教以裁约之”。二是“治于人者……，遭荼毒而不获申于人世，乃祷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苏”。即是说，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用“神道设教”之法治天下很是得心应手；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则为解脱疾苦的途径之一。

我认为，如果说“礼乐”制度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自我管束的话，“神道设教”就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针对被统治者的统治术。这套统治术的特征有如下两个方面。

1. 只有形式没有内容。

上文说到“百姓看到君王在宗庙祭祖中举行盥的隆重典礼，从而对神道产生敬信”。“把敬神的事做给人看”，并没有信仰的成分，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宗教讲究“过场”的形式主义特征。

2. 这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统治者自己是不相信的，专门用来吓唬老百姓。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荀子》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文子·上礼》更一针见血：“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因此，我同意易先生前半句“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意识、彼岸观念和信仰的”这一判断，但不同意他后半句的论述：“汉民族从周代开始，就是‘以伦理代宗教’。虽然没有信仰，但是有核心价值观，有道德底线。所以三千年来文明不中断，而且社会基本稳定。”

因为“神道设教”愚民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愚民者没有道德底线：己所不欲，仍施于人。“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

被愚民者没有道德追求——最能反映这种特征的如“送灶”。旧岁逝去前夕，灶神老爷按例要上天禀报所在人家一年的善恶，以供天帝决定赐福或降灾时抉择。人们对这位“现管”的灶神老爷不敢等闲视之，唯恐他打小报告，故在送他上天前，总要供些酒菜和麦芽糖封住他的嘴，免得他在天帝面前说三道四，直至除夕再把他接回来。连神都敢忽悠，“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其道德素质溃烂得根本没有底线。西方百姓用“祷告”来建立与神的沟通，而中国百姓想的却是封住灶神的嘴。

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人本主义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骗子与傻子的游戏。

二、人本主义的结果是骄傲狂妄到极点的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的文化必然产生人崇拜人。梁启超说：我们若是把中国人所供祀的神，一一根究他的来历，大抵没有不是由人变来的……所以可以说中国人实在没有宗教，只有崇德报功的观念。

葛剑雄说得更直白：“政治家并非不知道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

专制的文化基础“道统”，骨子里来说便是“无天无法”。“无天”便是没有信仰，人中的帝王自大到“欲与天公试比高”便会实行“专制”。人中的黎民百姓因对统治者的崇拜和恐惧而放弃人的尊严，这是“专制”的社会基础。中国历史几千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因为“无神”，所以“无人”，只有帝王将相的争权夺利。孙中山说得最直白：“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无法”，便是只有“王法”没有“宪法”，人民只能在“王法”的机制中成为专政对象与专政工具。“无天无法”是统治者的文化。关键是专制条件下只有统治者的文化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文化，换句话说，讲输赢的文化是“一元”（皇权）的，它的逻辑是赢家通吃，天——天子——天下，一人（天子）拥有全部，除此之外的从个体到集体在这个逻辑中都没有地位。

我们熟悉这样一句话：“乾纲独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文化的弊病就在于只有“国家文化”而没有“社会文化”，也就是只有统治者的文化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文化，只有“庙堂”文化而没有“江湖”文化。（“江湖”文化的代表作《水浒传》都是以“归顺朝廷”为标的，何谈其他。）

正因为“无天无法”是统治者的文化和被统治者的“被文化”，“专制——革命——再专制”模式翻译成民间语言，叫做“打倒皇帝做皇帝”，这是“江湖”语言吗？不，它正是“庙堂”文化。

“打倒皇帝做皇帝”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因此，中国历史上“打倒皇帝做皇帝”的绝大多数是流氓莽汉。

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他们虽然是“道统”的掌握者，但由于“政统”的皇权既是政权又是神权，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来就只有处于依附的地位。“道统”不但没有起到对“政统”的监督权与修正权，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专制的理论工具，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在帮中国人选择了命运的“文化”环境中，你会无奈地发现：“专制——革命——再专制”成为了“天经地义”，“奴”（专制）是常态，“怒”（革命）也是常态，没有“宪政民主”



这样的良性社会变更程序，“革命”与“反革命”都使用同一套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必然也就导致社会向同一方向发展。黑格尔道：“中国的历史本质上来说就是没有历史，只有历代君主的更迭，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

在这种低人权、低福利、不发展的社会中，我们离“人的幸福”与“社会和谐”这两个人类基本目标越来越远，如此易中天所说“三千年文明不中断，而且社会基本稳定”有什么意义？

我还认为，如果“三千年文明不中断”，中国将永远没有前途。鲁迅形容中国文化是“神奇的毒针”：“从孔孟到董仲舒，到宋明理学，朱子学说，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的精神礼教，把人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而甘愿为奴。尊孔、学儒、读经、复古，由来已久，旨在从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

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不肯做的事。”

正是这一套貌似华美灿烂而骨子里已病入膏肓的文化体系统治中国五千年，除使得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外，更重要的是，它毒害了中国人的心灵，使我们已经不会“用心思考”，使我们的血液里充满毒素。我们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找到的最高理想也只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那种超越的精神价值，形而上的追求，个人与神的关系等，就一直旁落在中国文人的视野之外。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会思想的芦苇”，也是最易被折断扔弃的枯草。

综上，没有信仰的中国文化，于个体形成心灵毒害，于社会形成皇权专制，哪来“道德底线”？

对照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的自以为是，基督教文化是神本主义，因此是“自以为非”：人都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因被造而尊贵；人都是“罪人”，是“罪人”就要用监督来约束他，尤其是掌握权力的政府；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只对一个人负责，这个人就是上帝，上帝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道德底线”由此才会产生。

没有信仰就不会有道德底线，往奶粉里面放三聚氰氨就是没有信仰的必然结果。现在整个中华民族失魂落魄，没有“道德底线”是表象，没有信仰才是根本原因。美国的兰德公司有一个分析中国人性格成因的报告，其中说到：“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人失去人性。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

这份报告认为从精神层面上看，中国人甚至不能称为是“人”，不能称为是上帝按自己形象创造的那个有良知有自由意志的“人”。我痛苦地发现，这样难听的话竟然是真实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归为三类动物：一类为“饕餮”——贪婪、残酷的统治者，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贪得无厌”；二类是“鹰犬”——唯利益驱动的统治者帮凶，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为虎作伥”；三类是“牛马”——受压迫受欺诈而不知痛苦的劳苦大众，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叫“任劳任怨”。

我更痛苦地发现，浸润、学习、热爱了一辈子中国文化的我，在现代“人”的指标下，竟也不是“人”。

“自以为是”和“自以为非”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的后果是：西方民族崇拜神，中华民族崇拜人。与西方民族相比较，他们的文化基因是神的人化（道成肉身），因此有

基督教；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人的神化（真命天子），因此有专制。

最后，我还想关心一下“不需要信仰”的易先生个人的生命问题。帕斯卡尔说：“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人的尽头，便是神的开头。易先生央视开坛、著作畅销、粉丝拥戴，没有“倒霉”到王阳明“唯生死一念未明”而不能自行了断的绝境；也没有觉悟到梁济、王国维非要“以死救末俗”的绝决。我倒建议易先生关注一下梁济和王国维的生命态度，梁济和王国维的死，从个体来说标志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阶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人格，但从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是没有活路的——哪怕你是如梁济和王国维这样的才情与心性。如果哪一天易先生把自己的才情、心性与自我的生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断不会轻易说出“不需要信仰”的话。

我作为一个今年才受洗的新信徒，愿意与易先生交流神对生命的翻转。

本人出于对易中天先生的敬仰，同时出于易先生的观点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触动从来没有写过博客的我写下了第一篇博客，愿意与任何人进行文明交流——但不包括不会说人话的孔庆东之流。■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尼哥底母”<http://blog.sina.com.cn/u/2960483600>。标题及正文中个别地方经过本刊编辑及删节。）

基督徒的饶恕与社会正义

——评柴玲的“我饶恕他们”一文

文 / 天明



“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际，当年的学生领袖、近年成为基督徒的柴玲发表了一篇“我饶恕他们”的文章。柴玲在文中是这样说的：

……对我来说，回忆 1989 年 6 月 4 日发生的惨剧，就是面对一个被碾碎的梦想。我至今痛悔，希望惨剧没有发生，很长一段时间……我难以咽下内心一直不断的苦毒、仇恨和愤怒。

直到有一天我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他深爱那些妇女、儿童、穷人和受压迫者，跟当时的文化格格不入——他呼召我做同样的事。

他还饶恕了那些嘲笑并冷血钉死他的人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 23：34）再次地，他呼召我做同样的事。

因着耶稣，我愿意饶恕。我饶恕 DXP 和 LP。我饶恕那些冲进广场的士兵们。我

饶恕现在那些压制自由、强制执行残酷的一胎化政策的领导人。

文章的最后柴玲特别加了她的祷告，并分享了因饶恕临到她生命中的从上帝而来的平安：

我祷告一种充满恩典的文化在中国崛起，赋予人们尊严和人性。我祷告现任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能够信奉上帝，以怜悯和慈爱来治国。我祷告那些被逼压者不会寻求报复——像大卫的将士杀死了押沙龙那样——而是要有勇气去饶恕。饶恕不是接受他们的不义，而是将审判的主权交给上帝。

我深知这种饶恕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是冲突的。这不过是耶稣给予我饶恕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我依照他的榜样来宽恕，内心充满了平安。当饶恕临到的时候，永远的平安才会降临。

柴玲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然,其中不乏对柴玲的勇气表示赞赏的,里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他们赞赏的理由是因为柴玲选择饶恕需要极大的勇气,饶恕意味着她最终做出的是基督那样的爱的选择,而且认为在中国文化里最欠缺的宽恕,和与此相关的非暴力的力量能够融入我们民族的性格当中。但更多的回应则是不解和遗憾,说不出来的一种被“背叛”的痛苦感觉和强烈的批评,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表达了对柴玲个人信仰的尊重。来自很多朋友和网友如此的反应,使柴玲很快写出第二篇“再谈宽恕”,就她的饶恕做出了解释,以便消除大家对她“饶恕”的误解。

关于她做出的“饶恕”,柴玲首先解释说,她的饶恕是出自她基督信仰的个人的饶恕,不代表任何人,她也不要求任何人和她一样饶恕:

首先,我的宽恕是个人的,是来自一颗被耶稣的爱所转化的心。我的原谅不代表任何人,也不是要求任何人跟我一样去原谅。这样重要的事情必须是自己的选择。但我是作为一个神的女儿奉主的旨意而说的。

柴玲还说,她饶恕并不等于说忘记“他们”所做的和“他们”的作为带给她的痛苦,也不是免除“他们”当年的责任和“他们”的罪孽所当受的惩罚。

但是柴玲又解释说,她饶恕正是由于她对神的公义和公正有完全的信心,也源于爱我们人类的神和他的怜悯,以及基督饶恕的榜样:

难道你们会怀疑他们是否会要付代价吗?他们当然会的。圣经的每一篇都记载着神的公义和公正。神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罪。所以我有完全的信心,有一天他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来面对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的罪。但是,爱我们人类的神,也是充满怜悯的。神把自己挚爱的唯一儿子送到十字架上,为人类顶罪。……

然而,即使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神还是呼召我原谅他们对我的伤害。要我为他们得到宽恕而祈祷,这是因为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

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愤怒的人群聚集在他面前,喊道:“把他钉十字架!”士兵边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边嘲笑他。但耶稣,看到这一切,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路23:34)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就祈祷他的天父原谅伤害他的人。很多朋友误解说,宽恕只能在对方忏悔后才能给予,在对方被公义击败时才能施舍,但耶稣做的恰是反文化、反感情的:耶稣在他們都没有认罪,甚至是还在伤害他的时候就已经祈祷天父原谅了他们。

这样,至少对柴玲个人来说,上帝的公义和她饶恕的行为是并不矛盾的:

当主耶稣基督说宽恕的时候,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公义的承诺:“各位蒙爱的人哪,不要自己报复,宁可给神的震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报应在我,我将回报。’”(罗12:19)

……

所以,有朋友劝勉在天安门英灵未得

公正之前是不能说宽恕的，我认为，宽恕不但不会妨碍天安门的受害者得公正，相反，当我们把审判的主权通过宽恕交给神的时候，神会更快地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为无辜人早日申冤。

尽管柴玲就她的“饶恕”做出了多方解释，但在那特别的6月即将结束之际，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还是就柴玲的“饶恕”做出了自己的回应：“致柴玲——一封迟复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的一开头，这位天安门母亲解释了自己的答复拖延的原因，以及如果她不做出回应就感觉对不起“六四”亡灵及已故难友的特殊心情。文中有一段记述6月3日那晚天安门母亲们所失去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形：

你知道吗？也正是6月3日那个可怕的黑色周末，我的儿子蒋捷连因惦记着留守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这是他的原话）的安危，才挣脱我的拉劝，走出家门奔赴危险与死亡的。其实，在那一夜，又何止蒋捷连呢！

但让丁教授没有想到，而且难以接受的是，就在这二十三周年的纪念日，她等来的却是柴玲的“我原谅他们”：

大概是出于对亡儿生前对广场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眷恋的尊重吧，在漫漫长夜的凄风苦雨中，我内心一直期盼着你们这些当年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们能真正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或对某些错误言行真诚地认错、道歉——不仅仅对我们这些难者家属，而且也是对关心和爱护过你

们的全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然而……现在已经是二十三周年了，我又等来了什么呢？

这位天安门母亲接着就说，在“他们”罪恶的作为并没有停止、反而还在持续的今天，宽恕他们是在“罔顾事实”；而且，至今还没有人为当年的罪恶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宽恕“他们”是“荒唐的”：

请问柴玲女士：天安门母亲抗争二十三年，把达成的共识归纳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难道按基督教伦理道德要我们抛弃这三条，莫名其妙地去“原谅”当年大屠杀的刽子手吗？要知道，这二十三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除了那些监视、管制我们的公安警察外，没有哪一位共产党官员同我们“天安门母亲”有过任何接触，没有哪一个官员与我们说过任何一句话，更不用说对当年的大屠杀表示一丝一毫的歉意了。你要她们“宽恕”、“原谅”他们，无论从崇高的宗教信条出发，还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伦理出发，你问问他们能接受你的“宽恕”和“原谅”吗？不可能！这是绝对荒唐的！

在公开信的后段，丁子霖教授强烈表达了天安门母亲们不懈的努力，已经“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她们的努力是源于伟大的爱的责任，目的就是“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拥有一

个母亲的爱，我们爱自己的儿女、爱所有的孩子，我们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和仇恨”，却换得了“对道义与责任的承担”；我们“以爱来化解仇恨”，这是有前提和原则的，那就是联络尽可能多的人来更有效地制止暴行和杀戮。

以笔者之见，柴玲和丁子霖教授面对“六四”事件表达了两个不同的侧重点，柴玲注重的是一个基督徒个人因信仰基督而来的饶恕之爱，丁教授强调的则是社会正义。当然，笔者也发现，柴玲并没有因饶恕而完全忽略上帝的公义，她认为饶恕与上帝的公义不矛盾；丁教授也没有因对正义的追求而完全不提爱，她认为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就是源于爱的责任。由此引发了笔者的一个思考，就是基督徒的饶恕和追求社会正义之间有什么交集？我们当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圣经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以笔者对圣经的理解来看，**无论是基督徒的饶恕，还是社会正义，其根基皆为上帝的公义，并且皆以此公义为基础来实现上帝的爱。**

如果没有绝对的公义，罪恶最终也得

到审判的话，那么以爱来饶恕那些伤害自己的人，那本身就是不公义的，并且让那些受害者以爱来饶恕的信仰要求也是残忍的。但基督徒以基督之爱能够并且愿意饶恕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就是因为相信上帝绝对的公义。

上帝的公义在圣经中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上帝让我们在今世承受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之报应，如圣经所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 6:7）二是，每个人都要因罪而死亡，并且死后受上帝终极的审判，如圣经所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罗 6:23；来 9:27；启 20:12）第三，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承担了上帝对罪恶的公义审判。这样，通过接受（相信）神借基督在十字架上审判罪恶所成就的上帝的公义（就是基督担当了本该我们自己受的罪的刑罚），人就得以脱离上帝终极的审判，这就是基督徒常说的人的得救（又称救恩）。

神既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审判了全人类的罪（不但是我自己的，也是那些伤害自己的人的罪），基督徒基于这基督的十字架所成就的上帝之公义就可以饶恕那些伤害自己的人。因此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基督徒个人所获得的救恩，还是他们表现出的饶恕，都不削弱上帝的公义，反倒见证借基督的死所显明的上帝的公义。另一方面，因着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徒知道自己所获得的救恩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爱，也由基督担当的爱。因此，对基督徒来说，饶恕就是对活出自己所蒙的上帝之爱的一种责任和回应，饶恕仇敌、饶恕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也成为“神爱世人”（约 3:16）的见证。这就是



圣经所说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弗 4:32）

社会正义同样也是源于上帝的公义。如果没有上帝绝对的公义，并且罪恶最终也得不到审判的话，哪里还有什么社会正义，追求社会正义还有什么意义呢？上帝在所颁布的十诫中明确规定“不可杀人”（出 20:13），并在他的神圣律例中多次表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出 21:23—24）。这表明人不但不可以伤害他人的生命，而且伤害他人生命者必须“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 21:23—25）；这律法不但适用于伤害成年人，也适用于伤害腹中的胎儿。在社会关系中所表明的这上帝公义的原则，正是社会正义的根据和它的具体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箴 14:34，“公义使邦

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圣经告诉我们，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社会正义，就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早在挪亚时代，神就对出方舟的挪亚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 9:6）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表现的社会正义就是出于上帝对照他自己形象所造之人的爱。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爱，意思也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例，为的就是在社会中实现要保护人生命的上帝之爱。而且这种社会正义的实现，须透过社会中设立的秩序（相当于今天的司法）来完成，而不是由受害者个人去实现。换句话说，个人不能以正义的名义拿起报复的武器。很多人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作为个人报复的理据来使用，这是对圣经的误解。为此，耶稣解释这律例时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 5:38—41，44）耶稣的解释再清楚不过了，这律例不是为个人报复设立的，而是为着在社会中实现上帝对人的爱而设立的。因此，在伸张社会正义时也不能没有爱，哪怕对方是伤害你的仇敌，也当存一颗饶恕的心。由此可见，一个人爱仇敌是因为对上帝赋予人生命的无比宝贵价值的尊重（参太 18:6—14）；也因为对生命的如此的尊重和爱，一个社会必须严格公正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惩罚那些伤害他人者。

社会正义的目的是为在社会中实现上帝的爱。但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正义得不到伸

张，那么，他们生活的土地就无法得着上帝的祝福，不法的事也使人们的爱心越来越冷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洁净”原文作“赎”）（民 35:33）；“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太 24:12）。这也是先知面对着不断失去社会正义的当时社会发出呼求之原因——“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 5:24）“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何 10:12）

作为一个人，当有饶恕之爱；作为一个社会，正义当被伸张。这本是上帝之爱和上帝之公义的美好和谐体现。因此，在笔者看来，柴玲因着信仰化解内心的仇恨，公开表达——“我饶恕他们”，这确实是一个爱的见证，因为没有爱占据她的心，她就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饶恕，意味着选择了上帝的爱，这爱医治了柴玲受伤多年的心灵，使她从此可以在上帝的平安和爱中生活。为着柴玲感恩的同时，笔者也由衷地敬佩以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们过去二十三年来为实现“六四”事件上的社会正义所做出的艰苦不懈的努力——“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她们这样的努力，如今已不只是为她们“六四”受害者及其家属，也是为那些没有被上帝的公义所约束的公权力无情伤害的这个国土上的每一个人——“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

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这就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的结论。”柴玲的饶恕所表达的爱和丁子霖教授所表达的正义，正是这个社会所欠缺并急需需要的。

但从丁子霖教授对柴玲的回应中，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柴玲的饶恕与丁教授社会正义的追求间似乎还有未被化解的张力。那究竟是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那是因为柴玲虽然以个人的名义表达了她的饶恕，但在“六四”相关的事件中，柴玲不只是一个个体，作为当年天安门事件当中的一位学生领袖，她的身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面所说的张力就来自于这种代表性。柴玲作为一个个体，因信仰基督决定饶恕那些造成她人生痛苦的人是好的；但因她的代表性，对原先和她站在一起并且受到伤害的人来说，至少有被背叛以及他们一直坚持的社会正义之努力被否定（或轻忽）的感觉，因为大家认为柴玲作为当年的一个学生领袖，应站在当年受害的学生以及他们家属一边，当为在“六四”事件中社会正义得到伸张做出努力。

关于这种代表性所带来的张力，圣经也有描述。当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叛乱，大卫王和跟从他的人逃亡时，一个叫示每的人咒骂大卫并拿石头砍他。这样的罪本该被处死，但平定叛乱回都的路上大卫饶恕了他。大卫个人饶恕一个伤害他的人，本是好的，但大卫作为国王具有代表性，国王的饶恕就意味着示每的罪无须追究。但是，按公义之原则，示每的罪理当被追究。因为这个缘故，大卫在即将离世前，把这个问题交给了继任他王位的所罗门——“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王上 2:9）建立在这种公义



之上的国权才得以坚固（王上 2:46）。本故事就描述了一个处在个人的饶恕与社会正义的张力中的代表性人物，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圣经中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柴玲所举的大卫饶恕背叛他的儿子押沙龙的故事。柴玲所讲的是这个故事中父亲饶恕儿子的一个侧面，这故事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大卫作为国王为谋反叛乱的儿子押沙龙的死哭泣悲哀带来的影响，圣经是这样描述的：“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地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号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地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

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撒下 19:2—8）作为父亲为自己儿子的死恸哭悲哀（即便是背叛他的儿子），这有何罪？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但作为国王为叛乱者的死在城门楼哭泣，岂不使那些为保护国王而流血战斗的众民难受吗？这就是代表性所带来的张力问题。

为此，笔者在想，如果表达饶恕的是天安门母亲，那么产生的影响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它更有助于医治其他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灵的伤痛；相反，如果柴玲在表达个人饶恕的同时，以爱来呼吁“六四”事件上尚未实现的社会正义，那么，她的信仰见证也就更加美好了。总之，一个社会要成为健康和谐的社会，柴玲所表达的饶恕和丁教授所追求的社会正义，缺一不可；对一个伤痕累累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主啊，愿你医治这地——以你的公义与爱！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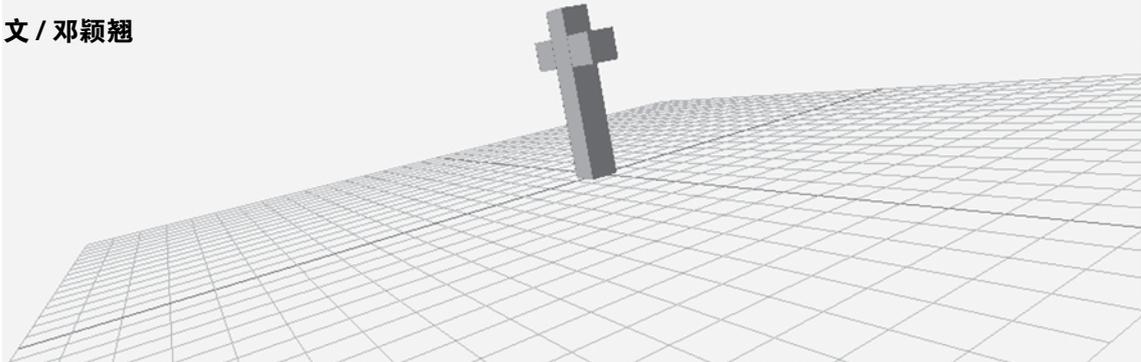
（作者为北京守望教会牧师）

1 笔者所引用柴玲的“我饶恕他们”一文是林姊妹翻译的版本。另外，笔者在本文中所引用的三篇文章，即柴玲的“我饶恕他们……”和“再谈宽恕”，以及丁子霖教授的“致柴玲——一封迟复的公开信”中出现“饶恕”、“宽恕”、“原谅”这几个相近的词，且互换使用，但笔者认为最贴切的词是“饶恕”，所以在本文中笔者是均使用了“饶恕”一词，特此解释。

北京家庭教会的身份坐标

守望教会个案部分

文 / 邓颖翹



一、引言

家庭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地图上原本是相对隐藏的，从“地下”的状态到“浮出水面”，北京家庭教会经历过一个转型的历程。在公开化和观念演进的过程中，家庭教会渐次在公共领域中呈现出其身份坐标，而领导层对教会身份的体认，也同时塑造着会众对宗教、政治、社会身份的理解。三者互动关系的建立，亦驱使教会及会众重新建构其身份想象。近年，学术界及教会界出现了“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知识分子家庭教会”等词汇，用作形容那些在城市中以知识分子为主、比较公开、主张与政府对话、有别于“传统教会”的家庭教会，而北京正是这一类教会最为集中之地。在上述统称背后，究竟她们在核心理念和身份定位上有多少一致性？

本文选择了目前北京其中两间较有代表性的家庭教会——守望教会及福音教会——作为研究对象。两间教会同样于上世纪90年代建立，至2011年都有大约一千人聚会，牧

者及会众均以知识分子、青壮年为主。而两者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教会模式上的不同，反映着领导层在核心理念上的不同。福音教会目前仍然采用“家庭聚会”的形式，分散为16个堂聚会；守望教会则从十多个团契发展到2008年正式合并为一个大堂会，直到如今仍然坚持不分散聚会。而在公开化的过程中，守望教会是自我公开化，福音教会却是被公开化。

两间教会虽然存在着以上差异，但同样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承受不少政治压力。面对宗教与政治的张力，教会如何应对？对教会又构成什么影响？笔者分别于2009年及2011年在北京进行了田野调查，透过参与当中的教会活动，以及借着访谈及文献搜集等工作，对两间教会的实况进行深入研究。¹ 本文将追溯两间教会的成立及发展历程，包括探讨教会的核心理念及公开化的过程，再探索会众对教会宗教、政治、社会身份的理解，从而勾勒出北京家庭教会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身份坐标。（本文以下只选了全文中第二有关守望教会部分以及第四总结部分。——编注）

二、北京守望教会

(一) 教会的成立、发展及理念

1、从成立到堂会化：走那“更宽的路”

北京守望教会于1993年由金天明牧师建立。天明牧师于1989年9月信主，当时他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四年级学生。那一年，他切身感受到“六四”事件带来的震撼。他说“六四”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破碎，那种几千年来用知识报答祖国的传统理想一下子就破碎了：“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真的无情地被践踏了。”² 信主那天，他是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他应朋友邀请去到教会，想不到第一次听诗歌就非常感动，神的爱使他贫乏的心灵得着安慰，于是他就决志信主了。1990年1月他感受到上帝呼召他作传道人，可是当时他的理想是成为博士，这也是家人对他的期望。经过一年半的挣扎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当时读研究生和在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响应上帝的呼召全职事奉。信主后他一直在“三自”缸瓦市堂里的一间朝鲜族教会聚会，那是一间独立于“三自”的教会，教会只是借用教堂的场地聚会。当天明牧师决定要做传道人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要走“三自”的路，而是要走“比她窄的路”。90年代初，家庭教会在城市中是极度边缘化的群体，但对于自己的选择，他是十分坚定的：“那时候的环境比现在更严峻，那个时候如果走传道人的路，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监狱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反正也跟随主。既然是真理，就没有关系了。”³

1993年，天明牧师在他位于海淀区清华大学西门的家中开始了聚会，这间10平方米的房子就成为了守望教会的发源地。教会于1994年搬到一处租赁的房屋，后来在1997年租下了位于海淀黄庄的一个地下室，一直

到2001年教会离开地下室，开始以团契倍增的方式成长。到2005年下半年，教会已发展到12—13个团契，主日共有300人聚会，那一年教会决定转型，从团契倍增的模式转为堂会型模式。教会于是开始合并团契，首先是两个两个地合并，期间教会的聚会点首次从居民楼转移到写字楼，最后教会于2008年3月正式在华杰大厦合并为一个堂会聚会。

守望教会的孙毅长老称，教会原本不是要追求大教会的模式，而是在遇到实际困难后寻求神的带领，再重新制定教会的发展方向。当教会发展到12个团契，就已经到了一个成长的瓶颈。由于每个团契都需要有负责的带领人，教会需要不断栽培新的同工。这些同工要分担带领查经、讲道、关怀等工作和处理紧急事务，而游走于各团契的牧师只能关心到同工层面，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下，教会很难有力度地发展其他事工。⁴

天明牧师亦称，当年团契倍增的速度远远比一个工人成长的速度快，到了一个地步，工人成长的速度没有人数和团契倍增的速度快。而且当资源、力量、恩赐都分散在不同团契时，教会很难开展专项事工。而把教会整合在一起，便能更有效地发挥整体教会的功用。除了这些内在因素，教会还经常要面对在居民楼聚会扰民的问题。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以及教会逐渐意识到要承担社会责任，教会决定向堂会模式转型。除了在聚会形式上作出了调整，教会治理亦走向成熟和制度化。教会成立了“治理委员会”、“同工议事会”、“会友大会”以及多个事工部门，并制订了教会纪律、章程和信约，这些都成为了成熟教会的指标。在转型期间，教会也同时走向公开化，在公共领域中浮现出其身份坐标，让社会上更多人知道守望教会的存在和信仰的意义。公开的集体聚会、出版刊物、设立网站等都成为标示教会宗教身份的途径。

2、非隐藏的教会：争取公开化与合法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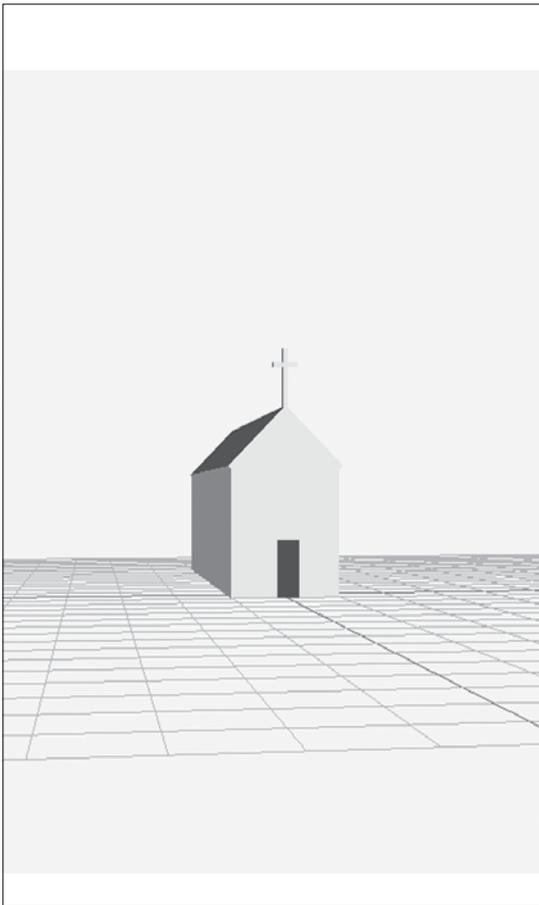
守望教会被视为北京、甚至整个中国教会中最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新兴家庭教会之一，其中一个原因是教会在北京开创了先例，包括是第一间在写字楼聚会的家庭教会，第一间向政府申请独立登记的家庭教会，以及第一间千人的家庭教会在写字楼建堂。而教会在2006年申请独立登记的行动，是教会公开化的一个里程碑。登记表明的是教会对于当下自身处境及使命的觉醒，教会意识到浮出水面的时候到了。这种意识源于教会对自身身份的理解已在发生变化。

教会申请独立登记是争取合法地位的途径，是社会群体意识的一种外在表现。⁵ 教会不是以宗教公民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基督教会的集体身份试图解决政教关系问题。⁶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这个名字，便是在2005年决定申请独立登记时开始使用的。教会意识到只有透过合法身份，才能够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守望教会不属于任何宗派，也没有一个教会传统的传承，但教会的路线倾向于改革宗的福音派，天明牧师形容教会是“摸着改革宗的墙，走福音派的路”⁷。因着这改革宗路线的影响，教会意识到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六四”事件使许多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承担理想破灭，但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信仰使他们重拾一份对社会及文化的承担。教会的牧者意识到，这种承担可透过教会这个共同体表现出来，教会需要发展成为一间成熟、健全的教会，才可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认为中国教会不能再自我边缘化，而是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的其他层面进行互动，把信仰更具体地落实到其他范畴中。

守望教会在实践公开化的过程中，需要作出很多突破，决定采取什么策略和途径本身已存在一定困难。这期间，教会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观，确认教会本质上“是什

么”，再定下一个共同的异象。在决定申请登记的时期，教会定下了要做“山上的城”及“灯台上的灯”的异象，意思是作不隐藏的教会，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群体的典范，照亮他人。⁸ 这异象在教会出版的刊物和报告中也多次强调，例如天明牧师在守望教会刊物《杏花》中表明，教会需要“从神学上反思并重新定位教会在这社会中的身份角色，也认识到教会自己有责任维护或争取其在社会中的合法权益。教会是‘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教会又作为‘灯台上的灯’，必须放在灯台上照亮这个世代，这是教会在决定登记前和推动登记的整个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的自己在这社会中的角色及使命。”⁹ 当教会面对重要的时刻，往往会在公告中重申这异象，例如在2007年11月6日的《关于两个堂会整合的报告》、2009年10月27日的《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建堂动员报告》、2009年12月1日的《特别的经历，特别的考验，特别的感恩》、2011年3月27日的《北京守望教会11年3月告会众书》、2011年4月的《北京守望教会户外敬拜问题解答》等都有提到教会如何一直朝着这异象走到当前的阶段。

因此，要确认教会在社会上的位置，教会要以宗教身份为经，政治身份为纬，这当中有一个整合的过程。一方面，教会要回到圣经里面看教会是什么，教会在社会/世界中是什么角色，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信仰群体（组织）。另一方面，教会需要透过法律途径确定教会是什么，教会没有合法的身份，便很难在社会上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影响力。不过，虽然教会的社会身份受宗教身份及政治处境所影响，但对于守望教会而言，他们的宗教身份是先行的，宗教身份认同应该超越政治、社会身份认同，即使没有合法地位，教会仍会建造一个合乎圣经的信仰群体，尽可能在公共空间中实践和表达其信仰。



纵使没有登记成功，守望教会仍然不断寻求公开化和合法化。例如，教会在2008年设立了自己的网站，网站曾被北京公安网监处定性为“基督教非法组织网站”并关闭，但每次被关闭后，教会都坚持重开网站。教会的聚会地点和时间、《杏花》期刊、讲道视频或录音等都可在网上找到。笔者遇过一位从加拿大回国的姊妹，便是因为看到教会的网站而来到教会的。网站不单是守望教会信徒互相沟通的平台，也是一个向外界公开教会信息的途径。

近年，守望教会也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2008年5月，北京市宗教局以奥运将近为理由，发起“基督教聚会点专项清理活动”，守望教会在5月11日被冲击。2009年，因为政府向房东施加压力，教会在

10月底搬离华杰大厦，后来在公园中敬拜亦受到阻挠。教会于2009年12月以2,700万元购买的写字楼至今仍拿不到钥匙。2010年10月发生的开普敦洛桑会议事件，被拒出国的家庭教会代表中有守望教会的成员。2011年4月，教会因为再租不到室内场所的缘故决定户外敬拜。以上一连串事件，都凸显了政府与教会的紧张关系，当中仍有亟待解决的深层矛盾。这些事件有不同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传媒的报道有助教会公开化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守望教会的牧者和信徒都因为这种矛盾承受不少压力，他们个人的日常生活直接受到影响，甚至要付出政治和社会代价。对于信徒而言，目前政教关系的局面，也驱使他们思想更多教会宗教、政治、社会身份的互动关系。

（二）会众的身份认同

1、形构基督徒的公共身份

由于家庭教会的宗教、政治、社会身份往往存在一定张力，如何协调宗教的身份与公共的身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在教会传递理念和转型的过程中，信徒经历了身份体认的转变，也要适应教会外在形式上的变迁。

对于教会在社会上的角色，受访的守望教会信徒一般认为虽然教会现时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社会上的声音还是很微弱，角色也很模糊，但实际上教会应该在社会上作盐作光、发挥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只停留在社会关怀的层面，而是以教会的价值观影响社会，包括对罪恶的事情发出声音，一位弟兄便认为：

可能最初是从一些社会性的、公益性的、爱心性的事业上去发挥影响力，在这方面让大家看到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群

体、从这个途径去更多地了解教会。但是教会肯定不是停留在这方面，因为教会最大的功用应该是在教会的组织意识和价值观念当中去发挥她的影响力，让大家听到这方面的声音，而不只是在电视剧里面传播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或者是某几个成功人士说应该成功化、要成功。教会应该告诉人人生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人应当认识上帝，教会能够慢慢地在这方面发出她的声音，而且不止是抛出声音，而是慢慢地让这种声音在社会当中越来越起到主导性的作用。¹⁰

他们认为教会同时要履行社会责任和福音使命，这是基于他们对教会本质的理解。教会同时具备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神的教会，另一方面是社会团体。而教会应该是公开的，让那些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可以认识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正如一位弟兄所说：

一方面教会是神的教会、属灵的团体，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我想最重要的责任还是福音的责任和使命，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和了解福音，这也是我们要往前走、争取公开化所需要做的，这样影响力才能够更大。另外教会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其实也要相应地承担社会责任，不管最后是不是能达到福音的目的，我们还是要帮助社会的一些群体，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也是教会的责任。¹¹

他们认为，这种社会上的影响，除了透过教会组织整体的行动产生，信徒个人生命的见证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每个人建造好自己的属灵生命，在自己的工作、家庭岗位上做好见证，作为一个个体去影响身边的人，这本身已是对社会一个很大的贡献。这种影响是从自身的小

环境开始，然后再影响整体大环境。而教会的一个责任就是做好牧养信徒的工作，这本身已是一个重大的工程，因为这对每一个信徒的属灵生命都有较高的要求，正如一位姊妹说：“教会更强烈地牧养到个人的属灵生命，真的能够让人站立得住，不会在这个环境当中被绊倒、不会在诱惑当中落入试探，真正每个人做好生命见证就是教会对社会一个很好的影响，并不是说教会打个旗出去喊个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是很庞大的。”¹² 而生命的影响，不只是道德伦理方面的影响，也包括带领其他人信主，让他们的生命也得着最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还是透过教会的见证、我们所表明信仰的价值观念来影响人的生活，这个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如果一个人能归入到基督的教会，有一个信仰来支撑他，我想无论他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必太担心。随着教会的扩大，将来在北京会有更多的聚会地方，有更多人信主，能真正影响到他们个人的生命、家庭，我想这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¹³

就目前中国的政教处境来说，家庭教会事实上只能够以比较个人的层面发挥影响，正如一位弟兄指出，教会“拯救这些失丧的灵魂，对这些问题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梳理，从灵命上、情感上把这些人支撑起来，然后这些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家庭当中，好像小火星，作一个好员工、好丈夫、好妻子，这些零散的作用现在基本上能够及到”¹⁴。如果有一天中国全面开放宗教，他们期望教会能够以教会的集体身份去做更多事情，其中几位都表示特别希望在大学校园里建立团契、举办福音聚会，这类工作是目前政府控制得比较严的，老师很难公开邀请学生到教会聚会，只能透过学生邀请学生。另外，也有会众表示希望透过文字、影视、网络等途径去发挥教会的影响，并使信仰和生活联系起来。例如一位法律学者主要的负担是透过

文字把学术研究和信仰的服侍结合起来：“写一些基督教信仰和法律相关的著作，和基督徒的法律学者交流能够起到彼此造就的作用，和没有信主的法律同仁交流起到福音护教的作用。”¹⁵

他们期望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信仰和传福音，因此对于教会争取合法身份和公开化，他们都相当支持。他们认同教会要做“山上的城”，做一个不隐藏的教会：“家庭教会所谓近乎于秘密结社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常态，我也不认为这种方式很好，她只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间不得已而形成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大环境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向一个民主化的方向变化的话，家庭教会应该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间，按照法律的框架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让自己的很多事情公开于社会。”¹⁶所以，他们也很支持教会申请独立登记，就如一位弟兄所说：

首先这是来自牧师的异象，我听他分享后我心里也有感受：这么多年来家庭教会一直是在很隐蔽的地方聚会。但是我是感受到，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社会在发展，教会也同样在发展，福音真的在中国要兴起要突破，就不应该继续是这种方式，而是更公开、更勇敢地站出来，并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有她的角色，就是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特别付出努力的。¹⁷

他们认为透过法律途径去争取教会的合法权益是很正常的事。不管政府是否批准教会独立登记，教会也应该做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即使最后没有被承认，他们于神于人都是无愧的。而且，总要有一间教会先出来做这事情，不管成功与否和代价有多大。无论如何，教会总要主动争取空间和维护自己

的权利，正如一位姊妹所说：“我自己是比较支持守望的登记，我觉得它是一种探索。为了争取更多的空间，一方面拒绝挂在‘三自’下面是为了争取到比较纯正和自由的信仰空间，再一方面能向政府登记也是给予自己的一种保护，毕竟处在地下的状态，真正不利的是这个教会组织一些活动会受到政府的限制，所以从教会发展上来说，我们也希望以合法的途径来争取到更多的空间。”¹⁸

他们认为家庭教会并不是反对政府的群体，也不认为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反对政府的行为，如果家庭教会和政府之间有冲突，那不是信仰本身的问题，而是政府对宗教的了解或定位还没有做好。而当政府的行为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时，他们会选择依照圣经的方式处理，因为教会的首要本质是神的教会。他们看到教会的健康发展，对社会和政府都是积极的因素，因为福音有助解决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正如一位弟兄所说：

首先我是觉得教会是神的教会，当初《使徒行传》中的人不让使徒们传福音，彼得也说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政府现在把很多的聚会定为“非法聚会”，虽然神给政府权柄，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坚持公开聚会的原因。教会的发展是对整个社会、政府非常积极的因素。社会发展中所凸显的很多问题，包括家庭、个人的问题，这个社会、包括政府并不能真正地提供解决的方法。只有在教会里面透过福音让自己的生命、包括家庭得到恢复。教会也开始更多地在社会中承担责任，包括去四川地震灾区，在北京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平安是非常有益处的。¹⁹

2、“守望教会”的集体身份认同

会众虽然很支持教会公开化，不过在教会转型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作出很多适应。包括当教会要从团契模式转换到堂会模式的时候，有些信徒最初还是很难接受，因为这对信徒之间的关系构成一定影响：“原来一直在团契里面聚会，大家在一起的关系就很近，来的人你都很熟悉。进堂会以后，一堂有两三百人，不是每个人你都认识，而且即便认识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给予你们交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就觉得：‘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原来不是挺好的吗？’这个阶段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后来大家慢慢都适应了。”²⁰

教会转变的速度，本身也可能令会众感到难以适应。当教会很快要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时，会众可能在心态上仍未有足够的准备，便要跟着教会往前走，一位弟兄便表达了这种感受：

确实变化得很快，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理清的时候，就要变换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状态了，……有些事情确实是没有反应那么快，而且准备得也不一定总是那么好。所以，可能教会走在前面，我们的想法还在后面，跟不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适应，就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问题：如果教会越来越大的话，那这个事工应该怎样去安排比较合适呢？也会出现很多新的情况需要适应，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很难会做得好。国外会有很好的、成熟的经验，但是到国内完全搬过来其实十有八九是不能投入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制度的建立上面，会有一些没及时跟上的地方。²¹

从个人的感受来说，这位弟兄还是喜欢教会规模小一点，不过当他考虑到教会整体

见证的需要时，他还是认同教会需要作出这些转变：“没有办法都这么自私，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还是大的更能够有效地发挥教会的作用。”²²而且，即使转型期间有很多仍未解决的问题，教会还是要向前走的，因为教会不能只在解决问题而不发展：“不能说：因为还有问题，所以我不能往前走，那没有办法，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就是带着问题往前走，慢慢地往前走，你的问题慢慢地解决。不可能停下来不发展，我们光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停下来，人都走光了，你的问题还没解决好。”²³

换言之，当他们认同教会的异象和发展方向时，就更容易接受教会的各种转变和理解当中所引申出来的问题。而且，虽然人多的时候个体被关注的程度会相对减少，但有些信徒还是比较喜欢规模较大和公开的聚会场所，这也使他们特别认同教会的转型，就如一位姊妹所讲：

任何一种发展方式都不可能总是很完美、平衡的。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这样的话教会很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个体受到的关注就会比较少，不过我自己是可以理解这点。因为一个教会她选择一个发展方向，或认定一个异象的话，她肯定要在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努力，如果没有百分百地照顾到其他任何的方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从居民楼到写字楼需要一些调整，但我觉得这个调整只是一个旧的习惯被冲破，到现在到了大的一个聚会点后，也是比较喜欢。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还是比较支持这个方向。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教会做多大多强，我觉得这个不是目的，而是说，希望在北京城市的环境下争取更多的信仰自由，这个是更重要的。²⁴

在写字楼聚会，使会众感受到他们的信仰是可以更公开的，所以过程中他们对教会身份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当他们在居民楼聚会的时候，往往要担心扰民，而且由于活动空间有限，容纳人数也有限，并不容易带新人来，即使新人来了，他们也可能因为教会的隐蔽性或太拥挤而不再来。一位姊妹充分地描述了在居民楼和写字楼聚会的分别：

在居民楼里聚会心理上不是太释放，就是觉得有偷偷摸摸的感觉，不是太公开。唱诗也不能大声唱，想带新人来就会担心能不能随便带新人来，比方想带同事、同学，因为环境有限、空间有限、容纳人数也有限，就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后来到写字楼里聚会相对来说公开化了，大家就觉得这信仰是可以敞开来地来说。比方说，我们当时在十一层聚会，上去的时候要坐电梯，很多人会问你：“你是干嘛的呀？”我们就侃侃而谈：“欢迎你们来，十一层，我们是基督教聚会，每个星期天都做礼拜。”就这样邀请他们，变得很公开化了。²⁵

另外，一些信徒认为教会堂会化后，可以将教会的资源集结起来，使教会的事工更有力量、更专业化，教会可以做的事情更加多和更加广，这都有助于教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当守望教会在各方面都越来越成熟，教会便成为一间很有代表性的家庭教会。传媒在报道中国家庭教会状况时往往会提及守望教会。2010年3月17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罕见地刊登了一则有关北京家庭教会的报道，题为“House churches thrive in Beijing”，内容讲述近年家庭教会的积极发展，亦附有两张守望教会崇拜的照片。会众对于自己的教会能够公开上报，而且是

国内重点媒体之一，他们都感到十分兴奋，并急忙把消息和网上链接告诉更多的人。当日笔者也收到守望教会一位信徒的电邮，从他那里得到这消息，他说：“今天的《中国日报》英文版居然出人意料地刊登了一篇关于北京家庭教会的文章，还附上了守望教会主日聚会的照片。弟兄姊妹都甚觉惊喜，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一消息告知更多的主内肢体分享。我想起去年你的来信及神学院众弟兄姊妹在爱心中的守望祈祷，所以也急不可待地要与你分享这篇报导。祈盼上帝在中国做更大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教会能够在社会上公开化、能够在公共空间中被承认是社会的一分子时，他们都感到是值得高兴的突破，并期望可以有更大的突破。

总的来说，守望教会的会众对教会的身份认同是相当一致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会有很清晰的异象和目标，能够有效地向会众灌输合乎圣经的教会观，也能够让他们了解教会在法律框架内应有的权利。

三、总结及反思

在守望教会及福音教会的历史中，两者都曾经因为一些内在或外在因素而被动地发展。今天，两间教会都展望能够拓展更远大的工作，不过囿于当前政教处境的限制，教会能够在社会上发挥的功能仍然相当有限。在发展模式上，福音教会关注的是生存的问题，注重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保护日常的“家庭聚会”正常运作；守望教会关注的则是冲破现时的局面，在社会上积极争取合法的地位以及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可以说，两间教会是在采取不同的途径来“合法化”自己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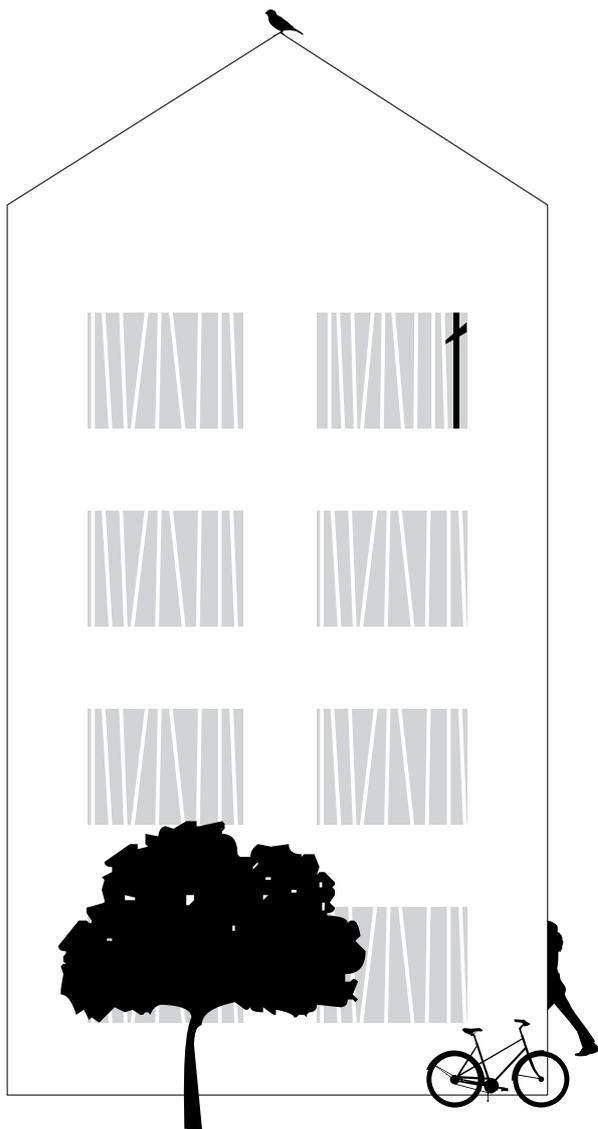
由于两间教会在核心理念上的不同，以及传递信息有效度的不同，两个群体的宗教、

政治及社会身份认同存在不少差异。可以说，教会领袖在信徒的身份建构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福音教会并没有把教会的公共身份放在当眼的位置，守望教会却不断传递公开化的信息，故此虽然两者都属于知识分子教会，但实际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守望教会在社会上有更可见的身份坐标，福音教会的身份坐标却相对地模糊。

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国家宗教事务局2011年工作要点》强调要“加强对基督教活动的规范管理，把参加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教群众引导到经登记开放的堂点里来活动，促进基督教活动的正常有序开展”²⁶，显示把家庭教会引入“三自”仍然是政府的一个方向，这是贯彻了1982年《十九号文件》的政策。当然，政府多年来也默许了家庭教会的存在，不过在“维稳”的过程中仍会对个别家庭教会进行打压。福音教会强调走植堂型教会的路线，其中一个好处是比较灵活。当遇到政治压力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更换地点或采取植堂的方式解决问题；走写字楼和堂会的路线，灵活性就相对受到牵制。

在中国“维稳”的前提下，地方政府防范较大规模的教会聚会是必然的事实。如此，堂会型教会是否是目前现实处境中的一个理想？植堂型教会又是否是更符合国情的模式？现时不少北京家庭教会都在写字楼聚会，其中锡安教会也有约800人聚会，亦有自己的公开网站。虽然教会在2008年5月也受到冲击，但教会近年受到的打压明显比守望教会少。由此可见，只要教会公共身份的彰显不被视为是对政权的威胁，政府仍然会局部地容忍家庭教会的活动。但对于赋予家庭教会合法的地位，政府显然仍未有足够的信心。至少，家庭教会合法化其中一个很可能的影响，就是对“三自”组织构成威胁，包括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动摇。

但是长远来说，政府若期望透过打压的方法“把参加私设聚会点活动的信教群众引导到经登记开放的堂点里来活动”，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许多是名牌大学）、极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三自”教会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宗教需要。正如梁家麟院长指出：“即使付出较为高昂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宁可参加瑟缩在民宅或办公室的家庭教会，也不愿意堂堂正正到巍峨宏伟的两会教堂；这个抉择，除了说明政府的开明和社会的进步外，也显示了公开教会与时代及民心脱节的严重情况。”²⁷



就如这项研究所说明，即使教会没有合法地位，并受到政府的打压，信徒仍然坚持在家庭教会聚会，这是因为他们认定宗教身份认同超越政治、社会身份认同。就算可以迫使他们化整为零，也很难“引导”他们转投“三自”教会聚会。

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适合所有教会，因为中国各个区域的不一样，城市农村的不一样，各个教会背景的不一样，都可以有比较好的模式和策略。“聚集与分散”、“写字楼与居民楼”、“自由与逼迫”、“理想与现实”，都成为了北京家庭教会探讨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对比词语。有人安于现状，也有人极力捍卫甚至争取更多权利。守望教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已明确表示不会后退，这是基于教会有一个相当清晰和坚定的目标理想。不过，守望教会的2011年户外敬拜事件亦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愿意为这理想/异象付高昂代价的只属教会一千人中的少数。在相对平稳的时期，信徒可以在公开的写字楼自由敬拜，也不需要日常生活中付上高昂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当遇到严峻的政治冲突时，就容易凸显群体内部的不同观点和态度。例如有部分信徒从没打算参加户外敬拜，因为他们根本不认同这做法或不愿付上任何政治和社会代价；有部分信徒虽然认同教会的决定，但他们参与了第一次之后，就不再愿意付上更多的政治和社会代价（有些第一次被抓之后已失去了工作或住所），于是便没有再参加；有部分信徒则仍然坚持每星期到户外场地，他们愿意不惜代价去争取其宗教及政治权利，这理想的追寻不一定在短期内见到果效，但他们愿意为这理想持续奋斗。从这事件亦可看到，即使有些信徒从未或没有再参加户外敬拜，他们是宁可分散聚会或到其他家庭教会聚会，也没有到“三自”教会聚会，虽然这当中有一部分信徒仍然要面对政治和社会压力（包

括收到有关部门的电话、受到公司或学校盘问等），但他们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这也进一步印证他们有强烈的宗教需要，而这种需要往往高于政治和社会身份的合法性。■

（本文选自作者博士论文中关于守望教会的部分）

- 1 笔者使用“雪球抽样”方式，在两间教会共深入访谈了5名传道人及20名会众，他们的教育程度全部是大专或以上，会众中有12位具硕士或以上学历（每间教会各6位）。此外，笔者也跟其他传道人和信徒进行了非正式访谈，亦参考了教会的文献资料，包括守望教会的《杏花》杂志及福音教会的《福音月讯》。
- 2 P05 访谈纪录，2009年8月27日。
- 3 P05 访谈纪录，2009年8月27日。
- 4 孙毅：“作山上的城——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一点思考”，《举目》第45期（2010年9月），24页。
- 5 孙明义：“对家庭教会寻求登记的神学反思”，《杏花》第3期（2008年3月），43页。
- 6 金天明：“推动教会登记到今天”，《杏花》第3期（2008年3月），41页。
- 7 P05 访谈纪录，2009年8月27日。
- 8 孙毅：“作山上的城——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一点思考”，《举目》第45期（2010年9月），24页。
- 9 金天明：“推动教会登记到今天”，《杏花》第3期（2008年3月），40页。
- 10 C23 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 11 C25 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 12 C22 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 13 C25 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 14 C21 访谈纪录，2009年9月3日。
- 15 C21 访谈纪录，2009年9月3日。
- 16 C26 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 17 C25 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 18 C31 访谈纪录，2009年9月9日。
- 19 C25 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顺从神，不顺从人”的经文出自圣经《使徒行传》5：29。
- 20 C25 访谈纪录，2009年9月7日。
- 21 C23 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 22 C23 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 23 C23 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
- 24 C31 访谈纪录，2009年9月9日。
- 25 C22 访谈纪录，2009年9月4日。守望教会的李小白牧师也描述得很好，他认为教会在写字楼聚会，能够在心态上给人一种成熟的感觉，亦可让人更认识教会、承认教会和接受教会：“我觉得在这几年当中，在这栋楼（华杰大厦）的许多公司啊，下面的一些工人啊，他们都觉得很正常。甚至他们帮我们开门，他们就当我们是社会上的公司，一个社会团体，跟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这就能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力。”P06 访谈纪录，2009年8月28日。
- 26 国家宗教事务局办公室：“国家宗教事务局2011年工作要点”（2011年1月24日），<<http://www.sara.gov.cn/xwzx/xwjj/7090.htm>>。
- 27 梁家麟：“从三十年改革后看中国基督教会的未来”，《鼎》第151期（2008年冬季），9页。

基督教救国情结对教会观的影响

文 / 孙毅

救国情结是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一种情结。即便是成为一个信徒，进入到基督教会内，这种情结依然存在，并会演变成基督教的救国情结。这是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国家一直所处的危机处境所决定的，对于生活在这个处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处境。

梁家麟先生在其《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中，曾简要地勾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情结。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一十年代对基督教的好感乃至鼓吹，包括陈独秀这样的人也积极地撰写文章来称赞耶稣的人格，是因为当时有相当一些人把救国的出路寄希望于基督教“人格救国”这个方面。而20年代所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反映出知识阶层已经意识到这种希望的破灭，基督教对于他们所追求的救国理想不仅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甚至带来一些思想上（与科学的关系）及现实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问题。而从基督教内部来反省“非基督教运动”，据当时一篇文章的概括，

“使基督徒产生两个自省式的问题：第一是‘基督教是什么？’（What doe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mean？），第二是‘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What is the place and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life of China？）”而就第二个问题的回应来说，侧重于如下两个方面：“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第二十二世纪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陷入绝望的困局中；中国人急于要的是国家的重建，及自强自救。在这个大方向之内，基督教有没有存在的地位，所占的角色又为何呢？”以及相应的本色化问题：“在当时中国人亟亟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那基督徒应站在哪一边？为了使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必须使教会脱去外国的性质；即是说，本色化的教会必须要建立起来。”¹

按照梁先生的看法，20世纪的中国基督徒对这个国家的关怀经历了由文化取向（Cultural oriented）到社会取向（Social oriented）的转变。就是说，到“非基督教运动”之后，精神重建及本色化的讨论已逐渐减少，中国基督徒已从本色化问题的关注转到对社会具体问题的探讨

二

方面，并且身体力行地开始从事一些实际的社会改良活动，包括一些农村改革运动，比如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徐宝谦的江西黎川实验计划等。有意思的是，按照梁先生的看法，参与这些活动的基督徒，“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种种看法，以至基督徒应有的行动，却主要不是受任何神学思想的指导，而是在实际参与中的体认和抉择，并且逐渐转变乃至确认他们的路向。因此，要分析他们的思想，单单追溯他们的神学渊源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在前面说过，中国并无真正的社会福音派一样。反倒我们要指出的是，正因为这些关连化的工作主要是回应性、要使基督教适切中国的需要，并且现实的考虑才是真正左右其行动的抉择，所以才产生严重的危机：缺乏自身的神学反省、信仰的独特性失去，甚至容易为外间的挑战所动摇。”²就是说，中国基督徒的这种社会关怀活动，与其说是一种神学理论在指导，不如说是一种内心的情结在发挥作用。当时并没有对这种情结进行反省，以上升到一种神学的理论高度，由此就可能带来信仰上的摇摆。

因此，对于基督教救国思想或情结，首先不是分析其神学的来源，甚至不是要去评价其出发点是对还是错，或者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倾向的问题；而是说，这种救国情结既是浸透在受教育信徒的血液中、思想意念里，我们就当去面对。首先要查看其各种的表现形式：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其次，再从神学理论上对其进行反思，省察其对信仰所产生的影响。其实，如果通过神学的反思，将其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使其产生的是一个恰当的影响，还是可以对其有所肯定的。从教会信仰的角度来说，如果救国思想或情结属于教会所当有的社会关怀或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构成了社会关怀的基本动力的话，那么需要面对的只是它与教会的大使命的关系问题。

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如果说基督教救国论以其显在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人格救国论”的提出），那也通常并不是发生在教会领域内，而是在某种基督教机构中。³在教会领域内，救国思想或情结通常是以隐性的方式产生其影响。

就第一代中国本土教会的出现来说，救国情结以其隐性的方式，成为中国自立教会出现的动力之一。“教会自立运动是中国信徒爱国救国的表现，他们相信如果教会在中国要成为中国教会，则必须摒弃洋化色彩，摆脱差会的管理，停止倚靠外国的供给，从而走向自理、自养、自传的目标——这是中国教会的惟一希望。”⁴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代本土教会带领者，比如说倪柝声的教会观，就多少可以看到救国情结以其隐性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谓隐性的方式是指，这种情结不是以一种对象化的直接目标表现出来，却可能潜在地影响了当事者的意念；并且，正因为不是直接性的目标，因此可能会与其思想中的其他观念产生不被意识到的冲突。比如就倪氏来说，其建立本土教会所具有的超宗派（非建制化）的教会观，基本出发点是要与西方差会教会区分开来。因此可以看到如下的思想逻辑：成为中国本土教会即意味着从西方差会教会中分离出来；从差会教会中分离出来就等于超越差会教会的宗派性；超越差会教会的宗派性就等于无教会建制（包括无专职教会牧师）。这思路与大处境中中国要从西方列强的控制下脱离出来的基本救国倾向是一致的。从这个思想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救国情结在倪氏这一代人的教会观中所产生的影响。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情结，在是否要设立专职牧师这个问题上，影响了倪氏对圣经的解释。在某些场合下，倪氏对不设立专职牧师的回答

是基于上述思路去解释的。首先，即如果设立了专职牧师，就是引入牧师制度，这就等于与差会宗派教会一样了。从这个角度他说：“按我个人所知道的，我们脱离宗派，是脱离了两样东西：（一）脱离了分门别类的派别，如各种不同名称的公会；（二）脱离宗派中主要的东西，就是牧师的制度。”⁵ 这里基本上已经确定，牧师制度等于宗派。但在解经上，为了能够说明上述思路在神学上的合法性，倪氏解释保罗书信中多处提到的，神所赐或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等经文，⁶ 则将其解释为：这些只是神所赐的恩赐，而不是职分。按照他的解释：“长老是使徒立的，是为管地方教会的。这就是宗派中所谓的堂会。但是，使徒不能立恩赐。使徒从未立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因为这些是恩赐，是神所赐的。”⁷ 这里解释的基本思路是将恩赐与（专职）职分分离，将神所立的与使徒所立的分离，从而与传统对这些经文的解释有所不同。其实这种解释存在着一些内在的难点（比如他认为使徒就不只是一种恩赐，同时也是一个现在仍有的职分）。我们很难说倪氏就这个问题对圣经的解释，与他已经确定了牧师制度就等于宗派没有关系。当然，即便这个关系存在，这个关系是非议题性的，即只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

在一种将本土教会与西方差会教会进行明确对比的处境下，强调本土教会对象派的超越，其实已经预示着某种对象派与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关系的看法，就是说，对象派的脱离也就意味着对其社会文化的脱离。我们可以在倪氏对象教会与世界或社会关系的论述中看到这个倾向，只是他的这种论述是以属灵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是对其进行了专题的反思。

例如，对于这个世界或社会的理解，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12：31关于“世界之王”

的经文入手：“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倪氏的解释如下：“因此世界这一个有秩序的制度，乃是由它背后的统治者撒但所管辖的，《约翰福音》12：31所记载主的话，说到这世界受审判，所指的世界并不是物质的世界，也不是指世人，因为以他们而论，审判尚有待于将来。这里所说受了审判的世界，乃是指这个紧密的世界秩序，撒但是这世界的创始者，也是它的头。”在这一段释经中，世界被理解为是紧密的世界秩序，并且以人类社会中具体的制度体系表现出来：“在人堕落之先，世界所有的只不过是地面和其上的人，以及地上的事而已，那时候的世界还未成为一个系统化的世界。因着人的堕落，撒但就趁机进入，照着它的计划，将地和地上的事，编组成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政治、教育、文学、科学、艺术、法律、商业、音乐等等，正是构成这世界的事。”⁸

因此，如果“得救”就是被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那么对于一个信徒来说，其与这个世界的合适的关系就是：“就我而论，世界已经



钉在十字架上。”具体来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已经颁布了命令，要关闭这世界。”⁹因此，虽然我们在一个行业中仍然维持自己的身份，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就如同你所在的学校将要被关闭，虽然你还可以在其中工作一段时间，但你已经不再把自己的前途与这个学校联系起来。这样，他不参与社会事务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有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基督第一次来，只救我们个人，没有对付这个世界和它的制度，也没有对付社会问题。”¹⁰

对于倪氏来说，他确实触及到了这个世界的消极层面，让信徒看到我们与世界的分别，看到被从这个世界及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特别容易陷入到世事之中的人所需要领会的。不过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将一种就个人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态度，推及到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其实将《约翰福音》中“世界”以及“世界的事”解释为社会中的机构、体制和文化，与主流改教家的解释有较大区别。这种解释很容易把这个社会中具体的机构组织、体制制度本身加以灵意化，即看作是撒但势力的某些部分。如果以此解释《约翰福音》中那三处“世界的王”的经文含义，就会让我们陷入到如下的逻辑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其看作是撒但所组建的体系而具有属灵的意义，因此是受到耶稣这次来所审判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对付这个社会的制度是基督第二次来的事情。

这样，就表现出救国情结之隐性存在的另一个特点：其建造本土教会的基本动力之一如果是脱离差会之宗派的话，其实也连带要脱离宗派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但自己所在的社会背景却并没有进入到反思的视野中。直到50年代的“三自运动”才把这种内在的张力显明出来。

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使得“地方教会”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三自运动”中一直处在摇摆不定之中。

在倪氏所写的“我是怎样转过来的”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转变：“人不能‘超政治’。尽管你说超政治，自然而然有一个政治观点托住你，像一个茶杯，有一个盘子托著一样。这个杯子是宗教，但你的盘子是什么盘子？那时我就恍然大悟，政府不是要问你的杯子如何，乃是要问你的盘子如何。”¹¹然而，倪氏尽管意识到人不能“超政治”，但他还是认为，地方教会虽然在宗教观点上已经“三自”三十年了，但是从政治的立场上看，“我们的‘三自’，连一天都没有起头。”¹²这就是他在当时内心中所承受的张力之所在，也是他的思想中没有被反思到的问题。

三

90年代后期，大量生活在城市中的知识阶层的归信，带来了城市家庭教会的复兴。其实，反思90年代的时代特点，概要地说，两个基本的因素是十分明显的，即80年代向世界的开放带来了一种振兴中华的热情；而80年代末的危机，对这种热情无情地扼杀，却造成了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及其人生的绝望。不过，借着知识阶层对基督的归信，其生命中隐含着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仍然以某种形态在教会中存留。在这个过程中，从“文化基督徒”到教会内的“有文化的基督徒”，其对中国社会的关怀也大致地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由文化取向的关怀转变为社会取向的关怀的过程。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身处教会中的维权人士，毕竟他们是以个人的方式参与这些活动，而他们所在的教会也不是城市家庭教会的主流。

对于城市主流的家庭教会来说，走向公开

整体的堂会模式，以此试图更为公开地进入到中国社会的主流生活之中，正日益显现是其基本趋向之一。如果单就教会的组织化，特别是专职职分的设立及相应章程的形成，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与上一代中国本土教会，特别是以倪氏代表的教会的一种冲突。但如果细看背后，却发现这一代城市家庭教会的教会观，就如他们的上一辈先贤一样，可能都有着与其所属时代的紧密关系。只不过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从差会教会的影响中脱离出来，已经不再是救国的主导表现。这一代人不再排斥宗派的观念，他们对教会普世性的看重，重于对本土教会与西方教会之区别的强调。辛亥革命百年后，这一代的人发现，无论是在信仰、道德、法治还是体制方面，中国社会重建都仍然是包括教会内信徒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使得具有公开整体性特征的堂会成为城市教会在其自身建造中所受异象的主导方面，就如脱离宗派成为上一代人所领受异象的主导方面一样。

在这个大处境下，对一些重要经文的理解多少受到了这个主导异象的影响。比如对“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¹³解释，不是侧重个人的见证，而是更加侧重一个教会群体作为山上的城，以其特有的群体生活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好行为来见证天上的父的荣耀。这样，强调公开性就把教会群体的见证性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同时，强调教会整体性也影响到对教会作为基督身体之有机性的理解，特别是对《哥林多前书》12章的解释，比如18节，“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反映出即便对于某个地方教会来说，这个身体整体的秩序亦有神的安排。正因为身体中这种秩序的存在，使这个教会不等于其中每个信徒加起来之和，而是整体（身体）大于部分（肢体）。因此教会建制不是可有可无，

而与教会之为教会的标识联系在一起：“教会的两个具有客观性的特别标识，纯正地宣讲福音、及正确地施行圣礼，是由教会的秩序来保证的，而这种教会秩序又是通过教会的建制体现出来。这样，教会建制就成了教会教义的一部分。”¹⁴

因此，城市家庭教会向公开整体化的堂会的转型趋向，从显在的层面来看，有其圣经及教会传统所提供的神学理念。但教会对其“公开整体性”的强调还是反映出这一代人所处时代的处境。在这种走向“公开整体性”的趋向中，把教会群体在社会中的见证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是否存在着某种救国情结的影响？这是一个可以提出并进行反思的问题。这里说到反思，是指构成这种趋向的显在目标或动力显然不是出于救国的目的，而是有其教会论思想的内在依据。但作为事后的反思，其中是否潜在受到了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救国情结的影响，仍然是可以反思的问题。其实，内在的动机是很难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考察的，研究者所能够作的，只能是事后根据其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再依据其所表达的，提出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来促进我们对自己及其教会的反思。

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家庭教会表现出的公开整体化的教会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事后概括的话，大致可以看出如下方面。第一，教会的公开化，使教会的大门打开，每一个想要寻求信仰的人都能更容易地进来，有利于教会的福音使命。第二，教会的公开化，在不加入“三自”的前提下寻求其独立的社团合法地位，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模式，以及中国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存在；第三，教会的组织化，通过设立教会专职职分与教会章程来给予规范，特别是全体会友大会对职分的印证，为这个社会中的社团自治提供了一种典范。第四，教会纪律的执行，促进教会这个信仰群体有其特有的生活方式，这在这个失去道德底线的社会，



起到一个很好的重建道德规范的作用。¹⁵ 第五，有一定规模的整体教会，以更大的投入力度或年度规划，可以使社区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常态化。

至少从后四个方面来看，城市家庭教会向堂会的转型与这个处在危机中的国家的社会重建，特别是在法治、社会自治与道德方面的重建，使中国社会向着公民社会发展这个大方向是相合的。当然，从显在的层面来看，教会发展趋势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其教会论方面以及相应解经上的支持，并非以上述概括出来的社会影响为其目标，不如说，上述诸个方面的影响是这个趋向的一种副产品。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是否要如上一代先贤一样，一直将这些影响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外呢？这种救国情结的种种表现，是否能在教会的使命与责任中找到其合理的位置？

其实，如果在神学上对其有所反思的话，我们注意到与上一代人的教会观不同的是，教会身份的双重性被突显出来，即她既是一个信仰的群体，由一群重生的或被分别出来的人组

成（上一代教会观所强调的），同时也是一个生存于现世的可以被人看见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这是强调教会整体性的一个引申结果，从某个方面看，突出了教会作为基督身体道成肉身的入世性。这里要注意的是，不是社会群体的组织性导致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有机性，而是相反，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有机性导致其作为社会群体的组织性。

就教会所具有的后一方面的属性而言，教会群体与社会不同领域中的其他社会群体，包括政府机构（如果我们将其限定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群体的话），在组织模式、基本道德规范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在神学上，属于神的普遍恩典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教会社会生活方面的实践，无论是较为民主的组织体系，还是更高标准的道德规范等，都可能成为社会其他群体可以效法的“典范”。这里隐含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如果这些模式或规范真正是对社会有利的，那么就应当并且也可以先在教会这个群体中实践出来。如果还没有在教会群体中实践出来，那么就不当以此去要求这个社会中的其他群体。

当然，这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模式或规范，不是为了给社会示范而成为教会群体的生活实践，而是出自其信仰的更高源头。但关键是，教会所信奉的这位神既是救赎者，也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护理者，因此按照圣灵对信徒新生命的引导，所活出来的体现人所当有的真正人性之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模式，当其被社会的其他群体所效法时，与一般人的生活乃至一般社会群体当有的生活模式不冲突，这是神作为创造者仍然在护理这个社会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个世纪的救国情结，这时不再是“人格救国”的模式，某种理想的人格或许可以影响个人，却不能影响一个社会群体；而是一种在实践中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的群体的

“生活模式”，如果其确实可以成为典范的话，就可以通过影响其他社会群体的方式来影响这个社会。

这样，在上一代人那里，单就信徒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中所突显出来的断裂性，在这一代人中，以教会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中所显出来的某种连续性而有所平衡。这并不是说教会群体之分别为圣的特殊性被消解了，而是在教会群体的双重身份中，诸如政教关系及教会与社会的其他关系成为被反思的议题进入到我们的思考之中。

当然，作为一种隐性的救国情结，对它的反思只能是事后的反思，目的只是提醒教会不至偏离神所交付的大使命，并给我们生命中难以摆脱的救国情结确定一个适当的位置。比如，就那些走向公开整体之堂会模式的教会带领者来说，可以反思的是，对于教会整体治理模式、教会合法的社会身份及其相对应社会体制的关注，是否甚于对教会中信徒个人生命成长的关注，从而导致了教会牧养方面上的偏差？或者，教会对涉及社会之普遍恩典的文化使命及社会关怀的关注，是否甚于对福音使命的关注？

不过，我们能够明确的是，如果教会将其文化使命或社会关怀放在教会应有的见证层面，即表现为对其他社会群体主要是通过“示范”而产生影响这个层面，¹⁶这就与教会的大使命并不冲突，而是教会所当发挥的社会影响，所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总之，本文认为，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救国情结在本土教会内主要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就是说，无论是上一代人的非宗派的教会观，还是这一代人所持公开整体化的教会观，都有其更为内在的神学源头，而不是出于救国的目的或目标。因此，这里

反思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否定上一代人非宗派的教会观，也不是要质疑这一代人要走的公开整体化的道路，甚至也不是要否定知识分子信徒的救国情结。而是在每一种不同的教会观与其时代处境的关系中，探讨这种救国情结的存在，并力图通过神学反思使这种救国情结摆脱其隐性非议题的状态，从而在神学上对其进行定位。可以说，每一代人的教会观，在某些方面不能不受到教会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影响。在这个时代，救国情结让我们在神学上不能不去思想的是：教会作为基督身体在这个社会中所具有的“道成肉身”的特征；认识到不只是信徒个人，而是教会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所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 1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06年，158页。
- 2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170-171页。
- 3 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讨论以“人格救国”或“爱国爱教”为显在目标的机构类型。
- 4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152页。
- 5 倪柝声，“聚会的生活”，《倪柝声全集》第六卷，253页。
- 6 弗4：11；林前12：28
- 7 倪柝声，“聚会的生活”，《倪柝声全集》第六卷，257页。
- 8 倪柝声，“不要爱世界”，《倪柝声全集》第五卷，401-2页。
- 9 倪柝声，“不要爱世界”，《倪柝声全集》第五卷，430页。
- 10 倪柝声，“不要爱世界”，《倪柝声全集》第五卷，497页。
- 11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72页。
- 12 邢福增，《反帝·爱国·属灵人》，72页。
- 13 太5：14。
- 14 孙明义，“加尔文教会观引发的思考”，《杏花》2009，夏季号。
- 15 孙毅，“对教会执行纪律的观察与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5。
- 16 游冠辉，“文化使命：治理，统治抑或见证？”，《杏花》2008，冬季号。

基督徒与争战

杰拉德·思策 (Gerald L. Sittser) 著 汪咏梅译



我所在惠特沃思大学的学生常常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描述为一场“争战”，与健康问题、家庭问题、突如其来的损失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怀疑争战。凡此种种的争战往往是预料之外、人们不希望看到之情形的结果。一个学生既恼怒又沮丧困惑地告诉我，她的父母正准备离婚。事态的变化并非她所选择，无疑，这也许最终证明是件好事，但绝非她所希望的。争战并非她自愿选择，而是被强加于她，我们面对的大多数争战可能皆属此列。

自愿选择争战，使自己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追寻一条使生活更为艰难的道路，这样做究竟是否正确？我们大多数人会立即拒绝这种观点，尤其是在涉及灵性生活的东西上。我们认为，基督教信仰应该使生活更美好、更幸福，对我们而言更容易，而不是更艰难；争战往往驱使我们走向基督教信仰，说争战来自基督教信仰，这似乎是错误的。

沙漠圣徒——4—5世纪，在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一带人数剧增的一群喜乐、奇特的基督徒——挑战我们去作别样的思考。

沙漠圣徒们认为，就灵性生活而言，争战是正常的、必要的，甚至是健康的。世界的堕落将争战强加于基督徒身上（例如身体的疾病、精神的痛苦、所爱之人的离世），作耶稣门徒的身份要求基督徒争战（例如，舍己），还有，基督徒必须选择面对争战。因此，我们不可能避免争战，也不应该试图避免争战。相反，我们应当欣然接受争战，视之为我们蒙召作门徒的一个方面，因为，此世生活的目标不是安逸、成功、富足，而是与神亲近、品格的成熟、对世界产生影响。争战证明我们对待基督教信仰的态度是严肃的，毕竟，耶稣自己也教导我们要舍己，每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万有之主。一位无名的沙漠圣徒曾经说道：人若认识一位阿爸（即属灵父亲、智者或导师，通常比自己年长一辈），和他在一起比自己作门徒会更有长进（尽管这种长进会使生活比较艰难），“他若不前去找他，便是不相信有神。”另一位著名的阿爸——苦修者圣马可（St. Mark the Ascetic）对争战作了这样正面的总结：“不选择为真理

受苦的人，将要经受更加痛苦的磨练，要遭受他不曾选择的痛苦。”

尽管沙漠圣徒肯定神创造的世界是好的，但他们同时相信某个东西绝对偏离了正道。罪进入世界，影响了一切——每一种关系、每一个机构、每一份职业、每一个人和每一种快乐。我们受邪恶力量的支配，无法控制自己。“世界、肉体和魔鬼”遍地游行，处处威胁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没有平坦道路可行，没有一种生活方式便利、舒适。在我们里面也没有安全，因为人生性悖逆、放纵、懒惰。虽然基督已经从罪中救赎了我们，击败了撒但，战胜了死亡，但他没有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神认定，人性受引诱和堕落之地也应该是人性得救赎和恢复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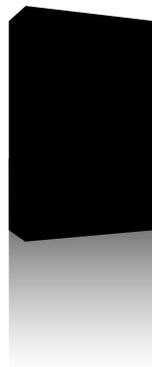
一场战争正在进行，旨在要求收回理应用于神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战场，人性就是最终的奖赏。自古有这样一种说法：

在我们软弱时，倘若没有神恩典的保护，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敌人狡猾的进攻，我们既无法熄灭也无法控制肉身中与生俱来的那团跳跃之火。在一切祷告中，我们都应当祈求神的恩典拯救我们，让灾祸不降与我们……因为，他使人悲痛，又将人救起；击打，又医治；使人降卑，又让人升高；使人失去活力，又使人恢复生气；领人到地狱，又把人从地狱中带回。

争战这一主题经常出现在《沙漠教父言行录》——那些伟大的属灵导师的教导集中。安东尼告诉他的门徒：“人应当将自己的罪举在神的面前，期待试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人艰巨的任务。”紧接着他又说：“拿走试探，无人能寻找到救恩。”苦修士中有一位年轻的学徒承认，他不断地与情欲的试探

争战。一位老导师问他：“你想要我求主除去你的困扰吗？”年轻人答道：“阿爸，虽然这是一场痛苦的争战，但我看到，我也从不得不背负这个重担中获益。”随后他又加了一句：“请您在祷告时祈求神赐给我长期的痛苦，使我学会忍耐。”老导师为学徒的智慧和勇气所折服，说：“我的孩子，现在我知道了，你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离开我，去吧。”波伊曼阿爸（Abba Poemen）曾告诉另一位属灵导师——矮子约翰阿爸（Abba John the Short）说，他祈求神除去他的激情。神回应了他的祷告，他的心现在已经变得宁静。因此，他对自己说：“我发现自己现在安息了，不再有灵与肉的争战。”约翰阿爸告诫他说：“去，求主在你里面激起一场新的战争，争战于灵魂有益。”又有一次，波伊曼阿爸说：“试探进来了，你当即与之争战，试探会证明你的实力。”他又说：“正如你无法阻止空气进入你的肺中，你也无法阻止[邪恶的]念头进入你的头脑，你的责任就是抵挡它们。”

（本文节选自《深井之水——基督教灵修思想史》第三章“争战”，本书将于近期正式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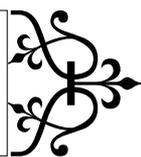


灵修心得分享辑录之一

编者按：为推动学生团契的弟兄姊妹操练灵修，建造属灵生命，从今年九月初开始，永刚弟兄推荐大家用慕安德烈的《在内室里》灵修。办法是每天默想一节经文，然后写下心得与大家交流。以下辑录的是三位弟兄的心得分享，内容包括生命更新、个人独处、以圣言为粮、恒切祷告、认罪悔改、强调爱心和委身信仰七个方面，似乎可约略呈现出敬虔派灵性生活的特点。本期摘录其中之一部分。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林后 4：16）



常新的生命

凡世界上的事，无论它多么绚丽夺目，蓬勃兴旺，它至终的结局总是衰残。但有一件事与这个世界的衰败逆向而行，那就是基督徒的内在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青春、美貌、健康，这些都要渐渐褪去。然而，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而且这种更新变化要一直持续到永恒里。

这节经文唤醒我们来关注我们内在的生

命。若我们每天都要花时间来整理仪容，或者强健身体，我们就更当每天花时间来检视我们内在的生命，在父的座前卸下重担和愁烦，在他的爱中洗去倦容和眼泪，又以他的话语作食物，强健灵命。基督徒啊，在你整理好衣装开始新的一天以前，请记得先满足你里面的需要，这会给你带来一整天的祝福。（永刚）

生生不息

一项对比，外体与内心。外体正经历毁坏损伤（being wasting away），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being renewed day by day）。这是使徒保罗宣教生活的写照。

如果没有内心生活，人活着就会像工具一样机械行事，像野兽一样靠本能行动。但人有

神的形象，是有灵的活人。他的思想、意念、情感是一个宝藏，一生的果效由此发出。

我们的内心有生命的泉源。就像井水，从井底常年涌出活水，井水才会是清冽甘甜的。我们内心的泉源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每天滋润我们的生命。这新生命每天都在更新

长大。按着它的本性、它的计划、它的时间，不匆忙，不着急。你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无动于衷，只是不要抗拒它，慢慢地你会发现它在它的带领下，自己正经历改变。而且，这更新改变是有方向的，就像向日葵种子会长出向日葵而不是月季一样，新的生命种子会结出新生命的果子。

太阳每天东升西落，夜以继日，寒来暑往，好像一直在简单地重复。于是人们以为世界就是按照规律而行，没有差错，没有意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只要遵循世界的规律就可以了，他的命运、人生、思想、

态度也应是这样，天人合一。其实不是这样，太阳东升西落，夜以继日，寒来暑往，好像是重复，但不是简单地循环，它们都在奔向某个方向。而且，靠着每日上帝的护理，它们才能继续往前奔走。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日常生活和工作好像也在重复，但试问如果离开上帝的慈爱和恩典，这一切看似平常的东西还能存在吗？因此，怀着感恩的心去欣赏，去领受身边的祝福吧。我们不要做死人，在死人的眼里，一切了无生机，都是死的。要做活人，看到清澈平静的湖面底下，有活水源头，生生不息。（祖潘）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



靠神的话而活

这句话再次提醒我们要关注内在的生命，人的肉体靠食物而活，而属灵的生命靠神口里的话而活。我们的身体缺乏了食物的供应就必定会饥渴、疲乏，我们内在属灵的生命缺少了神的话语也一定会软弱无力。而且供应属灵生命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供应身体的需要，耶稣在禁食四十昼夜后拒绝了魔鬼让他获取食物的建议，他用神的话语来坚固自己。

然而，我们不要以为靠着每天快速地浏览少量经文就可以坚固自己的属灵生命。口里吞吃食物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身体要从食物中

获取能量，就需要在胃里面长时间地去消化这些食物。所以，神的话语若只是在我们眼前闪过，就很难造就内在的属灵生命，我们需要长时间地去默想神的话，才能从神的话语中获取生命的滋养。因此，《诗篇》作者告诉我们说：“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诗1：2）

在这个忙碌的时代中，愿我们不要忽略这一件蒙福的事，就是每天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默想他的话语，你必因此得着极大的祝福。（永刚）

生命之粮

人活着不仅是能够呼吸，而且还要活出有灵活人的生命，就是神形象的荣耀。可是因为罪的缘故，人们在口腹方面花费了太多时间，却与神远离了，所以，世上有多少人真正活着呢？

神的话语对人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

是生命中的必需品，没有它的滋润，生命就不可能是健康的。不认识神，听不到神话语的人，或在灯红酒绿间醉生梦死，或在黑暗中四处爬行。拿着圣经的基督徒，眼睛和心思却在圣经之外，好像捧着金饭碗要饭的乞丐。看到这一切，不是令人觉得可怜可悲吗？（祖潘）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太 6：6）



进入内屋

内屋是一个人最安静、最自在、最隐秘、最安全之处。在内屋里，人不受打扰；在内屋里，人不受拘束；在内屋里，人袒露自己；在内室里，是最真实的自己。耶稣说，我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向父祷告。当房门关上的时候，不再有观众和别人的眼光，愁烦和急迫之事也不能再打扰我。我要安息在父深沉的宁静当中，当我注视仰望父的时候，他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如同暖流浇灌在我的里面，洗去一切的疲乏、伤痛和愁烦。在父的同在里，

喜乐、信心和力量都在慢慢地增长，以致人的脸庞也映射出父的荣光。

内室，是父为他所爱的儿女预备的施恩之所。在那里，有安息，有抚慰，有鼓励，也有喜乐。“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诗 73：25）天父的儿女们，不要再去各处寻找，也不要彷徨不定，请进入你的内屋，那是你蒙福的所在。（永刚）

珍惜相处

主耶稣教导门徒们祷告时不要学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喜欢在十字路口等公开场合祷告，故意叫别人看见。他要门徒进入内室，在那里与天父密契相交。

进入内室，暂时把自己与世界隔开。不用理会要求、责任、压力，不需要行动、挂虑、承担。进入内室，不仅是朝见满有大能的天父，而且是享受与美善圣洁的新郎相交。在他面前，松开紧握的手，打开关闭的心，向他倾吐爱意，享受着这份甜蜜和温馨。

进入内室，我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心跳得厉害，周围没有亮光，没有声音，我开始

感到不安。脑海里一幅幅画面涌现，还有不知从哪里跳出来的惊吓的声音。我感到害怕，孤独，不断寻找自己，渴望在黑暗中要抓住点什么，但是又碰不到。我将这一切带到神面前，开始不住地呼求，紧紧地依靠他。我知道他不会抛弃我，他了解我，知道我，以慈爱和诚实待我。我的心开始安静，放松，专注地思想他，暖流涌遍全身。

在这一切过后，我打开门，走出内室，整个人洋溢着幸福，看到天那么蓝，草那么绿，每个人都那么可爱。（祖潘）

花时间认识神的同在

这还不过是个开端，我必须花时间来认识他与我同在，并且祷告在暗中察看我的父，确信他知道我是如何渴望他的帮助和带领，也确信他愿意侧耳垂听。

来到内室，把世界隔在外面，与主独处。这是“进入内室的路”，然后呢？在内室做什么？

路易斯批驳三种内室里的行为。一是“自

己构想神的形象”，总觉得如果没有构想清楚，就没有与神同在，祷告也就失败。二是“调理心思去爱”，希望制造一种感觉来使神与自己同在，以为神同在与否依赖于自己内在的感觉。三是“完全属灵与生活脱节”。举例说，只为母亲不要世俗而祷告，却不为她的风湿病祷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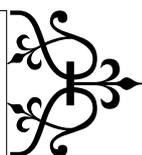
那么在内室里究竟做什么呢？就是花时间

认识神的同在。这种认识不是虚假地制造感觉，而是真心地相信神必垂听。不以信心来抓住神的应许，而靠自己用私意来制造感觉，在内室中是极其痛苦疲惫的。这种痛苦和疲惫使人厌倦祷告，并产生焦虑。

花时间认识神的同在，是因着信，借着祷告。“要承认你的每一件罪，也要将你一切的需要都带到他面前。要在基督的名里向父献上祷告。请记住，与耶稣有交通的祷告是不会徒然的。”（郭鹏程）



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 18：1）



恒切祷告

这节经文指出我们祷告生活里面的一个很深的软弱，就是常常灰心而不祷告。让我们静下心来想想：教会面临的极大的难处，挚爱的亲人还未信主，个人的婚姻或者家庭生活，工作或服事中的重担，等等。和这些迫切的需要相比，我们的祷告是何等地缺乏。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曾为此祷告，而是祷告一段时间后看不到什么结果就放弃了。

耶稣在这里设的比喻给我们两个提醒。一是提醒我们爱他人和爱自己的心都不够强烈，以致我们甘于这种暗淡的光景而不作为。我们比不上那个要求伸冤的寡妇，她为着自己的冤情常到地方官那里诉求。二是提醒我们在神面

前缺乏祷告的信心。教会的得胜，灵魂的得救，生活的需要和工作中的见证，这每一样需要都和寡妇伸冤的诉求一样正当。然而，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却比不上那寡妇在不义之官面前的信心。“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路 18：8）

我们要知道那坐在天上施行审判的比地上的不义之官更加公义，他比那不尊重世人的更有恩慈和怜悯。主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让我们把那些在灰心中失落的祷告都重新拿起来，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常常祷告。（永刚）

恒切祷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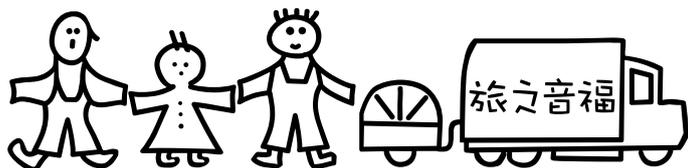
对那些自己不在意的事情，我不会向神祷告，即便献上祷告，也是沉闷和漫不经心的。能够让我恒切不住祷告的，必定是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可是，它的重要性也经常被遗忘，特别是过了一段时间它没有成就的时候。这时，我会怀疑它对我而言真的那么重要吗？恐怕是我求错了吧？哎呀，不要想它了，何必让自己担上这副担子不能释然呢？每当这个时候，我便选择放弃。

什么对我而言是重要的？有时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就信以为真。有时候是自己内心的声音说出的，可我觉得太难不敢接受。这一切

的困惑和怀疑把我弄得好惨，为了逃避这一切，我竟然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以为这一切就这样消失了。好糊涂啊，为何不向神倾诉呢？这一切的感觉不是有一位体察人心的主和你分担吗？一次又一次的祷告，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种真实的感受，理解它，更深地看到所求之事的方方面面，自己的看法和心意也被不断更新。想到这点，祷告虽然迟延未蒙应允，尽管一时令人灰心、难受，但在一次次的心意更新变化中，我更深地认识到我所在乎的是什么，我之所是，还有神之所是。所以，恒切祷告，总不是徒然的。（祖潘）

一家人的福音之旅

文 / 阿淘妈妈



一、

这次回家探亲，从一开始我们夫妻二人就有感动这是一次福音之旅，对我这边家人心里头有负担，要在一族人面前公开见证主的名。既如此，神一路上的带领和保守我们不能隐藏，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我们要诉说他的作为。

买票

因为起因和动机是神喜悦的，旅游旺季机票没有折扣太贵只考虑单程，所以想神一定让我们能够买到每天只有一趟的 T69 次火车票，但一个星期即使掐着点通过电话网络也没见到一丁点希望，拖到了爱人假期都快开始了，遂决定跟我们一同回去。这样严峻堪比春运的形势让人焦虑，遂祷告神：起头是你，求主成就，车票拦阻，求主帮助，荣耀归主。之后心思一闪，为何不试试不限车次的订购？拿起电话从新开始，果真竟然新开了一趟新的车次（事后知道 7 月 19 日开通了隔日对开 BJ-WLMQ 的 T177 次列车），我们竟然买到了 21 日的票，虽是硬

座，虽是不同车厢不同座位的三张，但感谢神，先上车再说。

21 日下起了北京著名的百年暴雨，中午出门已经瓢泼，孩子行李一堆还现买了个小孩躺椅，心中默念：神啊，求你让我们在北京站广场不要被淋雨，请你顾惜。到了建国门雨竟然停了。到了北京站过街天桥，犹豫了一下，爱人说让司机掉头，没想到 30 米的路堵了半个小时。雨随后开始飘起，我们立即下车狂奔，无奈，雨渐急，加之北京站的通关过程冗长，进站时个个已经是落汤鸡，夫妻斗嘴孩子无奈最后和好，焦虑燥热蜂拥上车，已是晚点两小时。起行争战端倪已显，与爱人分享，警醒祷告，求神保守。

换座

之前为此祷告过，所以相信主必定成就。但上车才发现境况比春运还骇人险峻，列车长声称给 100 万也无补卧铺可能。过道、卫生间、车厢接头处密布持站票的人，移动一下都困难。打听后方知这是临时用废弃车辆拼凑的，17 节车厢只有 4 节硬座，而且水管暂时没水，新

开线路磨合期所经小站无法补水，只有大站才可。

车出站 20 分钟，就无限期地停了下来。外面泼水一样的暴雨，车厢里面人潮攒涌闹哄躁动，历经穿梭之苦，我们竟然顺利换成了座位，仨换了一处三人连坐。因在接头处，对面是两人座母女，女孩跟儿子一般大，很投缘，最宝贵的是忽然一人犹豫离开，竟空出一块地刚好放下小孩躺椅。后来才发现 40 个小时路程竟走了 48 小时，若没有这样天机安排，我们断不能撑过去顺利到家。

路途

一路虽是艰险乏味，夜间众人虽是狼狈以至蓬头垢面，但竟平平安安没有任何差池闪失顺利到了乌鲁木齐。至今犹记进入吐鲁番站（还有两小时到乌鲁木齐）众人如死里复活般的生机复苏，那景象如同沙漠苦行绝望的人看见了绿洲。

之前有三个交托的祷告：

- 1、我们愿意公开传讲主的福音，求主预备族人人心；
- 2、为家人寻找本地适合的教会；
- 3、让孩子能够适应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没有抽水马桶的环境（他很纠结没有这三样，因为传福音的使命感他最终同意成行），我有点小担心。

二、

乌鲁木齐的变化让我们找不着北。哥哥驾车带我们周游了一圈，印象最深的不是乌鲁木齐到处大兴土木，倒是油改气的车辆满地跑，即使对发动机有损，但超高的性价比依然使这里的加油站几乎倒闭，以致个个油站门口都改加气的了。

羊肉免不了海吃一顿，第一天都是补觉，

然后寒暄家常，算是缓过劲来。

父母家里是一个城中村的小四合院，院中有一粒飞来的树种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因为早就说要拆迁的缘故，房子好几年没有整治，显得有些残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非常舒适，那种凉爽干燥、天高气爽如世外桃源般的味道让儿子兴奋不已。

全家福

因为时间安排的缘故，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家人全部聚齐。之前夜里我们仨为这次家族聚集祷告，求神开福音之门，求神预备人心，求神也坚固我们，不要退缩，最后商量还是爱人主讲。

小表姐因为记错时间，使我们在安排上有些纰漏。也怪我们不够警醒，给仇敌留了余地。后面再说。

哥哥来相馆的路上，车因违章被警察扣留等待处理，估计一时半会来不了了。好在侄子就是相馆员工，可以后期把我哥加上。中间小表姐着急要去上课，只好让她走了。

聚餐

聚餐很高兴很热闹，但因为忘了提醒侄子提前预约包厢，只好围坐在大堂僻静点的一张大桌，但来往人多依然不免嘈杂。我和爱人对视，信心和气势上就已打了折扣。尽管预想了可能的后果，但结果依然差点让我们不能承受。

默祷后，爱人开口，公开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公开我们的信仰，宣讲福音，大家一时愣住。父母在北京决过志去过教会，领教过，其他人虽也有闻但从没有这样直接面对福音的冲击。父母表情复杂，其他人惊愕、失望、陌生、狐疑、鄙夷、好奇以及不以为然的种种表情几乎瞬间击倒了我们。若是陌生人这样倒还罢了，亲人如此，当真立马几乎使我们放弃，何必破坏这举家团圆的好时光呢？再没有深入下去宣

讲福音的勇气了，我们很快调整转移了话题，说给每家都准备了圣经和为什么信耶稣的福音书籍，以后可以找时间单独谈。

大家也明白了，打着哈哈。父母从惊惧中平静下来。我担心父亲的心脏病发作，一下子就软弱了，泪水也不争气地咽了回去。

晚上我们祷告悔改，辜负了使命，胆怯退后了。之后里面很快没有了纠结自责，明天将有明天的忧虑，今天的就放下了罢。

异地相逢

竟然在乌鲁木齐遇到了教会4对夫妻，他们带孩子旅游顺便送LG长老回来探亲。异地相逢甚是惊喜，不免各自分享路途遭遇见闻，各等喜怒哀乐在主里同忧同喜，彼此互有得着，相信乃神奇妙的预备。

神回应了我们的一个祷告：

来之前托HL姊妹微博上寻找乌鲁木齐的家庭教会，很快就有回应。电话一聊，实在是太远，从城北到城南而且中间换车，对于七十多岁的父母来说有些困难。中间还去了民德路三自教堂，因内心不认同所以就放弃了，眼见无望，遂祷告求神为父母预备就近的教会。呵呵，这次聚餐招待我们的竟然是本地一家家庭教会的带领夫妇，中间交通无不敞开，顺提及此事，竟然也有预备。我们要经过两个主日，一次为父母，一次带米泉两个姐姐寻合适教会，不能耽搁。

为此我们感谢神！

第一个主日

父亲一听说要去教会就很紧张，托辞已经预约好周日要去看牙，妈妈是不忍我们失望就答应前往。

很近，四站地，一位老弟兄在车站接我们。那是一个老年人聚会场所，很安静，大家鱼贯而入，全是白发姊妹，儿子还好很安静。

人来齐了，没有敬拜没有祷告也没有寒暄介绍，一开始就是圣经经文联唱，我们都不会，只好跟着唱了半小时。一老姊妹开始讲道（可怜，我们竟然忘记了章节，妈妈中间竟然打起了哈欠）。六十多岁的老姊妹很敬虔，声音洪亮，但一口的安徽话我们都没有听明白。母亲中间有些不耐烦，我就祷告求神让她心里安静，随后她安静了下来。

讲完道，背完主祷文，大家再鱼贯而出，我们留下来分享。老姊妹很坚定地鼓励母亲再来，我也说了母亲未信的状况，介绍了我们的初衷和担心。老姊妹悉心安慰，愿意一同为母亲代祷，感激不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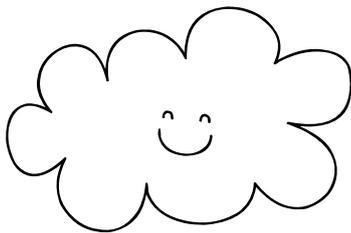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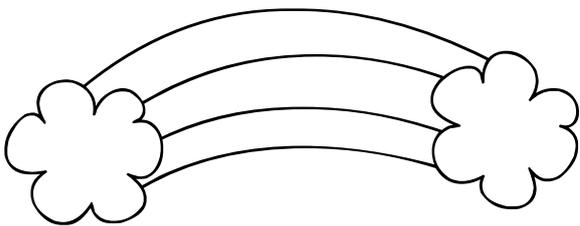
母亲一出来就告诉我们她不会再来了，我们不语，不再说什么。

但神是奇妙的神，这位老姊妹竟然认识米泉那边一个大教会的带领姊妹，而且愿意介绍我们带姐姐们过去。这个消息使我们从沮丧中振作起来，总还有要做的事，只管去做就是了，果效不在我们手里。

三、

家人团聚的整个氛围都在使我们里面的意志软化，家人都很珍惜这样难得的时光。我们也跟神祷告交托自己的软弱，尤其是每每做工没有果效之后常在主面前沮丧悲伤，为家人的刚硬，甚至找理由怕家人说些什么亵渎的话在神面前积蓄震怒而推脱，但，每每都被光照，晓得我们是被神拣选，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只管照样讲，没有谄媚没有贪心，也不是出于错误污秽也不用诡诈。既然明白不是讨人的喜悦，就把那伤心犹豫沮丧和迟疑一并带到神面前，他就安慰使我们再次得力，里面也知道无论怎样都得做完这工。

聚餐之后大家都极力避免这个话题，我们谢饭祷告和以圣经原则教导孩子不隐藏，



家人看着听着也习以为常。有时他们以为新奇，偶尔回应我们就见机传神的话，祷告中话语的力量和美感带动他们甚至也跟着说阿门，呵呵。

为二姐祝福

大姐二姐家都在米泉（原来是县，现在划归乌鲁木齐成米东区），每次回来都会去那边聚一次。大餐是免不了了，吃喝完男女各一处开始摆龙门阵。我不愿浪费这个机会，赶紧借着话题开始做工，局面看似很好，姐姐们不拒绝，有交流有回应，但提到是否愿意承认耶稣是主，她们都犹豫迟疑，不置可否。当作道理接受是没问题的，表明立场那依然是很难的。

想起之前几天她们抵挡之后在神面前的祷告，里面很难过很纠结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记得里面的回应：你为什么不为你二姐求个孩子（二姐结婚10年没有孩子）？当时记得跟神说：神啊，在我自己没有信心，但你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我虽小信但你不失信，求主给我这样的机会和感动，好叫我在众人面前有信心为你做见证。

现在里面忽然就想起了这个感动，于是当着外甥、两个姐姐说要为二姐做个祝福祷告，但问，如果神赐你一个孩子，你愿意承认并相信耶稣是你的主吗？二姐惊愕，但神情立马转换成渴求：愿意。我便说，在神面前许愿一定要还愿的。

其他人都很震惊，也管不了许多，拉着二姐的手就做了这样的祝福祷告。

里面祷告：神啊，孩子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愿主自己成就您的旨意，行那大而可畏的事，在众人面前得着称赞。

事后与孩子分享，竟然都不觉希奇，在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看来真是我小信了。

第二个主日

回程的机票是第二个主日晚上9点，所以周六就到了二姐家。

教会离二姐家很近，10分钟路程，聚会时间是早上8—10点，相当于北京的6—8点。在一居民区2楼，三居室，看样子是专门租来聚会的，已有同工迎接，看摆着的小凳，大概能坐四十人左右。

有司琴的，有服侍的，有主领的，各样布

置环境显示已经有相当规模了。

人陆续进来，老姊妹居多，间或有年轻的姊妹出现，两个姐姐就很激动。几乎没有弟兄，显得爱人特别打眼，于是我们选择了靠阳台最后一排。

赞美诗选用的是黑色封面本，都会唱，一曲《主是明亮晨星》旋律优美，两个姐姐唱得很是投入，窃安慰，我里面不住祷告。

熟悉的敬拜程序，圣灵的分别为圣与同在，敬拜过程相当顺利，我和爱人泪流满面也不顾了，两个姐姐好似已经平静了下来。

讲道的老姊妹是山东人，威严仁慈喜乐与平安汇聚一身，出场就有灵里相通的感动，看两个姐姐也是惊奇这样的老太太站讲台太不寻常。

但争战如影相随。讲道开始，旁边一老太太因哮喘开始不停地咳嗽吐痰，另一老太太开始如拖拉机卡壳般打起呼噜，这场景惊扰了两个姐姐。这让我很着急，立即与爱人开始祷告，求神安静求神医治求神赦免求神保守，很快，咳嗽和缓了，呼噜因为旁边老姊妹的不断提醒间隔拉长了。证道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感谢神，证道老姊妹真是神的仆人，释放的信息纯正，像那握有权柄之人的教训，条理明晰，细致严谨。感恩虽然这里异端流行，“三赎”遍地拉人，但这间教会乃神的所在，定意要将两个姐姐托付这里。

结束后与带领人寒暄介绍，彼此爱惜相通，里面如释重负。算是对主的托付有个交代，也不再因家人不信而纠结伤感、流泪，算是解脱了。

出乎意料，路上探询，大姐竟然听进去了，可二姐却刚硬抵挡，不发一言。

“神啊，我把她们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父啊，你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如同我们得救是一个神迹，愿主您的救恩也临到她们，你的大光也照耀她们里面深处，照着你的时间

你来拯救。”

哥哥一家和外甥

一致认为最难开口的是哥哥一家，为此祷告寻找契机。

一日全家人看电视新闻开始引出话题，谈到耶路撒冷的局势为何世界如此关注、谈到犹太人的聪明、谈到美国几次发动战争的动机、谈到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的深远影响等等。政治、历史话题是他一向感兴趣的，出自圣经历史的深刻解释对他可说是冲击太大，屡次他都有恍然顿悟之感，急切想要了解更多，一并都转到圣经的话语。一家人都新奇所听到的，哥嫂表示要回去看看圣经和为什么信耶稣，这一心头“大患”一除，我立即觉得轻松了很多。

外甥是大姐的孩子，21岁，和善柔和纯净懂事，这次回去一路上都是他出面安排照顾，孩子真是长大了。

中间几次他都在现场，对福音完全不排斥，愿意去教会，也巧，他朋友的妻子刚信了主，言谈中知道是在一家庭教会聚会，正好离外甥家近，虽知道他未必会去，但谁知道人心呢，神的时间也没人知道，我们总要勤力撒种铺平道路，使他成长的岂不是神吗？愿神得着这个孩子，我们也交托了。

回顾

身处其中的过程虽是艰难，但神悦纳了我们愿做的心，靠着他的恩典我们算是勉强做完了他的工，想到我们中间畏难几乎放弃，偷懒不够警醒，为做工没有果效忧愁以及在神各样预备和催促面前不得不继续前行的跌撞犹豫，我们不得不说：神的美意本是如此，神的名是配得一切颂赞尊贵荣耀的，我们算什么呢，你竟顾念我们？我的神我的主，我们感谢你。

6号凌晨回到了北京，飞机落地出来后扑面的热浪使我们有点措手不及。所幸 ZH 弟兄体贴接机，两点就到家了。热得不能入睡，奥运激战正酣，竟然看到了百米博尔特夺冠，这是一直不想错过的比赛，连这个隐秘的愿望主你都知道啊！

四、

福音之旅（后续）

暑假全家回乡探亲是带着负担回去的，结果家里人一个也没有决志，但返京前所有里面的负担都没有了。虽有遗憾，但灵里是平安的，知道结果都在神的手里。

约好秋天两个姐姐到京一游，拖了很长时间，以为已经放弃了，但 11 月初她们终于下定决心，来了。

奇怪，里面反而没有了暑假期间对她们福音的负担，只好告诉主：你感动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刻意不勉强，但暗暗地下决心，求神让我们活出他的见证。

相处之道

18 岁后就离开家，以后各有命运的安排，我们仨姊妹再也没有几日同处一屋的生活，这次对我们都是考验，但亲情总归是亲情，客气生分一下，大家都拿捏到了最合适的相处之道。她们常常惊奇我会干这干那，并且一开始我对她们的照顾使她们还需要适应一下，才知道 18 岁以前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一直是她们在照顾我，从来都是她们在保护我，这时，我里面有一刻非常感动和温暖，或者这就是亲情。

很快，日子就形成了规律，每天安排好行程带她们出去游玩。自己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但凡想到的都会安排，一个都不错过。她们旅游的风格还处在“到此一游”的心态，

所以，对我来说，只需要把她们与景拍得美美的就大功告成了。

警察与聚会

门口一到周六就有 JC，刚开始犹豫是否告诉她们，但相处几日发现这属多虑。她们对我们有绝对的信任和放心，祷告后也很平安，就告诉了她们原因，还有我们和 JC 相处的过程以及相互的态度。她们说，你们不怕我们才不怕呢。她们在周末观察我们与门外的互动交流，就新奇得很，认为这表明我们一家的思想进步和成熟。以后三周，她们完全不在意了。

时间就这么平静温暖地过着。真巧，有两周小组聚会忽然挪在我家，都是意外，还有主日的敬拜，她们都很大方地欢迎参与并款待大家，毫无阻滞障碍，事后分享也很仔细认真地倾听。曾想最后一周带她们去新树教会体验一下，但最终 JC 反悔没有同意，只好又在家一同敬拜。这中间她们一同与 DXZM 唱赞美诗一同低头祷告说阿门，平日里还从书架上拿些看得懂的福音书籍传记细细看过。没问过她们的感受，中间有一点抵挡是不想看福音光盘，也没勉强。一天，我很高兴很感动地看完了“我最好的朋友，耶稣”，就每晚上与孩子一同为她们信主祷告。我以为会就这样到她们离开，但神不是这么做事的。

本相

以为这样的和美应该可以让她们看到基督徒身上的见证，但家里的亲人就是仇敌，亲人也最了解我们的本相。这一点，神比我们更清楚。

一天，因为鸡毛蒜皮一点小事，和爱人竟然争吵了起来。之前已经有过一次不被察觉的针锋相对，因明白是争战很快就平息了下去，但这次的针锋相对是懂事的表现，

事后还是让我们羞愧难当。因为顾及两个姐姐的感受，所以关起门进了内室，但她们已经面面相觑。

本相的显露也让我们在室内当中毫无顾忌，因为事发突然和必须解决的急促，使得我们没有回旋的余地，争吵当中竟然显示了灵里的分歧。这是我们一直回避不谈的问题，很惭愧，我们自认为夫妻情深默契，却要借着争吵才能有灵里的碰撞，直到彼此责备争执，承认自己的本相，看到争战的实质，一同来到神面前悔改。之后我们开门出去，两个姐姐装做没事人一样。饭桌上，爱人郑重道歉，说到我们都是罪人，本相就是如此。话到此，两个姐姐说话口气像平常一样，竟然释怀完全没有一点芥蒂，让我们有点愕然。

决志

之后大家的生活平静简单而充实，她们尤其喜欢跟我逛街。日常基督主导的生活方式她们也都见惯不怪，很自然地听、接受，都很随意。爱人跟两个姐姐没有隔膜，她们天性热情，爱人温和随性，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儿子也很享受她们的照顾和疼爱，亲热得不行。

姐姐们在我家的最后一天，晚上的飞机。准备妥当了，我们如常在餐桌旁闲聊，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没做，就祷告交托后开口说：

“你们愿意做决志祷告吗？”

“决志祷告是什么？”两厢对视了一下，我说：

“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救赎，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神使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这个，那我……”她们讲了她们的顾虑等等。

“这个相信神会体恤，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神给你们前面预备怎样的道路，但他说过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

活，就必得救。你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吗？”

“愿意。”

“那你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表明你们的态度吗？”

“愿意。”她们没有犹豫。

“那我带你们做一个祷告……”

她们很平静，没有抵挡也没有其它情绪上的反应，很顺利地跟着我说完。然后我为她们做了一个祝福祷告，中间很释放，感觉到我们之间有那一刻流泪的感动。我心里暗自祷告我的神：我把她们交在你的手里了，那是稳妥的去处，求神永远不撇弃她们。

意外收获

神的祝福还不止如此，事后在与爱人的分享中才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神医治了我内心中最隐秘的一处伤痕。那一个伤痕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植入被封存，常常使我心生绞痛，使我不能在神面前完全地敞开，也不能完全谦卑柔和下来。但那一刻，当我明白神的美意之时，不禁泪如泉涌。

为着他一直的忍耐和怜悯而感谢赞美我的主！



爸爸妈妈 我爱您们

——基督徒儿子写给父母的信

爸爸妈妈，如果我在您们身边，我会拥抱您们，表达孩子对您们的爱。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的不懂事不成熟让您们生气伤心。今后不会有了，我要好好孝敬您们，爱您们，感激您们。

谢谢您们，那么地爱我。谢谢您们，为了我不辞劳苦、默默付出。让我可以走到今天。我也希望早日建立家庭，工作也能顺利，我会努力的，也请您们为我祈祷。主耶稣会听父母为孩子的真诚祈祷。我们应该会有新的房子的，也应该会有越来越好的生活。

我目前暂时不打算回重庆，希望能在这边确定对象，在这边先工作一段时间，今后再做打算。所以您们要照顾好自己，如果不照顾好自己，孩子出门在外也会挂心。

爸爸妈妈，我是基督徒，这个身份已经不会改变了。真的有神，真的有上帝，不然太阳、月亮、星星、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各种各样的人是怎么来的？我们也称呼神为天父，意思就是天上的父亲。人有生养他的父母，但是神是所有人天上的父亲。父母爱自己的孩子，照样神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老天不下雨，庄稼也不会有收成的。而耶稣就是这位老天爷亲自来到世界上，人们像迷路的羊，他来寻找迷路的人。信他的人就找到今后回天家的路。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个家，不是说人死了就完了，否则人活一辈子是很没意思的。

信耶稣的人这一辈子活得很明白，他们知道耶稣会再来，到时候审判活人死人，所以他们不做亏心事，诚实勤劳，做正直的人。

信耶稣了不等于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要了，耶稣希望基督徒孝敬父母，这样他会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有福气，在世长寿。即使有艰难困苦，我们也不会绝望和害怕，因为知道神是有能力的，生命是他在掌管，我们活着的这一口气是他给的。

我们家里有基督徒了，有信耶稣的人了，这是上帝的祝福。耶稣希望全家人都认得他。我也希望您们能够了解耶稣、相信耶稣。如果您们不信耶稣，

而我是信耶稣的，我们死后会到不同的地方去。信耶稣的人会去天堂，不信耶稣的人会被邪恶的、专门欺骗人的魔鬼骗到地狱。

我要为您们祈祷：愿您们有空的时候开始读圣经，神会使用圣经来对您们说话。愿您们早日认识耶稣。愿您们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愿您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每天都活得平安喜乐。

最后祝福妈妈 50 岁生日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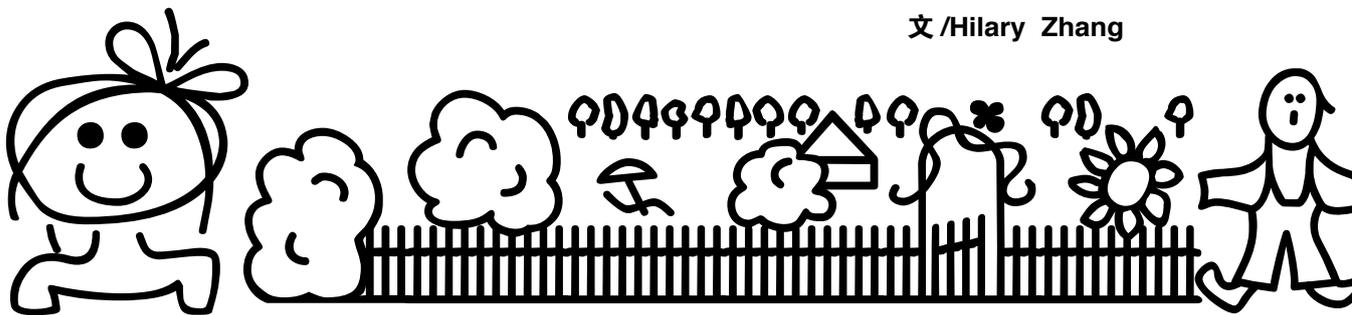
钟林

2012 年 4 月 2 日

PS：我母亲的生日是农历三月份，这封信是那时写的，准备连同生日礼物给她寄回去，但当时工作忙得一塌糊涂，再加上又谈恋爱了，以至于该送的礼物迟迟没有邮寄出去。2012 年国庆假期我和女朋友回重庆见家长，才把精心准备的礼物连同这封信给她。之前一个人回去充满了压力和压抑，而这次回去和父母在一起有特别美好的时光，感觉空气都不一样，充满了喜乐，两个人确实是比一个人好啊！我们也是带着使命和盼望回去的，希望能有机会给他们讲明福音，讲明我们所信的是谁。因为带回去了一个信耶稣的，我不再那么“势单力薄”了，呵呵，我们每次吃饭前都手牵手一起祷告，我们也邀请父母尝试着祷告谢饭，虽然他们还不怎么认识神，但他们的祝福和祷告很实在很真诚。有一次我妈妈准备完饭菜，还抢着说我来祷告我来祷告。我们希望能花几个晚上和他们在一起，好好谈一谈信仰和结婚的事情。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之前有一些计划和安排，我女朋友也拿出为他们精心准备的福音单张，给他们介绍我们信的神。那天晚上我爸爸很认真地说，他今晚要做一个决定，他的语气显得激动，他说他从今天起要相信耶稣，要去聚会，不再抽烟和打牌。他说他看了我写的信。他说他们看到我们因为信耶稣那么好。在我的记忆中，如此认真的说话是几乎不会从我父亲嘴里发出的，我太了解他了。那一刻，我的心里涌动出感恩和喜乐，神的时间终于到了，我知道他的心是被触动了，他的生命在被改变。之后，我们很神奇地帮他找到了附近的教会。我爸爸信主已经两周了，第一周去聚了两次会，周间去了一次。聚会的地方有些远，主日去了近一些的教会，聚会结束后弟兄姊妹们单独把他留下来为他祷告，回去太晚还挨妈妈“批斗”了。上个主日我太忙了，没有和他联系提醒他去聚会，但是他已经自觉自愿地开始去聚会了，他说他还带了一个找教会的小伙子去。很感恩。感谢神。（2012 年 10 月 22 日）■

关于加入少先队的讨论

文 / Hilary Zhang



一、讨论

从女儿进入小学以来我们家就开始了——一个讨论，这个讨论并不轻松。

其实，要不要入队，我相信基督徒父母如果仔细了解一下这个组织，不难做出判断（看官网介绍）。可是实际面对挑战，还是需要勇气和信心。下面分享一些我们的讨论。

1. 我为什么不能入少先队？

这是一个不相信有上帝存在的组织，你相信上帝吗？如果你相信，你怎么能加入这样一个组织呢？你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

（女儿……嗯，不知道，毛主席？#@&#）

你都不知道那是啥，为啥要时刻准备着为它奋斗呢？还做接班人？还在红旗下宣誓？

上帝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2. 为什么你们小时候能入，而我现在不能？

我们是长到二三十岁，绕了一圈弯路，才被上帝找回来的。你从小，或者说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在上帝的正路上，不用像我们那样转一大圈找啊找的，你比我们更蒙福啊！我们当然是希望你从小走在正路上，没有偏离，

但是你如果非要去外面转一圈受些苦，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3. 你小时候戴过三道杠吗？

没有，我小时候连一道杠也没戴过。（有个弟兄听到我们的讨论插进来说：我小时候戴过三道杠，你现在看得出来吗？）是啊，叔叔戴过三道杠，妈妈一道杠也没戴过，我们有很大的区别吗？那些名头真的重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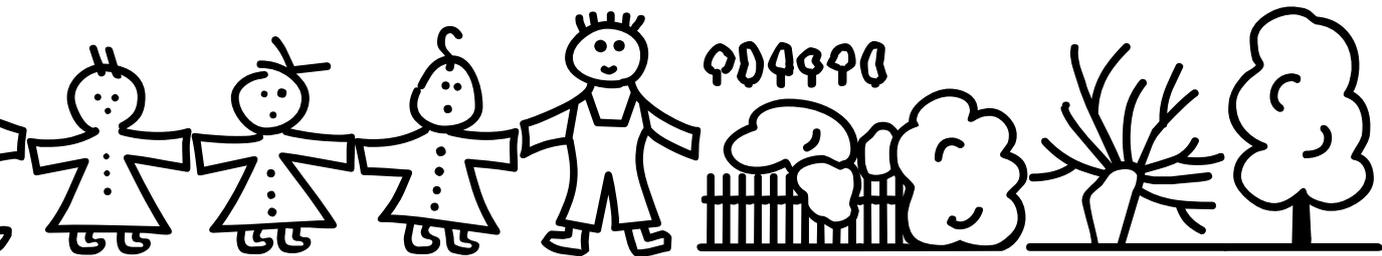
4. 那你考过 100 分吗？

我小时候倒是经常考 100 分，不戴几道杠也可以考 100 分的。而你长大以后，也不会有太多人关心你是不是考过 100 分。分数也不那么重要，只要你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就好。

5. 为什么某某姐姐、某某哥哥都入了呢？

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女儿在教会里认识的哥哥姐姐和伙伴们大多入队了，我们目前知道的只有 WZ 哥哥没入。三年级的 WZ 哥哥成了我们唯一可以咨询的“过来人”。

寒假的时候，我和女儿专门去咨询过 WZ 和他的父母。当问到他们当初是怎么处理的，WZ 爸说，他给老师写了封信，讲明了不入队的原因，老师表示理解，WZ 就没入。



我问 WZ：“如果不戴红领巾，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WZ 答：“如果班里有同学表现不好，老师会说如果怎样怎样就摘掉他/她的红领巾，我本来就没有红领巾，所以不受这个影响。”（这一个自由倒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呵呵。前一段吵得很热闹的“绿领巾”不会影响到我们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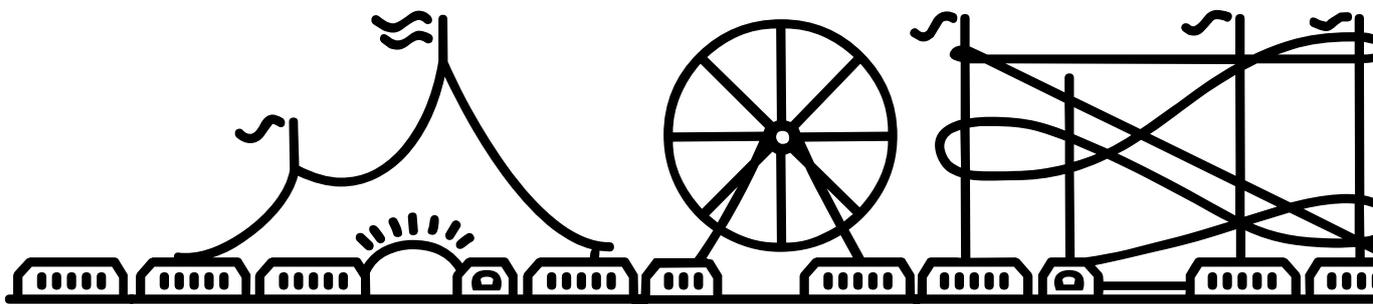
WZ 爸说：“我们有时也会担心，他会不会被孤立，老师或者同学歧视他，他现在是三年级，在学校里还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甚至他们开班会，比如少先队的活动，他也参加，但是有时候要录像就得带上红领巾，这样的话老师就让他去别的班，就不参加了。他很自然，也和我讲，在别的班就和别的同学一起上课或者写东西什么的。我也很关注也问他有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有些人还是热衷于做班干部什么的，但他不热衷也没有人歧视他，也没有人挖苦什么的，都没有发生过。和同学的关系都很和谐，似乎在他的这个环境当中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我看到的惟一的一个挣扎就是每个星期一的早上他们去学校的时候，要检查戴红领巾。原来是一个星期戴一次红领巾，因为有升旗仪式。从去年重庆唱红歌之后，有一个变化，就是天天都戴红领巾，但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进校门的时候有个检查，每个星期每次有不同的值周生、值周

老师，每次都要问‘你怎么没戴红领巾’，每次我都觉得他脸是红的，然后就说：‘我爸我妈是信基督教的，他们没让我入少先队。’每个星期我都很注意观察他，我发现每次都是这么一套词，每次都是这么一个表情，低着头，红着脸。但放学我再问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受，他也没有。就在那个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可之后就过去了。而到现在已经看出果效了，他们全校的人，值周老师、值周生都知道有一个人是不入队的，所以现在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有人再拦他，再问他‘你怎么不戴红领巾’了。”

经过这些讨论后，我们后来没有再专门提起这件事情。我不想给孩子太大压力，只有为她祷告，也请一些弟兄姊妹为她祷告。后来女儿自己提起过几次。

“妈妈，我们这学期的奖票得够了 xx 张后，上到最高台阶就可以入队了。”

女儿的学校实行小奖票制度，在各种活动或课程中表现好可以得奖票，表现不好会被扣小奖票。得到一定数目可以上一个台阶，把手里的奖票还给老师再重新挣，再一级级上更高的台阶。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时候，女儿挣够了几百张奖票，登上了最高台阶，那时最高台阶上的口号是“我是合格小学生”。而到了第二学期，追求的目标变成了“好苗苗，



早入队”。

“噢，这样啊，那你怎么想？”

“反正我也不入队。”她小声嘟囔着。

我注意到，这学期女儿很少让我帮她数奖票了。她是个乖顺努力的孩子，还是会得很多奖票，但是她对于奖票好像不是那么在意了。我会经常看到她的书包里或这或那会夹着一两张奖票，而不是像第一学期那样精心保管了。隔一段时间，她还是会跟我念叨一下她在第几级台阶了，下一级台阶要多少张奖票。我就简单回应一两句。奖票的话题就过去了。

“妈妈，我们这次五一的假期作业，除了口算和语练，老师说还要写入队申请。”嗯，要来的终于要来了。

“那你怎么看？入还是不入？”

“我不入。”

“你为什么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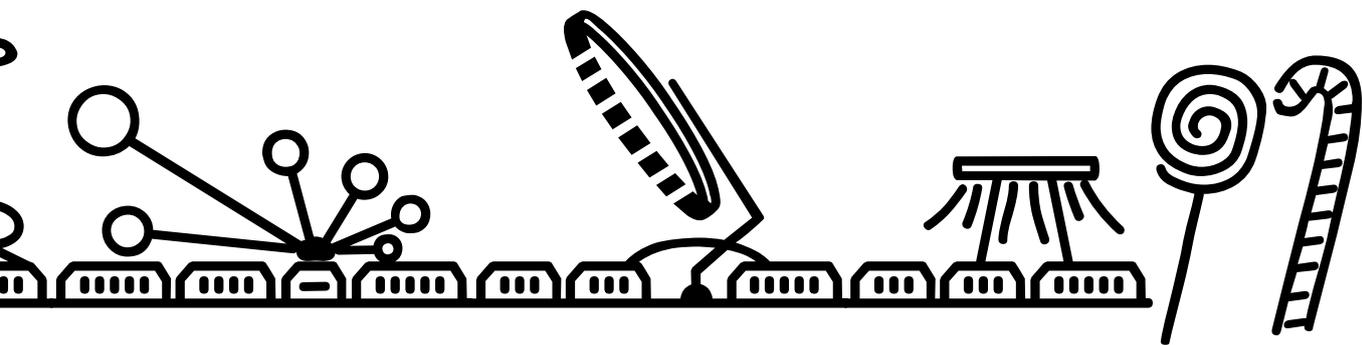
“入队是不合上帝心意的。”小人儿说得很轻。我觉得，对于什么主义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她其实并不很理解，但是她有基本的判断，也愿意顺服。

然后，她又聊起来将来如何面对大姐姐值周生检查的问题，从她的口气中我感觉那些不再对她是很大困扰和压力。等到实际经历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

宝贝儿，我们一起来面对吧！求神加力！

二、入队仪式

一年级下学期的“六一”节前，入队的问题正式提到了日程上，老师要求每个同学交一份入队申请书。我们在和女儿达成共识后给老师写了封信表达了不入队的决定。老师收到信后还是很惊讶的，在学校就找女儿谈话了，也马上打电话和我联系。老师的主要考虑不在政治和班级荣誉上，而是在于女儿的特例可能会使她在学校里受到压力，比如其他同学的想法和孤立，着装不同，一些活动不能参加等等，担心会对孩子的心理有影响。老师劝我再考虑考虑，我挺感激老师这样的好心。那时候我正好身体不舒服在家里躺着，我陷入了极大的忧虑中，为女儿将来可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非常担忧。有一阵仿佛有乌云压境的感觉让我非常恐惧。我只能努力祷告，求神来帮助我和女儿。这时我想起以往经历中也曾经有几件事是这样的感受，而当我相信神的带领而愿意交托的时候，发现神总是能带我过去的。我忽然明白了恐惧是黑暗势力在吓唬我，不必怕它。感谢神所赐的信心，就在那一刻乌云散去了。第二天我给老师回了电话，表明了我们的决定。打电话之前我还是有些忐忑，很担心老师的反应，谁知老师也就接受了我们的决定，还说会在后面注意保护女儿。真是感恩，我们也又一次经



历了神的信实。

六一那天全年级同学去某基地集体入队的时候，女儿请假一天。孩子爸爸带她去了动物园，她也挺高兴的。感谢神这一关又平静渡过了。

三、后续

真正需要面对的是后面每天早上进校门查红领巾。

我们没有要求女儿必须跟守门的值日生解释自己是基督徒，随她自己处理。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两次女儿进校门被值日生问，孩子爸爸刚好在旁边，就帮忙告诉值日生说：“她没入少先队，就没有红领巾。”在值日生错愕的时候，女儿就进校门了。听过这句话的值日生一般不会在日后再问女儿，换了新人检查就会再问。很多时候，女儿跟值日生对视一下，或者人家对她视而不见，就进了校门。有的时候她被叫住问，女儿就报上自己的班级。我们很感恩，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很好，不知道她是否跟学校打过招呼了，总之她告诉女儿如果因为她不戴红领巾被值日生记名没关系。女儿总是尽量不被值日生记下来，毕竟还是有班级荣誉感的，但是如果实在被问，被记就记了，有老师的话，她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在其他方面，女儿都努力做个好学生。同学们年纪还小，大

家好像对此没有什么反应。这真是像 WZ 爸说的，“有时候我们有些误解，我们觉得大人更成熟、更坚强。小孩不应该承受太多，其实有时候是误解。其实大人有时候顾虑更多，小孩子反而更简单。”

女儿的班里是全民竞选班干部和各种职位的。班里的各项事务分工很细，几乎是每个孩子都担任某个职务。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让每个孩子都有锻炼的机会，也都为班里的事情负责，培养责任心。老师并没有因为没入队而把女儿分别出来，所以她也参加了班干部的竞选。从一年级入学，不知因为什么女儿就被老师选做体育委员，负责喊队。二年级竞选的时候，她自己还是申请了体育委员。我问她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职位，她解释说班长和中队长都需要是少先队员的，就不申请了，其他职位中她只对体育委员感兴趣。每个学生准备了竞选演讲，然后由全班同学投票。在竞选体育委员的同学中，女儿得票最高，胜利当选。全班 45 个同学，女儿得了 33 票，我为神让孩子在学校里的小小见证很感恩。我们也很感恩神为她预备了很好的老师，很为孩子着想，让这个过程比较平顺。

在小学里面有关红领巾的挑战还有好几年，中学还会有入团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能一一去面对和胜过。■

他爱我，我深知道

——婚礼感恩见证

文 / 牧马人



一、

婚礼之后的这些天，应朋友之邀，多次播放婚礼现场的照片，同时也重温了自己成长历程的照片。起初，看的时候就是和大家一样有激动的心情，尤其像我这般自恋的人，就更是满足于此。但是，昨天再次和朋友一起看视频播放的照片时，心里的那种兴奋已然被感恩安静了下来。回望这几年与主同行的日子，就像翻转的照片一样，一幕幕将我带入圣子的国度。生命的回暖，舒缓而轻盈。

神完全破碎我对爱情的审美和骄傲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

当青涩的韶华渐渐离我远去的时候，对爱情的盼望由年少轻狂到四面楚歌，我经历了一

次又一次的软弱和跌倒，在无望之中我不得不把眼目定在那唯一的阿爸父身上，在无数次被撕裂又被缠裹后，我终于明白若不是出于神所喜悦的，我所做的尽都是枉然劳力！

每当看着朋友们携着家眷其乐融融的场景时，一种难以掩饰的忧伤瞬间便可以击垮所有堆积起来的信心。这十年里，我很少主动去接近某个男孩，但在亲朋好友们的热心安排下见面的男孩子至少也有二十几个，最终都是匆匆掠影。他们身上每一个被众人视为“贴金”的优点都不能让我为之倾心，理由就是没感觉！现在才明白我那时是在靠自己的感觉谈恋爱，这成了阻拦我走入婚姻的第一拦路虎。因为感觉这东西是那么地不确定和不真实，无形无影。我会在高高大大的人身上找文质彬彬，在眼镜背后找明眸，还会在浓眉之下找谦和；我会在书生面前找职场的睿智，在白哲面前找健硕，在沉静面前找幽默，更何况这个病变的社会让人陷入媚俗却浑然

不觉……

春节或是五一、十一长假的时候，本来是个可以懒散无束的长假，但对于大龄的姊妹来讲算是“囧节”。各种感受聚集而至，自尊与自怜交互袭击，不带一点余地，而且光景一年不如一年。原本在众亲朋间还有着一些好谈资，或是好榜样，却因着总也不出嫁的原故，多了许多晦涩的寒暄，似乎这个话题很轻松，但做作之举依旧难以掩饰。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过年串门儿，本是8岁的孩子却穿了一件3岁孩子的小袄，谁看谁问，越问越哆嗦，心里冷啊！这才是真正的“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满眼望去，人家的老公都挺好的，自己怎么找个人比登天还难！

信主后，WH姊妹和我说过：“好弟兄都是好姊妹打造出来的，你看着好的那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磨出来的！婚姻就是扒皮，一层一层地扒，一点余地都不留，有时会连血带肉地一起扒，会痛、会绝望，只有这样才能让两个人成为一个人，才会越来越像对方。若不是在主里，根本没有完全的爱，一个有神的家庭即使在毫无指望的时候，你也能过去，因为你不是对人有信心，乃是对神有信心！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拿去你个人的审美和偏好，神破碎你的时候也是你最接近神的时候。两个人走到一起就像两个泥瓦罐，神会把两个都摔碎了之后再糅合成一个！但是神又有足够的恩典会带我们过去，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奇妙的爱竟是如此地长阔高深……”这一席话我听了很多次，每次听的时候都会对自己心存怜悯，怕疼，怕经历那样的陶造，但我深知道凡他手所造的他都看为甚好。

信主的4年里，对于主内弟兄更是倍加小心，唯恐一个闪失便成了尽人皆知的消息，并不是怕肢体们好意的揣测，重要的是我可怜

的自尊会影响我瘦弱枯干的属灵生命！我知道人常常在跌入低谷中听从谎言的诱导，我胆小，所以我想选择捷径走路，那便是在神面前学乖一点！但婴儿的生命再乖也是不成熟以及缺少智慧的，我也曾经像只胆小的飞蛾一样怯弱地奔向自以为光明的火焰，用自我安慰的方式牵强地将很多事情理解成上帝的应许，被灼伤后躲在姊妹家舔伤口的情景现在想想真是神的一次磨练，让我一下子长大了许多。记得那时候我跟神有过的一些祷告：

“神啊，你得着一个弟兄的生命，要远远比我得着一个丈夫更重要，若是我的眼目看重一个弟兄高过你的话，求你将他拿去……”

天父，我怕疼，求你用安慰的灵温柔地对我，求你用安慰的灵托住我，让我不会跌倒！……

父啊，求你使用我的婚姻来为你做见证，若我的婚姻不能荣耀和见证你的恩典，我宁愿不要！……

阿爸父啊，谢谢你在幽谷之中让我看见你让我经历这些原来竟是为了如此爱我，谢谢你在我身边安排了天使，透过她的话语来自扶持我、建造我！……

神啊，求你挪去我的喜好，不要让我看重人的外貌，而是看重他有一颗爱你的心，让我完全顺服于你。若是你给我一个弟兄，什么样的我都要，我愿意顺服你的意思，我深知道你给我的一定是上好的，而不是次好的，我知道那些隐藏在背后的祝福是我所看不见的……

神啊，你怎样爱我也让他怎样爱我，让我在他身上可以感受到你的爱，求你赐给我一个荣耀你的婚姻，我希望我们的家成为祝福之地，我和我的丈夫一起来服侍你！……”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

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赛 44:22）

当面对家人百般催促的时候，我却非常释怀，很坚定地告诉他们：“我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而且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即使现在单身我也并不觉得羞耻，我很满足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遇到好的我不会再错过，因为我现在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我这么一坚持，反倒爸妈一哭二闹的电话不再打来了，和我一样树起信心来，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我想这也是信心胜过撒旦的诡计的结果，而我也不再觉得不结婚就是欠了所有人的债一样。神若给，我感恩。神若让我单身，那我就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快乐！

当自己真的将婚姻完全交在神手里的时候，一切悄然发生变化，远超过我的想象，我犹如迎着日头的花木，我的春天竟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

二、

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

Kevin 的出现就如同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样令我不知所措。我们是同事，来公司都一年多了也仅限于点头之交而已，他甚至都不清楚我姓什么，彼此都视对方如空气一般，可那双看不见的手在毫无察觉中翻转着他的心意。

去年的圣诞节，我和 Kevin 一起主持圣诞节礼物派发，为了使这个环节显得神秘而令人充满期待，我们一起将所有的礼物都编写了一首藏题诗，抽到礼物的人在拿到礼物之前还要和大家一起猜出这将是份什么样的礼物。那个时候我意外地发现 Kevin 的点子 and 文

采还都不错，整个会上我们配合很默契。餐会后他还送了一份精致的指甲剪护理套装给我，正好平衡了我没抽到大礼的遗憾。

圣诞过后春节将至，公司里的外籍员工们早已回国狂欢去了，办公室里显得很冷清，我的心情也开始极其复杂起来，开始搜肠刮肚地想怎么回应亲朋好友们的追问：“你也老大不小了，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啊”。我真不想回家过年，不如背包远行落个耳根清净，可我又知道若真是那样的话，老爸老妈的这个年就别想过了！这种压力是切实而无奈的。

就在我休假的前一天，Kevin 在 Skype 上问可不可以帮他包一份礼物。想想也不过是举手之劳，我也就欣然答应了。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他便把礼物送来。一看竟然是条丝巾，便开起他的玩笑来：“呦呦！丝巾啊，是送给姊妹的吧，送给人家丝巾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我能打开看看吗？”Kevin 显得特别不自在，而且很紧张的样子，忙解释：“不能打开，没什么，就是一挺好的姊妹。”我傻乎乎地笑着说：“放心吧，我一定帮你这个忙的。”于是，我便非常用心地帮他包起这份礼物来。边包礼物边为他向神献上满心的感恩和祝福，觉得一个弟兄终于找到自己心仪的姊妹了，是件多么好的事儿啊，真希望他们可以一起承受生命之恩。更希望那位姊妹在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会喜欢我的包装，会开心。

中午从背包里拿钱的时候，竟然发现我帮他包的礼物竟然躺在我的包里，如同一枚突如其来的炸弹从天而降，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少健康的细胞瞬间被吓死，心悬在嗓子眼儿上，火直从耳朵儿根往外冒，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加再上想起刚才和他开玩笑的那些话更是无地自容到连钻老鼠洞的心都有了，这可怎么办啊？我为很多人包过无数份

礼物，但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竟然会收到一份自己所包的礼物。在惊慌之中我不能清晰地思忖什么，我需要有颗定海神针把我这惊涛骇浪给平静下来，于是想到 ZH 师母，乘电梯至西环广场最高的楼顶上打电话给她。告诉她一个我一点也不了解一点也不喜欢的弟兄送了一份礼物给我，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还回去怕人家根本没啥意思，伤着了弟兄，以后上班惹得尴尬；若是不还给人家，怕是别人以为我就接受了。不愧是师母，面对此事 ZH 师母只是简单几句就让我从抵触情绪中平静了下来，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是：“哎，咱不再是 17 岁小姑娘了，有弟兄喜欢你也是正常的呀。再说了，人家没准就是觉得你不错，就是送一份春节礼物没那意思呢？你这一把东西送回去，不倒成了你多想了吗？你就大大方方的，看接下来人家怎么做，先别着急。”此话有理，受用。（事实是，她知道这个弟兄的名字后，就四下帮我打听弟兄的基本情况去了，她比我谨慎多了，当天晚上连发了两条提醒信息给我，那份小心的呵护让我很感动。）

他哪里不值得你喜欢？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弟兄一定是对我开始有了好感，光凭最近频繁地来我的办公桌找话说和不住地帮我解决一些问题的迹象就可以证明。两个亲近的姊妹不住地在我耳边传递信息，每次我都会矢口否认，内心深处我知道对于弟兄我充满了挑剔。之所以对 Kevin 所送的礼物大为惊慌的理由我也知道——他不是我理想中的白马，我们不属于一类人，甚至感到委屈。那个老我的审美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记得一次看着 Kevin 从水房打水回来，无意中看到他穿了一双很不入我眼的运动鞋，顿时心

里不舒服起来，心想：“我的另一半怎么能穿那么难看的鞋呢，我可不要。”这样的時候很多，比如：他怎么笑起来那样呢，我不喜欢！他走路怎么能步子那么大呢，我不喜欢！他祷告的称呼怎么那么长呢，我不喜欢！他怎么老招女同事生气呢，我不喜欢！他怎么可以拿水杯装粥呢，我不喜欢！他背的双肩包怎么那么难看呢，我不喜欢！……现在想想，我尖锐的挑剔莫名其妙而不可理喻，以前对他视如空气的时候觉得他还是位很不错的弟兄，现在开始注意起来却竟被我否定成这幅惨象。但这就是真实的我，别人眼中的小天使，内心中的小魔鬼。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波澜不惊，我表面上装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是视线尽量避开他，同时为了不让礼物对我造成蔓延性影响，我把它用一堆东西埋起来，我采取了温和而又坚定的否定态度。春节回家的时候，他在回家的火车上给我连发了两条长长的短信，我甚至看都不去看就把手机放回原处。我的理论是既然不喜欢就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其间 Kevin 还发了美丽的蓝色港湾的彩信，邀我一起去那边摄影，我还是拒绝了！

春节过得很纠结，撒旦趁机启动我自我否定的按钮，削割齿轮在心上飞速旋转。和好友聚会的席间，好友的爸爸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下了军令状，让我答应他来年再聚的时候必须是两个人一起来，我当时答应得是那样地心虚，仿佛看到了妈妈无比羡慕地看着人家儿孙绕膝的样子。我在心里也暗下决心，来年一定不让爹妈再为我的婚事操心了。我也试图想过能否和 Kevin 交往，但还是被我的个人审美给否决了。

他曾主动邀请我一起吃饭，我觉得敬而远之为上策，几次推辞了人家的好意。直到

2月14号那天上午，他将我叫到办公室一起分析各个主内书店的陈列风格，以及公司图书封面设计的优劣（当时我被临时转到市场部），话到尾声的时候，他问我晚上有什么安排，我那没心没肺的毛病在那一刻又开始发作，直接回答人家这个日子跟我没关系，下班没事直接回家喽！“今天，彩虹之约在搞活动，我认识那里的老板，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样你们市场部做什么活动可以和他联系，你刚到市场部需要多认识一些人。”他提议到。我转念一想：“也对，可能人家老板就只有在有活动的时候才在吧，如果认识一下说不定将来可以一起合作。”我的情人节竟被我如此没心没肺地给卖了。

那天地铁里的人多得像个巨型的沙丁鱼罐头，让人窒息，几经周折终于到了，到现在我依旧没搞明白那家店的具体地址。人不多，依稀还可以看到有空着的位子，当时我就在想：“怎么搞活动才这点人啊？还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现在才明白，人家是在情人节有活动，晕！）见事态不妙，有点直接想撤的感觉，但想着坐这么一大晚上车跑到朝阳公园这边来见个人、吃顿饭算是周折劳顿了，就这么走了不是比巴掌落在人家脸上还难看吗？稳住！稳住！借口去洗手间，那时候感觉厕所都是能救命的地方，我就在那里不住地跟神祷告：“父啊，我真的不想在这个日子和他一起吃饭，我怎么这么笨啊！神啊，我现在都想钻到马桶里不出来了，我该怎么办啊？”待安静一会儿后继续在父面前求：“今天晚上你是知道我的心思的，但是求你帮我，让我表现得不至于有失你女儿的身份，求你保守我们平平静静地吃完这顿饭。”最后感觉自己有些悲壮地从厕所里出来。表面故作轻松，实际如坐针毡地吃完了这顿饭。在送我回来

的路上，他又送了一个漂亮的洗漱包给我（因我总出差），并借机向我更直白地表达了想进一步交往的意思，我当即就给了“不太可能”的回应，并推辞这份礼物不能收，已经有了一颗炸弹还在埋着呢，不能再接受一颗更大个儿的啦！疲惫而带着怨气地刚进家门，便收到 Kevin 的信息：“希望你今天过得快乐，晚安！”我心想：“我一点也不快乐！”直接删掉！不为别的，就是没感觉。

正是这节骨眼儿上，正好又出现了一位让我心仪很久的异性打电话给我，凭着人的意思我觉得他正义凛然、风趣幽默、高大稳健、前途广阔，于是找来好友 Hope 做我的参谋，我们商量好一起祷告神，跟神说：“若我们给他传福音，他接受了，我就决定和他开始交往，若是传福音不成，就求你让我不再和他联络。若 Kevin 真是你为我预备的，那就求你让我的心思改变，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而不是错过你所给的祝福！”于是，那个周六我和 Hope 约了这位朋友一起吃饭，目的就是给他传福音，才发现拥有太多的知识也可以成为人的骄傲，把神拒之门外。因我曾跟神许过诺，若他不信，我便不会再主动联系对方。那个晚上我睡得格外的香甜，一周的焦虑不安像风吹过的影子一样没有了。

第二天早晨，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画面：我哭着求问神，我该怎么办时有一句话闪亮地在我头顶上方闪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 9：10）这让我一下子惊醒过来，知道神明明地将旨意告诉了我，两个人中一个是信神的，一个是不信神的，神提醒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神也透过《爱与罪——基督徒的婚恋观》这本书来提醒我，在这之前我自认为在择偶这件事上，我只会考虑弟兄，绝不会找外邦人，但没想面对



现实我依然忘却了当初的心志，还是想在刀刃上行走。书里有个小例子警醒了我，说一个人站在桌子上，另外一个人站在地上，上面的人无论怎么努力向上拉那个人，也很难把地上的人拉上来，而站在地上的人只要轻轻向下一拽，桌子上的人便被拉下来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去面对一个不信神的人在在我的生活中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好怕！更奇怪的是，当我在心里下定决心来改变自己，正视 Kevin 的时候，心里被大喜乐所充满，我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知道当我做讨主喜乐的事情时，他会给我怎样的确据和平安，纠结许久的心思，也在那一刻得了自由。于是，当天晚上给 Kevin 打了个电话。我觉得无论这件事成与否，别人喜欢自己并不是对方的错，他有这个权利。而做为姊妹，我不能总不给对方明确的回应，我觉得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有就是我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不明白神的心意之前，我不能替神做结论。

电话里我感谢他对我的关注，对于我们俩之间的事情无论最后结论怎样，都不要影响

到工作和同事的关系，因这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情是神的工作，我们谁说了也不算，我们都给自己一段时间去跟神祷告清楚，都去跟神求凭据，若是出于神的意思，会感动他也会感动我。能够感觉到，这个电话让他很惊喜。在一段诚恳而真切的对话之后，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做了祷告，就是在他的祷告中，我的心一下子被神摸着了，我能感受到他在神面前完全的依靠和深深的感恩，那一刻我竟然为这么一个爱神的生命感动得落泪了，这也是我对神惊奇不已的地方，他在翻转我！

生活依旧，只是我开始关注他的所作所为。他天资聪明，在公司很多事情上都愿意献计献策；他做事执着，很多别人办不了的事情他愿意坚持不懈；他积极勤奋，在公司决议要搬家的那一天起，直到装修、搬家的整个过程中，都是他主动帮着人事经理承担了很多重要职责；他性情温和，从进公司的那天起我没见过他有一次是高门大嗓地和谁说过话；他被称为“电总”，因为几乎公司所有人遇到的有关电子产品的问题都会找他解决……看起来他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不顺

眼，还是有很多可贵之处的。

记得妈妈很多年前就告诉我，如果一个男人身上有一点可夸之处，而且凭着这一点他就可以养家糊口，就把这个优点放大来看，削弱其它不好的地方，这个人你就能和他过一辈子了，就像当初妈妈嫁给爸爸，就看中爸爸勤快这一个优点了，妈妈和爸爸也真的就凭着这一点连滚带爬地把我们三个养大成人了。虽然日子过得很清苦但很快乐，每一碗里的食物都是他们一起披星戴月地干活得来的，但婚姻走过三十多年后，他们两个的感情就如同彼此缠绕的两棵藤，谁也离不开谁了。

神若不动我不动

为了明白神的心意，我跟神求了几个在我看来不容易的印证，若这些都被神所应允，我就顺服他的旨意。

1、神来翻转我的心意，让我不讨厌他，开始学会欣赏他，每天至少让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优点；

2、我极为看重的牧师和师母们不反对我们的交往，因我视他们为我属灵的父母；

3、所有在这件事情中所发生的事都不是我主动去做的或出于我的意思，而是被推着往前走的，因我怕跑到了神的前头，神若不动我不动；

4、我的属灵长者 WH 和小组长不会反对，因他们爱我如家人，并且众人都会祝福我；

5、Kevin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我的父母和家人不会反对，并且是祝福的心。

奇妙的是，这些印证神都一一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了我，并且都是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显明给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坚持一切是偶

然，但当自己真的回过头来在神面前祷告时，我不得不屈身于神，这一切都是父神在我身上所做的计划和目的，除了顺服我别无选择。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赛 40：29）在 Kevin 没出现之前，我跟神求婚的时候，还跟神说过：“父啊，你真知道你女儿的软弱，我学历不高，思想简单，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最好是位研究生，这样可以补足我帮助我；我希望对方的家庭是一个特别温情和睦的家庭，妈妈是位特别柔和的人，因听了太多不好的婆媳关系的故事，从心里害怕这层关系的相处；阿爸父啊，在城里这十一年里，我已经搬了三十多次家了，现在一想到结婚后依然过着这样的日子，我就会打冷颤，求你让我未来的另一半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安稳的家；阿爸父，你知道我现在根本不可能和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去交往，我希望那个人就在我的身边，这样我才有勇气去向前迈一步；在彼此的交往中，一定要弟兄先开口说出向着婚姻交往的话，不然遇到再心仪的弟兄我都不会先开口，我怕属人的东西太过浮浅。”果然，我上面所求的，神都一样不落空地给了我，他知道我胆小懦弱，就按我所欢喜的方式量给了我。在这里我并不是讲成功神学的祷告，神教我们要说出真话，显明公义。这是我和神之间最深最真实的述说，这样隐秘的事情除了神以外，我不曾向任何人说过，怕别人看我为太过属世，但我相信神有丰盛的慈爱，我的信心很坚定，因我深知道他爱我！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 1：17）在得着这一切印证之后，我是清楚神的心意的，但是老我依然在我的心里嘀咕，个人的顽梗悖逆常常会和神较量，告诉天父我受不了

Kevin 这个那个。记得那次办公室里的两个饮水机里的水都没有了，看到后我转头对着电脑默祷：“神啊，我可不想我未来的家里弟兄连水桶都不搬，这样的弟兄我不要！”其实“这样的弟兄”指的就是 Kevin。我抬起头来再看饮水机时 Kevin 的肩上正扛着水桶往上装呢，当时我被吓了一跳，我的父神真是知道我丝毫的心思意念，在我看来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这样明明白白地放在我的眼前。因为 Kevin 的座位是办公室最里面的，他根本看不到水已经没了，怎么会？神的信实如一个巨大的巴掌拍到了我悖逆的心上，我连忙收起手脚在神面前认错，他不是忽左忽右的神！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此时翻开圣经，神又一次将他的话语刻在了我的心版上，让我心生敬畏而感叹神的爱是如此辽阔高深，感念神的恩惠，落泪洗罪，不配啊我不配！

三、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太 18：19）

在我向大家公布我们的婚期时，祝福的电话和信息如浪花般向我袭卷而来，或许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单身的现实，就这么毫无预兆地将婚期宣布给大家，惊讶和感慨的心应该是并存的。其实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恍惚，在心里不断地问：“我真的结婚了吗？”一个人单身时间太久了，角色依然会有穿梭往返的时候。那时候，让我感动的是我常常在电话里听到这么一句话：“现在我不再为你求婚姻了，我们开始为你们的婚姻求祝福了啊！”是啊，

若不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不会想到原来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默默地为我的婚姻代求着。亲爱的们，真的谢谢你们了，你们的帮助和代祷对我们很重要，也许代祷的你我至今都未谋面，但是你们的功劳我都记在神那里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幸福是那么地真切。记得一天晚上，我收到张阿姨的一条短信：“QH，我祷告你的婚姻就要成了，你看着吧！”当时我还没有看到对方的影子，被她这么一鼓励，心也跟着美滋滋的。很多次，我无望的心都是被这些可爱的天使们拯救起来的。

婚礼的筹划和执行主要由我所在的清枫小组和 Kevin 所在的杏花二组共同完成，在准备的过程中，凡遇到的朋友都会问到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了，而我的回答却是：“我什么都没管，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帮着弄的，他们怎么弄我都放心，而且肯定个个比我还精心，买东西比我会省钱。”没错，我完全成了甩手掌柜的，小组的朋友们都说了，我的任务就是吃好、睡好、休息好！仿佛我成了婚礼的旁观者，一会听说 XQ 姊妹几个晚上熬夜坐在床上帮我们设计裁剪装饰用的东西；一会又听说哪个弟兄开着车帮着取回来现场用的物品；YH 姊妹和 ZY 姊妹为了能在婚礼当天做好完美的招待工作和伴娘任务立志锻炼修身；花童们的家长很多都是专门买来孩子们漂亮的公主裙和绅士服，最终呈现出来的由 18 位花童组成的强大阵容，惊起四座，令众人赞叹不已。当天还来了不少弟兄姊妹们做协助工作，跑前跑后尽心尽力，甚至有人连午饭都没留下来吃，荣耀归主名！这个过程，就像一个“爱心大联盟”，感动如翻滚而来的大浪不断包围着幸福的我，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若不是在基督耶稣里，我绝不可能想象有一天自己的婚礼竟是如此被祝福的。

起初，我们根本没有想过要办一场来宾超过三百人的婚礼，只是想请一些亲朋好友在一起有个小型而温馨的婚礼。谁知，消息一经传出不径而走，弟兄姊妹们和很多朋友们都主动要求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人数的上限一再被突破。最后，我和 Kevin 一致决定，若有朋友参加，我们一概热烈欢迎，尤其是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主动报名参加。我们更是有了新的感动，不信主的朋友来得越多越好，这是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最好机会。于是，我们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宣布，若有非基督徒的朋友想来，就可以带他们一起来，并且我们会专门准备中餐给他们，以便一对一地传福音。这事是神借着我们的手来亲自拓展他的疆域，我们又有何理由拒绝呢？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 55：8—9）之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大规模婚礼的计划，主要是因为我们俩的经济都不是很宽裕，为了不想给两个家庭增加额外的负担，我们觉得婚礼不在大小，只要有神的祝福，有牧者证婚就够了。当最后确定来参加婚礼的人数时，我和 Kevin 都非常吃惊，看来这次是真的要凭信心了！我们的神真是降甘霖的神，他比谁都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没想到 Kevin 的妈妈和哥哥给了我们一笔钱，这时候更明白神的那句“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深刻含义了，感谢神赐给了我们如此相爱的一家人！

失而复得的婚礼场地

婚礼的前一天上午，婚礼场地的值班人员告诉我们第二天的场地不能用了，借口是音

响设备出了问题。同时对方还明确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结婚要去三自教堂，在婚礼现场不能挂十字架，不能有牧师证婚，不能唱赞美诗，不能按宗教仪式来举行婚礼，这明显是被有关部门告知的结果。一时间，我们都很气愤，有些不知所措，我的第一顾虑就是怎么向双方的家人解释这件事？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能理解，可是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怎么看我们？只留给我们半天时间，我们去哪里找能容纳三百多人的场地，即使找到这几百人又将怎么去通知？预先在酒店订的酒席都已经备好了，若是人都不去了，又怎么向人家解释？这一连串的难题一下子让我有些发懵。稍做镇静后，我怕 Kevin 着急，安慰他说：“没事的，我们的神一定不会不管我们，你别着急啊！”弟兄表现得很镇定，虽然也生气，但依然有理有据，不慌不忙地和对方协商，若是换作我一定没了气量，恶言相对了。电话里，他毫不妥协地告诉对方，挂十字架、唱赞美诗、牧者证婚、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底线，任何人都不可超越我们的底线！

中间 WH 知道这事后，打电话问鲜花是否还订（因为若没了场地，花无处可放）时，我直接就回复她说，先不订了，等等看情况再说。可是 Kevin 听到后，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要订，而且一个不少地按原计划来订，若是场地不让用了，那就摆在大厦下面，若是大厦下面也不让摆就直接放在马路上，一样照常举行婚礼！”看到弟兄在这件事上站立住了，我更是不再惧怕什么，反倒比平日里更钦佩他几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弟兄！

这个时候，奇怪的是我由气愤、慌张一下子平静下来，我想除了弟兄的担当与遮盖之外，神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深信他一定在毫无指望的时候给我恩典和祝福，对于明天的婚礼我

深知谁来掌管！这事让我们摊上了，就勇敢面对。做为守望人，我们知道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在弟兄姊妹们身上已经上演了太多诸如此类的事情了，今日如此并不为奇。这又让我想起那个在神面前的祷告来：“若不是为神做见证的婚姻，我宁愿不要！”

“好，这就是见证，我要为神而做。当想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对于如何面对家人、朋友、酒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都可以轻看且放下了。若婚礼也可以当做活祭献上的话，那我们就全然献上了！”此消息在微博上一经发出，便引起了众弟兄姊妹们的关注和转发，由此也得了很大的力量和安慰，让我们感觉到教会一家人的温暖，更激起我深爱弟兄姊妹们的情感。

情急中想到了天明牧师，电话打过去讲明原委后，我能从天明牧师讲话的速度和重复的频率上感受到他为此事着急的程度，他让我们等待一下，他会帮我们想办法。等待的两个多小时里，其他牧者也打来电话特别安慰我们，怕我们着急，让再稍等一会儿，有了牧者的帮助，我俩一点也不为此着急，心里知道神在做事，我们只需听命罢了。大概在近2点左右，牧师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他和有关部门说好了，这次就这样让我们用了。此时，我明显听出来，由开始着急的语气，到现在平静嘱咐的语气，他作为牧者的心中承担着多少不容易啊！

场地失而复得后，一些当初没能通知到的弟兄姊妹们第二天也纷纷来到婚礼现场，那是一种凝聚的力量，一种义举！当天，本来被有关部门告知不能来参加的冠辉长老、袁灵传道、佑伟执事，以及三位师母都来了。“金牌司仪”袁灵传道主持，冠辉长老做祝福的祷告，袁大同老师证婚，强大的诗班献唱，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外，真是耶和华祝福满满啊！

此刻心中涌起《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这首

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的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

后记：若真是要记录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作为，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给予的无限帮助，再怎么数算也说不尽，以上所提的这些仅仅是我粗糙地罗列了一下，实际上神的恩典每天都在，感动从未离开过我们，尤其是那些默默爱我、关心我的亲朋好友们，我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们，在基督里我深深地向你们表示感谢。愿神的美意和计划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身上成全，阿们！





从神来的爱与恩典是我们服侍的动力

文 / 小雪

一、从神的爱来的力量

最近有一个节目很火，不知大家看过没有？就是《中国好声音》。确实值得看一看，尤其唱诗班的弟兄姊妹应该多看一些音乐方面的东西。这个节目播出第一期我就听到我的同事在议论，认为可看，我回去在网上看了，果然就吸引我了。那些选手的唱功固然很不错，4位嘉宾更有看点。最主要的是，这个节目是拷贝丹麦版权，严格地按照原版权方的节目宗旨，传递出来的理念是我们那些本土电视选秀节目不可同日而语的。举个例子，最后阶段的淘汰赛，庾澄庆组的哈尼小王子被淘汰出局了，他下场之前说：我还要坚持唱下去，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打压我的人看看，我是打不倒的……等等。这时候我没想到，那英截住他的话头说：等等，我注意到你在第一次上场唱歌时就说了这些话，你唱歌不仅是给那些瞧不起你的人唱的，不仅

是为了证明自己才唱歌，你要享受唱歌的过程。我原来一直觉得那英有点东北大姐，没多少想法，结果我错了，四位嘉宾中只有她勇于指出小王子的误区：仇恨虽然也是一种动力，催促人成功，但是却不能支撑永远；唯有爱的动力才能使人走得更远。而且仇恨的力量在使人成功的过程中会扭曲人的心灵，唯有爱的动力不会伤害人，只会造就人，成全人。

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会面临这样一个过渡期，旧的动力源消失了，过去督促我们努力奋斗的那些动力：成名啊，挣钱啊，更高的位子啊，房啊，车啊……都是浮云了；但是新的动力源又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变得似乎更加空虚，干什么都没劲，什么都不想干，真是虚空啊。

记得当年我刚信主不久时在北大团契聚会，团契中不少是北大的学生或老师。当时北大发生了一起食堂爆炸案，消息传得很快，

当天就传遍了。晚上正好我们小组查经，是在一位北大老师的家里。那位老师说：白天，他们教研室的老师们互相比较，看谁得到的问询电话和呼机短信（那时还是BP机大行其道的时候）多。他说：“我想，我怎么都会比你们多些吧，我团契里那么多弟兄姊妹呢。没想到你们一个也没给我打电话。”当时我听了这话可震惊了，是呀，要是搁过去，我早就搜索我认识的北大师兄弟们挨个打电话问候了，现在我信主了，按说应该更有爱心了，怎么我反倒没有想起来呢？这信主越信越冷漠麻木了不成？我可痛苦了。当时我的团契带领人还安慰我说，你是有信心，相信我们有神保守都平安。我心说，哪儿啊，我压根就没想起他们来！

很多年以后，我在教会慢慢学到了很多，包括心理辅导方面的一些知识，才明白：在我信主之前，我对人的关心不是出于爱，而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有爱心，是怕别人不搭理我，不需要我。我需要别人夸奖我是个好，需要在别人的称赞中才能确立自我价值，关心别人只是我确立自我价值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与爱无关。就像我给乞丐一块钱，只是为了买我的良心平安，与那个乞丐是不是真需要钱、是不是个骗子无关一样，骨子里我仍然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而当我信主了，我开始卸下面具，不再从人的评价中寻找自我价值，也就轻看了人的评价时，我的那些所谓的优点荡然无存。这才是我的本相，我的里面没有义，没有爱。

再后来开始在教会生活中学习爱的功课，在肢体关系中学习，在教会服侍中学习，从其他弟兄姊妹的爱心付出中学习，有时也从那些软弱的肢体的教训中学习。知道吗，我在教会中常常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的爱心大发，

却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和神的带领，而是出于自己的感情冲动。那种爱心的结果通常有两种，或者缺乏界限，把自己的生活和情绪都搞得一团糟；或者内心变得很苦毒，抱怨别人和教会缺乏爱心，怎么就我一个人在献爱心呢？也许两者都有。甚至怀疑这还是神的教会吗？相反的例子，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可能遇到事情很冷静，并不怎么感动，但是却是知道圣经的教导，主耶稣的命令“要彼此相爱”，于是就积年累月去做，默默无闻，不抱怨，不推诿，不攀比。一路行来，时间精力付出得越来越多，感情投入得越来越多，直到这项侍奉结束，有始有终。

所以弟兄姊妹们，别把情绪化的东西当成圣灵感动，圣灵感动不排斥情绪，但更要更新我们的全人，从思想到情感到意志。我不是反对大家有了感动就去服侍，因为没有谁是完全了才开始服侍的，我们都是在服侍中学习完全；我只是提醒大家，只有感动、热心不足以支撑你的服侍，只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爱能够支持我们尽忠到底。当你在服侍中感到新鲜感过去了，感到没有兴趣了，感到缺乏挑战了，感到疲乏劳累了，感到找不到成就感找不到价值了，那时不要放弃，不要抱怨，或许这就是圣灵要给你的果实，要你学会什么是从神那里来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恒久忍耐的字面意思我们都明白，只是不太容易做到，“又有恩慈”是啥意思？知道吗？忍耐不是让你咬着牙根苦熬苦受，不是不忍又能怎么办的无奈，听天由命的宿命，“又有恩慈”是说在恒久忍耐的时候，还要充满喜乐，充满盼望。这才是基督爱的境界。你说：这谁能做到啊？这话有点像当年的主的门徒了，“此事甚难”。但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自己，乃在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在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帮助。
他的爱是我们永不枯竭的动力源。

二、数算主的恩典

最近一段时间诗班的事奉压力比较大，是不是？除了主日排练，我算了一下，九月两场婚礼，十月到现在已经三场婚礼了，真的有些累。唱诗班的侍奉确实比较辛苦，现在还是轻松的，过去，教会能够正常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周五晚上排练，主日献唱之前排练，主日聚会后还要排练，如果赶上周六有婚礼，还要一周连续三次服侍，长年累月，没有间断。正因为诗班辛苦，牧者们对我们诗班一直很偏爱，每一次寻找到新的聚会场所，没二话，首先解决唱诗班的排练和休息室。牧者还常常来诗班参与分享讨论，给唱诗班吃小灶。即使是在户外聚会期间，我们诗班的排练一次没有空缺，我们的排练场地，我们的指挥，我们的司琴从来没有缺乏过，耶和华以勒，他的恩典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阿门。

我也觉得累，但是今天早晨读经读到《耶利米书》时特别有感动，觉得这感动特别针对最近一段时间的服侍，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大家都知道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他因为预见神的审判必将临到他的同胞，甚至神都封住他的嘴不许他替以色列民代求赦免。他是多么悲哀啊，而且他的痛苦悲哀没有人理解，他的同胞拒绝悔改，所以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所以一提及《耶利米书》我们就会想到哀



伤痛悔。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耶利米书》带给我的安慰甚至是喜乐。

《耶利米书》7:34：“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

我们知道，这是先知传达神的审判的消息，“那时”就是耶和华审判临到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时的一个标志就是“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

在《耶利米书》16:2，耶和华神对先知明确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甚至不许先知“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耶利米书》16:8—9）。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当神的子民悖逆神的时候，神就撤回他慈爱的手，于是以色列民就深陷苦难之中，神兴起外邦人管教他的子民，这审判严厉到一个程度，连婚嫁都停止了。正常的种族延续都被中断了。接着我就想：那么，我们教会在户外聚会敬拜以来，举行了那么多场婚礼，出生了那么多的户外宝宝，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神的护佑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的心真的立刻就喜乐起来。

然后，你们知道吗，怎么就那么巧，我就听到一位弟兄告诉我说，有位外教会的姊妹很羡慕我们教会一场接一场的婚礼。比较了受逼迫的代价和结婚的盼望，她说，宁可受逼迫，也要结婚，所以想来我们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只觉得辛苦，要知道你们被“羡慕嫉妒得很”哪。

《耶利米书》33:10—11：“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当年怎样应许以色列民的复兴，相信他同样会看顾他儿女他教会的复兴。纵然我们现在还处在被逼迫、受艰难的时刻，但是只要上帝施慈爱怜悯的手不离开我们，我们就有喜乐和盼望。而且这样的时刻正是教我们学习数算主恩的好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数算主恩（《数算主恩歌》）：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
丧胆似乎要绝望，

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
惊讶立时乐欢呼。

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时背着
十字架觉得苦难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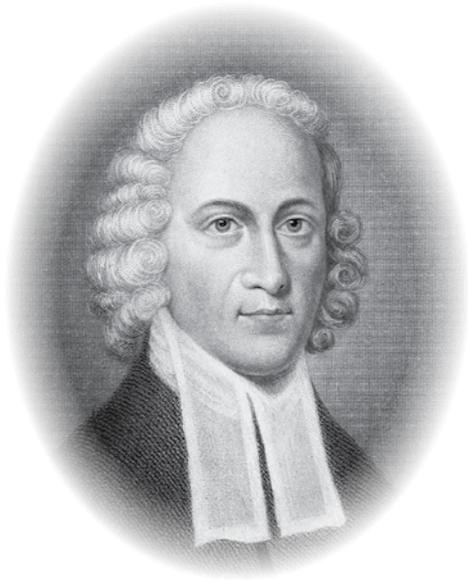
若数主的恩典疑惑就飞去，必能叫你
快乐立时赞美主。

……

（本文分别来自作者9月2日及10月21日在诗班的分享，经修改而成）

爱德华兹对中国教会的意义

文 / 新恩



依我看来，要回答爱德华兹对中国教会的意义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爱德华兹的主要属灵遗产以及中国教会的基本状况。但这两方面都不容易了解。就爱德华兹而论，看他浩瀚的著作以及对其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就可知其复杂性及丰富性；而就中国教会而言，我们甚至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希望先问另外一个问题：爱德华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以致对中国教会具有特别的意义？

像非洲的奥古斯丁与欧洲的加尔文一样，北美洲的爱德华兹也是一位普世性的伟大神学家。浏览教会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出爱德华兹的独特之处。爱德华兹作为美国大觉醒时期的领袖，同时也被誉为“清教徒神学王子”，这两点使得他超越了大多数奋兴家和神学家。教会历史上，有些时候虽有一些灵性的复兴，却伴随着反智、反律法及反秩序的结果；有些人虽促进了某些神学贡献，却产生了教条化的法利赛派的副作用。爱德华兹却在二者之间取得了罕见的平衡。这绝不是简单的中庸之道而是

超越。所有尝试过理智研究和属灵操练之间张力的人，都能体会这其中不偏左也不偏右的艰难。几乎很少有人像爱德华兹一样，同时在科学、哲学、神学、牧养（讲道）、灵修、宣教、家庭生活、子女教育上都有着卓越的贡献。他为牧者树立了一个典范：一个牧师是可能在学术研究、属灵操练、牧养教会、家庭生活、文化爱好之间取得平衡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他在教义和灵修之平衡关系方面的杰出贡献。显然在这个平衡关系方面，他的著作对于中国教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爱德华兹的广博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一切在他的生命中非常和谐。因为他思想的核心是三一上帝的荣耀。在此框架下，他从圣约的角度理解上帝的作为。他认为这就是全本圣经所见证的。在此亮光下，创造与救赎、天国与世界、心灵和肉身就不会被割裂。这是基督徒整全生命的基础。相应地，在实践层面，他建构并见证了宽广的属灵生活模式：圣道与圣灵并行。虽然这是加尔文的主张，恕我妄言，

加尔文本人并没有展现出这种平衡。爱德华兹身处复兴时代，他驳斥一味追求奇迹的狂热分子，不要迷信经验而要回归圣道的规范；同时，他也严正地警告那些不相信奇迹的“理性派”，要相信上帝的作为并去体验圣灵的大能。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他的这些主张对中国教会有何价值？

就具体的状况而论，可能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中国教会的印象。尽管如此，但就思想模式而言，却也并非不能做些宏观的总结。事实上，中国教会的神学传统还远谈不上丰厚，即使从普世新教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思想也显得十分单薄。虽然还未经过严格的研究，但我接受这样一个经验判断：中国教会的思想主要是改革宗和灵恩派这两个阵营，外加一个比较糊涂的所谓福音派。思想狭隘就容易偏颇乃至偏执，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相对分散的原因之一。很多人认为是政治因素造成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家庭教会有现在的联结（尽管不深）正是政治的环境所维持的。把我们拴在一起的，不是神学与异象，而是共同的困境和磨难。如果哪天有机会展开自由的对话，恐怕只会更加分散。这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传道人在完全没有宗派的神学和权威的约束下迷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亮光和体验以至权威。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约束，不过仅是一点可怜的福音派信念维持（大多时候就是指个人得救部分）。自然而然地，我们会滑向二元化的世界观，这是中国家庭教会最主要的传统之一。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该算倪柝声和王明道二位前辈吧。随着近年改革宗信念拥护者在城市教会的兴起，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逐渐改变，一些城市教会开始以文化使命消解教会与社会的分离。依我有限的观察，虽然现在仍然只是一个“入世”的起步，但已露出似乎有矫正过正的征兆。因为二元化世界观虽然偏颇，

但圣经的确描述了“二元”对抗的存在：心灵与肉体、光明与黑暗、良善与邪恶……完全取消二者的张力，很容易世俗化，这同样是错误的。而另一方面，在二元化道路走得更远的则是灵恩派。而这个群体（包括极端和温和）占据着中国信徒相当的份额。无论是哪一派，如果我们愿意聆听爱德华兹的教导，那么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调整。

宗派是必须的吗？很多研究神学的人会给予肯定的回答。很多人认为中国教会的下一步也必须是宗派化。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最初几个世纪的教会（使徒、教父时期）并没有类似的宗派，但却以正统神学维系着教会的大公性（合一）。但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做不到？其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神学太过于狭隘，以至于争执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教义。中国教会的建造少不了神学的重建，但真正的建树必须是核心的神学论题。在圣经和教会传统中，没有任何其他教义比三一论更直指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教父们竭力探索的教义神学正是三一论。有一点值得提出，和爱德华兹一样，教父们也都是教会的牧者。如果中国的牧者愿意学习爱德华兹以三一论作为思想的总纲，这将是教会之幸。这个教义的宏大，可以包容中国的复杂，也可以平衡执于一端的偏激。这有助于中国教会未来的合一。因为三一论，也只有三一论，才能统摄一切：多与一、同与异，避免无谓的纷争。这个教义中圣道与圣灵的关系，也能有效平衡“理智”与“心灵”的偏好，使改革宗人士更多留意圣灵，灵恩派人士更严谨地研读圣言。学习三一论，特别如爱德华兹那样去寻求三一神的荣耀，能使我们摆脱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与功利主义，去建造健康的教会，在圣约的框架下，建构一元的世界观，以及整全的生命。■

难以看透的千面鲁迅

——读《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

文 / 阿信



圣经里有一句话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知识多了，就像美国哲学家尼布尔说的，容易有知识的傲慢，自以为真理在握，对人冷漠、苛刻，封闭自私。但是惟有爱心，没有知识也不行，没有知识的爱心极易变成宗教性狂热。那圣经这句话难道说错了吗？当然不是。“惟有”的翻译不太恰切，准确译法应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爱心能造就人。”

可见，知识和爱心的结合，才能成就真正的学问。难怪13世纪神学家安东尼每次上课前都说一句话：“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什么益处呢？”

齐宏伟的书好读，因为他所有的书，如行云流水，流淌着一种气势磅礴的大爱，有着强烈的价值热情。而这种热情又小心翼翼地和充盈的知识含蕴配合在一起，其间维持着一种微妙平衡。他的《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30部经典——从〈忏悔录〉到〈复活〉》让我在很短时间管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30部经典；他的《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让我知晓世界文学史上那些大师，他们成功的最大原因不是因为句子写得优美，故事编

得精彩，而是他们身上凝聚了人类最深邃的精神资源。而中国当代文学的软肋正在于缺少精神积淀。

他的新作《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也是这样一部厚重之作。知识量大、眼光独到、思考深刻。我求学时，鲁迅还是“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是新时代中国文化领域的战将，其思想资源毫无疑问被认定为是阶级论和进化论；其后，钱理群、王富仁等从法国启蒙精神和人道主义角度发掘鲁迅；汪晖、王乾坤、彭小燕等从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角度解读鲁迅，说他的一生是在反抗绝望；当然还有人说鲁迅根本没什么思想，只会骂人。齐宏伟通过深入研究，通过梳理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的事实联系与“价值关系”，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如何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提出鲁迅最深的精神资源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启蒙思想的人道主义，而是“希伯来精神”影响下的“个”的精神和“幽暗意识”这一重要观点。

作者此说绝非空穴来风。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精读了2005版《鲁迅全集》，为这套全集找出不少注释错谬处，也找到了大量来自国内外的鲁迅研究资料，去美访港，且充分利用南京

那边图书馆的民国资料优势，在日本学界“竹内鲁迅”和“伊藤鲁迅”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他在研究时不先入为主，而是贴着鲁迅阅读，深入了解鲁迅的生活和写作，尽量客观地挖掘、还原深刻影响鲁迅写作的精神资源。也绝不因自己的预设前提，就硬把鲁迅和基督教文化拉扯在一起，而是紧靠着鲁迅来入思。细读细研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原来鲁迅有意无意被遮蔽了——人们把鲁迅打扮成他们心目中想要他成为的样子。所以，他才一再追问：真正的鲁迅是谁？为什么鲁迅只提了一次苏格拉底的受难却提了十次耶稣受难？为什么鲁迅读到基督教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竟说“大欢喜”？为什么鲁迅绕过了斯宾塞的“进化的伦理”而亲近赫胥黎带有基督教原罪色彩的“伦理的进化”？为什么他一到东京就给弟弟周作人不远万里寄《摩西传》？为什么他独独推崇先知耶利米而写下早期文论并提出“精神界之战士”的观点？为什么他热爱基督教作家显克维奇、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他亲近又批评尼采却对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主观之内面精神”大加赏识？为什么鲁迅几次搜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什么他受安德烈耶夫写耶稣之死的《齿痛》影响写下《药》？为什么鲁迅多次购买圣经？为什么鲁迅早年和神学家清水安三那么亲密？为什么他晚年把虔诚的基督徒内山完造当成自己最为亲近的密友？为什么临死前还第四次推荐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并保持一生由此形成的“改造国民性”视角？为什么他一生都着迷般地搜求购阅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的著作？为什么鲁迅在上海的工作室书桌顶上最重要位置悬挂了《夏娃》？为什么鲁迅尤其关注苦难和死亡而有深刻的“幽暗意识”？而所有这一切的关系是什么呢？……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齐宏伟也终于明白了真正的鲁迅是谁。本书绝非为基督教文化张本，而是实事求是地还原鲁迅之为鲁

迅的内在思想脉络和精神肌理，有理有据，不由人不深思。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鲁迅更不是。

本书知识量很大，且具有灼见慧识。比如：我早就了解到反基督教的尼采其实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这一点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早在《鲁迅与终末论》中就有过精彩阐释。这我不意外，很多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其实深受传统影响。但从书中了解到进化论其实也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斯宾塞提出的“任天说”，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不应该同情弱者，而应任其自然灭亡；另一个方向是赫胥黎提出的“胜天说”，正因人面对的是一个无情的、疏离的宇宙，因此具有独特性的人应产生一种属于人的特别感情和悲悯，用爱和无情世界斗争。鲁迅就深受赫胥黎影响，因此在文本中造成某种“约伯式困境”，由此和希伯来精神产生内在共振。我以前从课本上读到的进化论全是物竞天择之类，看到齐宏伟这样深入、



精到的讲解，不能不说是大开眼界。这样深入、细致的梳理，是那些贴标签式的教条论著所绝难相比的。

又比如，尼布尔认为“幽暗意识”其实是反对这两种观念：从空间层面看，有限个体的人力图把自己看为无限整体好由此得到意义；从时间层面看，是反对由希腊精神所体现出的那种为了永恒而力图摆脱现在的观念。按此总结，齐宏伟认为鲁迅的生存体验乃至思想内核中确有某种“幽暗意识”，一方面鲁迅以《坟·写在〈坟〉后面》提到的“一切都是中间物”思想反对“普遍”、“完全”，又以“过客”精神反对“永久”。这就为鲁迅的观点找到了资源库，同时又推进了对鲁迅人生和文本的深入解读。但这一切不只是相似性比较，而是回到舍斯托夫据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提出的“悲剧哲学”，也回到鲁迅何以独独敬服这三位大师的内任秘密，同时又照应了日本学界提出的“竹内鲁迅”是为“舍斯托夫体验”作注解之说。如此就使这一切探究豁然贯通，而非浅尝辄止。

我被说服了：鲁迅和基督教文化的关联不只是涉及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关乎“鲁迅是谁”的大问题。齐宏伟没有止于材料罗列，而是分了几个层次：鲁迅与基督徒清水安三和内山完造的交往、对话乃至心心相印，鲁迅对传教士的好感和受史密斯影响所形成的普遍主义视角，鲁迅对圣经的情有独钟，鲁迅对耶稣尤其耶稣受难的十次提及，鲁迅深受基督教作家的影响，鲁迅与基督教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的精神共振，最后水到渠成提出鲁迅的舍斯托夫体验或说是“幽暗意识”，这个时候才让我们恍悟何以鲁迅能塑造出跟清教徒人格类型恰恰相反的“向外适应”式阿Q人格，何以鲁迅25篇小说中有15篇写到了死亡，何以鲁迅不只为说假话忏悔更为说了真话忏悔！

看了本书，我自思，鲁迅有这么复杂吗？我给出的答案是：是！因为人是极其复杂的存在。

20世纪中国历史是对这个世界上最一部分人的人性充满信心，是充满信心改造人性的历史，也是误观人性反为人性所误的活教材。纵观鲁迅研究史，国内号称鲁迅学，一再宣称成了鲁迅知己，得到鲁迅精髓，但从鲁迅看过来，有时也不过谬托知己而已。一部《鲁迅全集》俨然在焉，但多少人去读，又有多少人不带前提去读，又有多少人读得进去又能读得出来？“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听说鲁迅早就没人读了，鲁迅也从语文教材中大面积撤退，鲁迅所为之忧心忡忡的“老子从前阔多啦”、“国外有的中国也有”等等重又甚嚣尘上。齐宏伟不为眼前喧嚣所动，工作多年后，重又潜心读书三载，日日与鲁迅为伍，从复杂的鲁迅那里读出了普遍主义情怀，也读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希望和起点。文化的更新绝非把传统搬到当代就可以了，还须有鲁迅这样博大的胸襟和宏阔的文化视野。

当今学界推崇鲁迅的“立人”，推重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立什么样的人呢？人独立和自由的根基是什么？任何思想、理念都必须有着着力点，也就是站立处。而这个世界铁律是：人的思想所站立的地方也许起初是坚固的大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变成湿地、甚至流沙。鲁迅学所找出来的鲁迅思想，多成了变动不居的流沙。但齐宏伟涉入鲁迅最黑暗、绝望处，又泅渡过去，在暗流那头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还原了一个复杂的也是立体的鲁迅、绝望的也是希望的鲁迅、寒冷的也是温暖的鲁迅，给出了没被时间淘汰的鲁迅精神。

寒窗煮茗，掩卷沉思，温热犹在，是鲁迅的，也是齐宏伟贯注在字里行间的。

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于贵阳

（齐宏伟著《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这个世界没好过

——虚拟采访鲁迅先生

文 / 潘采夫



2006年，即鲁迅逝世70周年，我受命制作了纪念特刊《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对鲁迅先生的虚拟采访。我就当今社会问题请教他，他以自己作品中原文作答。后来这个采访没有刊出，一直在网络间“漂”着，今年我将它收入了文化集子《贰时代》。5年过去，有些东西变了，但更多的是没变。到了鲁迅诞辰130周年，也是逝世75周年，编辑老师又想起了我那篇稿子，嘱我写出下篇。把新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请教鲁迅先生，看看先生何以教我。于是在原来访谈的基础上，又写出几千字来。从70年到75年（编按：本文写于2011年），从《新京报》到《东方早报》，也是一段缘分，很值得纪念。

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当然已和当下中国大有不同，但先生的批点并不过时，反而愈加入骨，刺痛我们的神经。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有些东西变化了，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但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有一以贯之的根脉在里面，

鲁迅将其提炼出来，并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其次，鲁迅最为人称道的，是批判国民性，而国民性这个东西，是祖先赐给我们的礼物，想拒收或转送，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鲁迅先生如果还生活在当下，当不会感到特别陌生吧，至于他会从事一份什么工作，是过得还行，还是有些惨淡，那就说不好听了。

潘采夫：先生，今天是您诞辰130周年，离开这么久，您的感觉怎样？

鲁迅：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远游。所谓激动，是没有的，不过看到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内里还是我生活过的，欣慰还是有的。

潘采夫：听说先生门下吃鲁学饭的食客有两万以上。

鲁迅：哪里，愧不如曹雪芹，他吃的是草，却用奶汁抚养了全国一半的人口。

潘采夫：先生去世75年了，后来的人给了先生很高的评价，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鲁迅：让他们赞美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潘采夫：这些年，读经运动如火如荼，儿童读经成了时尚潮流，上海还曾开办了孟母堂。

鲁迅：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古书实在是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潘采夫：有的大学里建了孔子像，两岸一直都在举行盛大的祭孔活动，看来孔子复活有望。

鲁迅：我还听说有个叫蒋庆的小子自称儒教教主呢。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子当作砖头用，但都明明白白地失败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潘采夫：韩医申遗成功了，中医也跃跃欲试。您有句话让中医的感情很受伤……

鲁迅：我是曾经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如果因为这句话误了他们的申遗，我感到抱歉。如果中医可以，则气功、金钟罩、点穴也都可以申遗的。——《呐喊》序言

潘采夫：现在有人把批评家叫做表扬家，先生对韩寒、王朔怎么评价？有人说他们继承了先生的衣钵。

鲁迅：凡批评家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相

互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文人相轻这个恶名所吓倒，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文人相轻》

潘采夫：先生活着的时候，就有观点说先生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本土的作家总得不了奖呢？

鲁迅：这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且看动物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是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是赞美上帝。唱赞美诗是得不了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潘采夫：有个国家一级女诗人，写一手漂亮的梨花体，她诗歌的流传让低迷的诗坛一片沸腾，又掀起一次让诗歌走进群众的高潮。

鲁迅：这个梨花体，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写过几首。在我的 / 后园， / 可以看见 / 墙外有 / 两株枣树，一株 / 是枣树，还有一株 / 也是枣树。——《秋夜》

潘采夫：先生写得很有韵味，看来优秀的散文完全可以和诗歌互相转化。先生还是写古体诗多一些吧。

鲁迅：新诗也还是有的，我做过国真体的诗，就是那首《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豪宅，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问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潘采夫：听说先生在看相方面很有造诣。

鲁迅：这是个谣传，我虽然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之类的，但从来不给国人看相，以免被某个行当利用，打出“弘扬国粹从看相开始”的幌子来。

潘采夫：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反响都不错，但有令下来，快乐女生明年要停办了。

鲁迅：我早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三闲集》

潘采夫：先生在上海栖居多年，最近一个叫杨海鹏的，正在为他的妻子打官司，还围脖直播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先生对官司的结果怎么看？

鲁迅：海鹏是个壮士，但我并不觉得乐观，“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鲁迅全集》四卷 476 页）

潘采夫：还有一些人，在为别人的事情忙活奔走，或者出头说了几句公道的话，然而命运和结果也不太好。一位著名的海归科学家饶毅，就因为批评科学体制，在院士评选中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鲁迅：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且介亭杂文·运命》，《鲁迅全集》六卷 102 页）对于那种为别人奔走的英雄，我仿佛总能看到他们的结局。“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

叫你赤膊的”——活该。（《伪自由书·不负责的坦克车》，《鲁迅全集》五卷 104 页）

潘采夫：那个科学体制就这样坚固吗？

鲁迅：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 147 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批判封建礼教，尤其痛恨“孝”，自己却是一个孝子。到了今天，先生还是持这样的观点吗？

鲁迅：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潘采夫：先生生前常下馆子，那时的饭馆和家里饮食虽不丰富，但也至少无害，现在看到毒奶粉、瘦肉精、毒大米、毒蔬菜之类，先生能吃得下吗？

鲁迅：底层的人们，也会互相伤害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 46 页）

潘采夫：这让我想起了有的人抱怨社会不公，却挥刀奔向学校的小孩子。

鲁迅：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三卷 38 页）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



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 47 页）

潘采夫：强者向弱者，弱者向更弱者，这是一种全面的变坏，敬畏与信仰怎么突然丢失了？

鲁迅：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三卷 241 页）

潘采夫：有的地方权力部门，就开辟了食品蔬菜的特供渠道。

鲁迅：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鲁迅全集》四卷 396 页）

潘采夫：恐怕对学校教育这一块也要反思。

鲁迅：正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

集》六卷 247 页）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而已集·反“漫谈”》，《鲁迅全集》三卷 350 页）

潘采夫：前些日子发生了动车追尾事故，先生应该知道了吧？先生认为这个事情的根本在于何处？

鲁迅：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一卷 328 页）

潘采夫：可是当初宣布那是世界顶尖，专利技术，还说要援助别的国家的。

鲁迅：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且介亭杂文·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六卷 91 页）

潘采夫：还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幸福。

鲁迅：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 270 页）

潘采夫：先生对爱国青年怎么看？

鲁迅：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书信·致姚克》，《鲁迅全集》十卷 181 页）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四卷 234 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对青年甚好，但也上过青年的当，现在韩寒、郭美美、李天一、卢美美等，都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先生的观感如何？

鲁迅：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七卷 141 页）

潘采夫：有人称先生为青年导师……

鲁迅：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 20 页）

潘采夫：先生知道右愤、左愤吗？

鲁迅：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浑号，——或谓之“绰号”。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 79 页）

潘采夫：先生对宽恕还是那么不“宽恕”吗？

鲁迅：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坟·杂忆》，《鲁迅全集》一卷 300 页）

潘采夫：有个不敬的话题，如果先生恰巧活在当下，先生将如何推广自己的主张，如何给报馆写文章呢？

鲁迅：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卷 5 页）

潘采夫：如果那样，你能想象自己的样子吗？

鲁迅：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六卷 293 页）

潘采夫：先生写文章的时候，最瞧不起的对手是什么？

鲁迅：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三卷 407 页）

潘采夫：最后，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鲁迅：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三卷 44 页）■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http://pancaifu.blog.caixin.com/archives/24958>）



中国人的坐标系

文 / 许宏

一、

如果从国家与日常生活关系的角度来看，1949年9月27日可能是对形成当代中国人的纪年观念影响最深远的一天。在这一天，中国大陆的执政者们正式采用公元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纪年方式。虽然中国最早正式使用公元纪年是在1912年的1月1日，但当时以及后来迁往台湾岛的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同时使用民国纪年。

初看起来，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时间的角度，纪年方式的改变无非是度量时间方式的更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纪年方式的变化只是中国从所谓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从文化地理的角度，这个标志不过是中国面对欧美的兴起作出诸多改变的结果之一。

然而，纪年方式的改变却不仅仅是关于形式上的时间，更与度量时间的基准有关。这个改变后的纪年方式与传统中国的天地观念（天干地支）、农业作息（农历）以及特别是国号和执政者的年号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这意味着，中国人在计算时间的年轮上不再主要以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日月、经济生活的规律以及国家和执政者为基准，尽管干支和农历还是中国人生活中常常使用的计时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基准换成了什么？《现代汉语词典》大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的第一部汉语普通话词典。在2005年的第5版中，“公元”词条的解释是：“国际通用的公历的纪元，是大多数国家纪年的标准，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我国从1949年正式规定采用公元纪年，同时继续保留使用农历。”

如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这个基准换成了“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与中华民国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同时以自己成立的那一年为基准计算年份，而是以“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国家纪年的参照。

如果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也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的党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纪年方式没有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时或共产党最初在欧洲成立的时间而是以“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为基准就显得很有意思。

当然，这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在选取时间的基准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国家习俗和国家政治的因素，而是更多地顾及国际通用带来的方便。毕竟，比如公元1949年或公元2013年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在字面上表现出是“从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而“公元”这个词所依据的英语“Common Era”或拉丁语“Vulgaris Aerae”，意为“共同的年代”，也没有直接说出这个共同的年代以什么为起点。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并存的世界，“公元”的确有利于人们在国际间的交往。

不过，无论是拉丁语还是英语的“共同的年代”或“公元”，其实都是相对晚近的表达

方式，大约出现在17—18世纪的欧洲。在这样的词语之前，早就有一个词语在欧洲流行，这就是拉丁语“Anno Domini”，最早出现在6世纪的欧洲，直译是“主的年份”，而这是“Anno Domini Nostri Iesu (Jesu) Christi”的缩写，意思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直至今日，这个词的缩写“A.D.”以及与此相对的“Before Christ”（基督之前，拉丁语是Ante Christum）的缩写“B.C.”仍然是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表达方式。

相比“共同的年代”或“公元”，“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或“主的年份”直接说出了这个度量时间方式所依据的基准或者时间的归属。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而不顾背后的根据，人可能处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中。不仅如此，在这里，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可能产生的结果会很不相同。无论是说公元1949年或公元2012年还是更简便地说1949年或2012年，使用这个便利的人其实都是在以耶稣的诞生为基准度量自己和所在世界的时间，并且以此记录与这个时间相关的一切。如果这里的基准——耶稣的诞生——是一个仅仅专门方便人使用的传说或符号，以此基准计算的时间也就是个没有多少含义的公共标准而已。

问题是，对世界上的很多人，无论耶稣还是耶稣的诞生都不是仅仅专门方便人使用的传说或符号。对他们来说，耶稣是如“Anno Domini Nostri Iesu (Jesu) Christi”（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年份）所说的，是“主”（Dominus，所有格是Domini，意为“主的”），意思是主人、统治者。如果根据记载耶稣的《圣经》，耶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人或统治者，而是创造人和宇宙万物的神，是降卑为人、拯救人的神，也是让万物运行、治理一切的神。正是那些认

耶稣为主的人将道成肉身（“道”在圣经新约原文中音译是“逻各斯”，意思简单说就是“神的话”）的时间作为纪年的基准，将耶稣降生为人的那一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在之后的每一年都是“主的年份”（A.D.），之前的每一年就是“基督之前”（B.C.）。也是那些认耶稣为主的人，听从耶稣的呼召，将耶稣告诉他们关于耶稣创造、拯救、治理的前前后后分享给世界各地的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耶稣降生为人作为度量每一年时间的基准才逐渐被世界各地很多人所接受。

在这个意义上，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虽然成为世界上最通行的纪年方式，这个做法在创立的时候却不仅仅为了使用上的方便，更是为了提醒世界上的人，年复一年的世界历史到底以什么为坐标系。当然，按照《圣经》的记述，耶稣在差派他的门徒“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时，并没有明确告诉他们以他的降生为人作为纪年的基准。耶稣只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以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太 28：20；徒 1：8）因此，在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之后最初的几个世纪，即使是被称为基督徒的人群当中，也没有普遍使用类似“主的年份”这样的纪年方式。那时，人们可能使用所在罗马帝国的年历，每一年以当年执政者的名字命名，更加正式的是以罗马建立的时间为起点。在基督徒和以色列人当中，有些根据《圣经》的记载将纪年的基准定在他们推算的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到了4世纪，有些基督徒以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约244—311年）开始执政的284年为纪年的起点，以纪念在

这位罗马统治者当政期间殉道的基督徒。

一般认为，是一位被称为小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约470—544年）的基督徒在525年首先正式使用了以道成肉身的时间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当时，小狄奥尼修斯接受罗马主教约翰一世（John I，约470—526年）的邀请，为以后将近一百年当中每一年的复活节——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经历埋葬然后复活的日子——计算确切的时间。他认为那时流行的戴克里先年历是在纪念这位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就改用道成肉身的时间作为纪年的起点。但是，这个纪年方式并没有在此后的欧洲立即流行起来。直到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Bede，约672 / 673—735年）在撰写《英吉利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时才首次以耶稣的诞生作为记录历史的纪年基准。到了15世纪，受罗马公教会（Roman Catholic Church，也译为罗马天主教会）影响的西欧都采纳了这个纪年方式。受东正教会（East Orthodox Church）影响的东欧在18世纪才开始将“主的年份”与之前一直采纳的以他们根据《圣经》推算的神创造世界的时间为起点的纪年方式并用。

二、

这样看来，“主的年份”不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采取的纪年方式，而是基督徒为了纪念他们所信的主而作的见证。从耶稣说的“作我的见证”的角度，这算得上听从耶稣讲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许小狄奥尼修斯当初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关于耶稣的见证竟然在辗转了一千多年后成为全世界最通行的纪年方式。这包括了在很多没

有认耶稣为主的人们当中。如果以国家而论，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在1949年，中国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大约有三百万人，只占当时全国人口四亿五千万的0.6%。在1912年，这个比例更低。即使在基督徒之中，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及1912年或1949年的时候，可能并非所有人都会意识到这个纪年方式跟作耶稣的见证有关。但无论意识到与否，以耶稣降生为人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已经在近百年间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百年当中，中国人计时方式的改变还不仅体现在纪年上。一周七天和星期日（后来还有星期六）休息的方式是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才有的生活节奏。这个节奏也与“主的年份”中的“主”有关。在《圣经》的旧约里，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2：1—3）在《圣经》新约中，耶稣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太28：1；

可16：2，9；路24：1；约20：1，19）。前者成了以色列人安息日的来源（安息日是星期六，对以色列人来说，星期天是每周的第一天，星期六是每周的第七天），后者则是基督徒在星期天聚会敬拜上帝、纪念耶稣复活的依据，被称为“主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礼拜天”。另外，英语中的“假日”（holiday）源于英语的“圣日”（holy day）。“圣日”出自“定为圣日”，原义是“将这一日分别出来”。

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和移民各地的基督徒将这个一周七天和星期天聚会敬拜上帝及休息的生活方式带到世界的很多地方。中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采纳这个方式是在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年）曾建议当时的清政府在中国实行星期天休假制度。赫士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校长。这所高等教育机构是1882年升格为大学的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后来与其他几所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合并发展为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在 1952 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齐鲁大学被肢解，并入山东大学及其他几所院校。赫士的前任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 1836—1908 年）既是登州文会馆及前身——1864 年在山东登州（蓬莱）开学的蒙养学堂——的创立者，也是后来流行的《圣经》汉语白话文和合本的翻译委员会主席。

在登州文会馆之后，赫士曾经接受袁世凯的邀请短暂作过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后来的山东大学）——的首任总教习，这所大学从 1901 年建校开始就实行周日休假。但由于不能接受那里敬拜孔子的做法，赫士很快辞职。到了 1919 年，赫士又因信仰和管理上的分歧从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的位置上离开，创建了有“中国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之称的华北神学院。在 1952 年，华北神学院同样遭到肢解，并入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不过，赫士关于周日休假的提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采纳。从 1902 年到 1911 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章程，从学校到政府各部门陆续实行星期天休息的制度。在此之前，中国人有比如旬假——每十天休息一天——的习俗，但并没有像中国在此之后推行的周日休假那样固定和普遍。

显然，中国接受一周七天和周日休息的制度跟采用公元的纪年方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看起来是欧美主导的国际惯例接轨的结果。即使在 1949 年以后，基督教会遭到迫害，欧美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中国的新政府也没有取消这个跟《圣经》和基督信仰相关的作息方式。恰恰是 1949 年成立的政府将公元设立为中国最主要的纪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而且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个政府在

70 年代末出现了变化，开始实行与自我封闭大体相反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考虑到中国在 19 世纪中后期之后直到如今的历史，与看来是欧美主导的国际通行的方式接轨大约已经成为中国最近一百多年以来的走向，当然这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封闭与开放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三、

在这中间，有一个事实及其所处的背景也许值得重视。了解这个事实及其背景可能会有助于理解中国接受公元和周日的做法在更广大的时间维度和历史背景中的意义，也因此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公元和周日的实质。这个事实就是，不论实行的是封闭还是开放或者是两者都有的做法，在 1949 年的中国开始执政的这个政党本身已经不是来自传统中国，虽然这个政党在各种具体的想法和做法上可能还在继续传统中国的某些方式。另外，这个事实所处的背景同样重要。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在欧洲和现代世界的历史，人们可能会发现，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些欧洲人以及后来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对他们看到的在欧洲社会和世界上不公现象进行批判的结果。虽然在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内部各个派别的想法和做法又有不同，但大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看来最优秀最先进的人可以通过他们看来最优秀最先进的想法和做法在世界上实现公义，相信人能够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这与并非来自欧洲但在欧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圣经》中的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

不过，如果追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在欧洲的起源，人们会发现这两者与基督信仰和基督

教会的某些外在形式有些相似之处，虽然后两者与前两者在实质上有天壤之别。考虑到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当中对塑造欧洲人的世界观念和生活方式起到过重要作用，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两位作者——德国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年）——都出生在至少形式上有基督信仰的家庭。他们都在小时候接受过洗礼。等到长大成人，他们走的路跟他们的父母和祖辈们已经很不一样。

当26岁的恩格斯在1847年6月和10月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初稿时，当时两份草稿的名字分别叫做《共产主义者信仰告白草案》（*Draft of a Communist Confession of Faith*）和《共产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Communism*），写作遵循的都是当时及之前的欧洲教会常常使用的要理问答（catechism）形式。马克思与恩格斯最终合著的宣言读起来则有《圣经》开篇的影子。在《圣经》的开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1：1—2）而《共产党宣言》的开始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纲领。这个同盟成立于1847年6月的伦敦，是由两个组织——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 或 *League of Justice*）与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并而成。参加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主要是旅居国外的德国手工业者。在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前，作为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成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邀加入正义者同盟。在合并之前，正义

者同盟这个组织的口号为“人人皆兄弟”，目标是“基于爱邻舍、平等和正义的理念，在地上实现上帝之国”。在合并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口号改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另外，在共产党的信仰学习和组织管理上起到重要作用的共产主义小组与基督教会的小组聚会有形式上类似的地方。

当然，不同的地方更加明显。共产主义者在小组聚会时不像基督徒那样敬拜神和学习《圣经》。共产主义者的小组是政党组织，而基督教会的小组是信仰群体。这也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与《圣经》内容和实质的不同上。根据《圣经》，上帝之国或完全公义的社会或完美的社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正如耶稣所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18：36）；属神的人“不属世界”（约17：14）；属神的人之所以不属世界，是因为神将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就如神将第七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约17：19；创2：3）；属神的人是被耶稣差派到世上作关于耶稣的见证（约17：18；徒1：8），属神的人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利25：23；诗39：12；来11：13；彼前2：11）。而《共产党宣言》认为，“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虽然基督教战胜了古代的各种宗教，但基督教思想却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了；相比之下，“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有意思的是，就像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无论使用暴力与否，《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及其后继者们并没有“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没有获得整个世

界。在共产主义者普遍采纳的“现存的社会制度”中，就有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和一周七天及周日休息的惯例。甚至在《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中，纪年方式依然以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作为基准。虽然小狄奥尼修斯当初通过计算得出的耶稣降生为人的时间后来被认为是有几年的误差，《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却也照旧使用。而在《共产党宣言》之后，人们可以看到这个宣言的后继者们不仅没有“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反而在各种形式的改革中恢复了《共产党宣言》明确要消灭的制度，比如跟共产制或公有制或国有制相对的私有制。

同样有意思的是，《圣经》也提及获得整个世界，而且还谈到怎样获得的问题。在《圣经》中的一处，魔鬼（原义是“控告者”）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获得整个世界的做法。这是在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示”耶稣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的回答是，“撒但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太4：8—10；路4：5—8）从耶稣跟撒但（原义是“那位敌对者”或“那抵挡者”，魔鬼的另一名称）的这段对话中，人也许可以看得出，追求世界跟敬拜上帝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取向。无论是想获得整个世界或部分世界，都是在追求世界，或者归根到底，是在追求自我，而这很可能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是其后继者们的想法。人对世界或人对自我的追求常常是情不自禁或身不由己的，尽管意愿上是要寻求真理或实现公义。从耶稣与魔鬼的对话，可以看出，即使是降生为人的耶稣，也要面对这样的试探。事实上，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

的试探。”（太4：1）耶稣对魔鬼的回应显示，即使想赢得世界，“俯伏拜”魔鬼也是无济于事，因为上帝才是主宰，虽然魔鬼在《圣经》中被称为“这世界的王”或“这世界的神”。（约12：31；林后4：4）

另一方面，如果人在追求世界，人看上去也许会得到眼前的世界或世界的一部分，其实是在“这世界的王”或“这世界的神”的控制之下。而耶稣对他门徒说的话表明，人若在“这世界的王”或“这世界的神”的控制之下，就“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就是追求人所想的，也就是追求世界或追求自我；体贴神的意思就是追求神所想的，也就是追求神。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取向导致的结果也截然相反。追求前者的灭亡，因为即使世界也要灭亡；追求后者的得永生，因为神将从他而来的永远的生命赐给跟从他的人。（约一1：17）

四、

如果考虑到这个角度，恰恰在一个以追求世界或追求自我为主要潮流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中，以耶稣的降生为人作为基准的纪年方式和以上帝的创造与安息并且耶稣的复活作为每周作息依据的生活节奏就显得与众不同。这个与众不同跟神将第七日分别出来的“定为圣日”以及神将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如出一辙。从这个角度，公元和周日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提供的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目前的大部分中国人日常生活所体现的维度。形式上，公元和周日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人接受以看来是欧美为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的结果，无论是被动或主动的接受还是两者都有。实

质上，公元和周日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不再局限于传统与现代、东方还是西方、民族国家、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原点不再是国家、世界和人，而是作为创造主、救赎主和治理者的上帝，人也不再属于自己、国家和世界，而属于上帝，虽然人与自己、他人、国家、世界的关系依然存在。

如果公元和周日的实质——“主的年份”和“主日”——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那就可能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心开始不再是自己、国家和世界，而是创造人和宇宙万物、为拯救人而降卑为人、护理天地万有运行至今的主宰。如果以《圣经》作者的眼光，这个形式与实质的差别，表面上可能是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归根到底却是死与生的问题。这个生活中心的改变，不意味着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国家、自然、宇宙万物的视而不见，也不意味着上帝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而意味着，人开始认识到人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人不仅得罪了人，更是得罪了创造人的神；人不仅在破坏自然，更是在破坏神创造的美好；人不仅不能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人自己就是这问题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人也就可能开始向神寻求，开始认识神，开始看到神的形像，开始明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7）意味着什么，开始思想神为何降生为人、为何“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3:3），开始体会“不属世界”却又不“离开世界”（约17:14—15）是怎么回事，开始透过以神为中心的眼光，学习重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

如果以《圣经》作者的眼光，无论是欧美的兴起或衰落、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或分解，

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欧美之外世界的变化或不变都是在一个更大的时间维度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即使从地理方位的角度，无论是《圣经》还是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都不是从欧洲和美洲进入到世界历史的，而是从西亚扩散到欧洲和世界各地。虽然《圣经》、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过去一千多年的欧洲文化，《圣经》、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却不属于欧洲或西方，就像不属于西亚和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即使是相当程度上受到《圣经》、基督信仰和基督教会塑造的欧美社会，也产生了很多以追求世界或追求自我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的观念和行动。正是由于欧美在几百年的兴起和对世界各地的影响，这些观念和行动造成的伤害波及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

如果以《圣经》作者的眼光，这一切不是以西方或东方或人类或世界为中心的时间和历史，而是神所应许的时间和历史。在这个以神为主导的时间和历史当中，神让大多数还不真正认识他的国家接受了以他为原点的的时间和历史的坐标系不仅很有意思，这个意思到如今也似乎更明显了。这就像《圣经》旧约记载神向埃及法老说的，“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出9:16；罗9:17），也像耶稣在《圣经》新约中所宣告的，“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12:31—32），也如曾经与耶稣为敌却被耶稣改变的使徒保罗所作的见证：“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西2:16—17），“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11:36）。■



《一九四二》中的中国饥荒史

文/杜君立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

中国电影院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演出季。李安以一部神奇的《少年派》讲述了关于人类流浪的心灵史；《2012》以3D版重新将人们带到一个末日狂奔。接下来，冯小刚以《一九四二》将人们带回中国，带回过去，带回现实。如果说《少年派》是用一个人的梦想来诠释信仰，《2012》是用人类共同的恐惧来警告人们的狂妄，那么《一九四二》则是用一个民族的群像来展示生存。这三部电影中，从先知、神父到喇嘛，信仰无处不在；在自然面前，人们面对“死亡与活着”时，似乎是如此无能为力。

一、

刘震云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时，中国还在一个权力傲慢的电视一印刷时代；冯小刚拍

摄《一九四二》时，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权利复苏的互联网—手机时代。20年前，刘震云用文字颠覆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记忆；20年后，冯小刚用影像刺破了权力对于历史的禁锢。“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这是《一九四二》的宣传主题词。20年时间，互联网时代带给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历史在这里越来越逼近真相，中国人因此也越来越接近普世意义上的人类。在同一个地球上，从来不存在中国人与人类的区别。在同一个人性拷问中，《一九四二》将中国电影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里，人们以一种荒诞而惊奇的眼光看到世界面前的中国。

如果可以给《一九四二》找到一个更确切的名字，那么叫它《逃荒》无疑更加准确。按说2012年11月29日，《一九四二》才正式上映。在河南一个县城的影院里，电影比29号早到了一个半小时。电影在蒋介石当年那温婉而刚毅的“新年讲话”中开始……午夜过后，140分钟的电影散场，人们走出一个遥远的年代，

昏黄清冷的月光洒满这座灯红酒绿暴富起来的小城。70年前，这里曾是“一九四二”的真实历史现场。酒足饭饱之后，在温暖的影院和柔软的沙发上“欣赏”自己先人“逃荒”的苦难，这是怎样一种荒诞和残忍……

如果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九四二》的观影体验，“无语”或许是最恰当的。一群不幸的人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凄风残雪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苦难历程怎能让人说得清……《一九四二》的英文名字是《Back1942》，其实，又有几人愿意“回到1942”呢？《一九四二》与《2012》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而便认为不可能发生。事实上，70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河南人记得和关心这场饥荒。70年是整整两代人的时间线，其实即使更短的50年前的饥荒也少有人知晓。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今天的河南人只为两件事烦恼——吃肉和减肥，就如同70或50年前的河南人为两件事烦恼——活着或死去。

二、

1942年，世界正陷入一场末日般的战争中。在斯大林格勒，数百万苏联人正在德军的重重围困中饥寒交迫；在奥斯维辛，纳粹德国正在有条不紊地对近百万犹太人进行文明的屠杀；在英国，丘吉尔首相患了一场感冒；在印度，圣雄甘地正在以绝食的方式掀起印度独立浪潮；在半壁沦陷的中国，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的进攻止步于河南。在陪都重庆，蒋介石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在黄土高原的窑洞中，一场叫做“整风运动”的思想政治运动正在发起。

这一年，隐居北平的画家蒋兆和先生正在创作一幅人物长卷。这幅高2米，长26米的

巨幅国画以轰炸、战火、饥饿、逃亡为主题，记录乱世中那些逃荒的农民、失业的工人、饥饿的孩子、横陈的尸骨……这幅《流民图》与《清明上河图》构成了地狱中国与天堂中国的阴阳两界。在画室之外，位于中国之中的河南正演绎着一场更为悲惨的现实版“流民图”。

在当时的中国纪年中，1942年为民国三十一年。头年河南刚刚遭遇了水灾的洗劫，新年开春，各地就接连不断地迎来了冰雹、黑霜与大风等自然灾害。然后是大面积的大旱和蝗虫。夏秋两季大部绝收。“水旱蝗汤”，“四害”齐聚，河南全省110个县、1000万民众遭遇灭顶之灾，饥荒使300万人饿死。“小麦由10元（纸币）一斗（十四市斤）涨至百元一斗。到了1943年，暴涨到800元一斗。”在买卖人口的“人集”上，妇女售价跌至平时的1/10，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1/3。“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方城一对夫妇实在无法生活，妻子就在人市上被卖了，夫妻临分手，女人对男人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圇（完整）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男人听罢，二人抱头痛哭。男人说：“不卖你了，咱死也死在一起。”这是时任河南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亲眼所见。

坦荡的中原自古就是逐鹿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中日军队在此陷入胶着状态。上一年河南遭受水灾侵袭，仍然征购小麦413万担，超过全国征购小麦的1/3。即使河南已沦为半壁江山，仍是国民政府手里的粮食支柱，从河南征购的粮食支撑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天灾来时，农民手中仅有的余粮也被搜刮殆尽；土地卖完后，庭院中的树和房子也用来换取食物，最后陷入彻底的困境。郑县（今

郑州)一户姓李的农民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

三、

符合中国官场“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河南地方当局对重庆刻意隐瞒了这场饥荒,在发给重庆中央政府粮食部的电文中称:“河南人民深明大义,愿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证实征购均已超过定额。”进入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饥荒已经蔓延得非常严重。不要说正常的食物,河南许多地方连树叶树皮都难以找到,甚至干柴也被捣碎用以果腹。记者张高峰深入采访的通讯《饥饿的河南》送到重庆的《大公报》后,总编辑王芸生改为《豫灾实录》发表,并撰写了一篇评论《看重庆念中原》。当天晚上,《大公报》即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勒令停刊3天,以示惩戒;张高峰被逮捕。

在华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挺身而出,从重庆飞抵宝鸡,沿陇海线乘火车赶到西安,向东过潼关,进入河南实地采访。当时陇海铁路沿线,到处都是饿死、病死和扒火车摔死的饥民。白修德亲眼目睹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他骑马从洛阳到郑州,一路之上所遇见的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作为高人一等的洋人,白修德在郑州受到河南官方热情的款待,宴席上有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鱼、炸春卷和撒满白糖



的馅饼。这让白修德无法想象,一路上所见“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与眼前是同一个世界。他或许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白修德在最近的洛阳电报局向《时代》周刊发去了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一是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二是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白修德忘了还有一个原因——国民政府。这篇报道神奇地躲过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没有任何一种残暴会超过河南大灾”,数日之后,这篇来自中国的灾难就出现在最新一期《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大哗。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白修德的报道使这位风头正健的“中国第一夫人”极为难堪。她竟然要求《时代》周刊开除白修德。《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卢斯回敬道:“我只会因此更加器重他!”

尽管来自河南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但蒋介石并不相信——或者假装不相信河南的灾

情，白修德当面给蒋介石出示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蒋介石沉默了。接下来的结果自然是人头落地，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泄露机密”被枪毙了。白修德的介入使河南饥荒大白于天下。直到10月，国民政府才派出两名官员前去调查灾情。10月底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之后，蒋介石下拨2亿元救济款，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元，而且大多并没有落到饥民手中。所有的官办粥场都形同虚设。新年之际，又从河南征收了170万大包（每大包200斤）小麦用作军需，这对河南灾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

《一九四二》中有一个桥段：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日军军官陈诉日军兵力不足，战争不利。冈村指出中国最大的弱点是政府对民众极其冷酷，如果能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则必然扭转战局，击败貌似强大的中国军队。冈村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宁次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毫无疑问，这句“他们首先是人”是这部电影最为刺耳的台词。

在中国官方历史中，冈村宁次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时期，曾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造成数百万华北平民的死亡。但冈村宁次指出，他真正实行的是“三不”政策，即不杀、不抢、不淫。从真实历史来看，冈村宁次似乎并没有撒谎。事实上，“三不”也比“三光”更高明更厉害更符合日军当时的战略思想。冈村此举意在对本国

军队的战争行为进行约束，提倡“良心至上”，以此收买中国民众的人心，实现儒家传统理想的“王道乐土”，从而彻底征服中国。如果说战争中尚有一拼的话，在这种国家层面的文明对抗中，当时兵匪不分的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在日军和中国民众共同形成的强大压力下，40余万国军不战而降。

因为冈村宁次颇具政治家头脑的卓越战争指挥能力，他被晋升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惜不足一年，强大的日本战车就被美国的原子弹击溃，中国因此得救。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作为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1949年2月，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法庭经过审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返回日本，1966年去世。

五、

与其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口述性质的报告文学，它以民间传统的口口相传因述说了一个关于饥饿和饥荒的往事。在《温故一九四二》序言里，刘震云这样写道：“一九四二年，在我的家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这句话也成为电影的开场白。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在一九四二年大饥荒中，他的二姥姥、三姥姥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逃荒路上。《温故一九四二》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饥民用刀子割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吃，刀子下去，“死人”呻吟道：我还活着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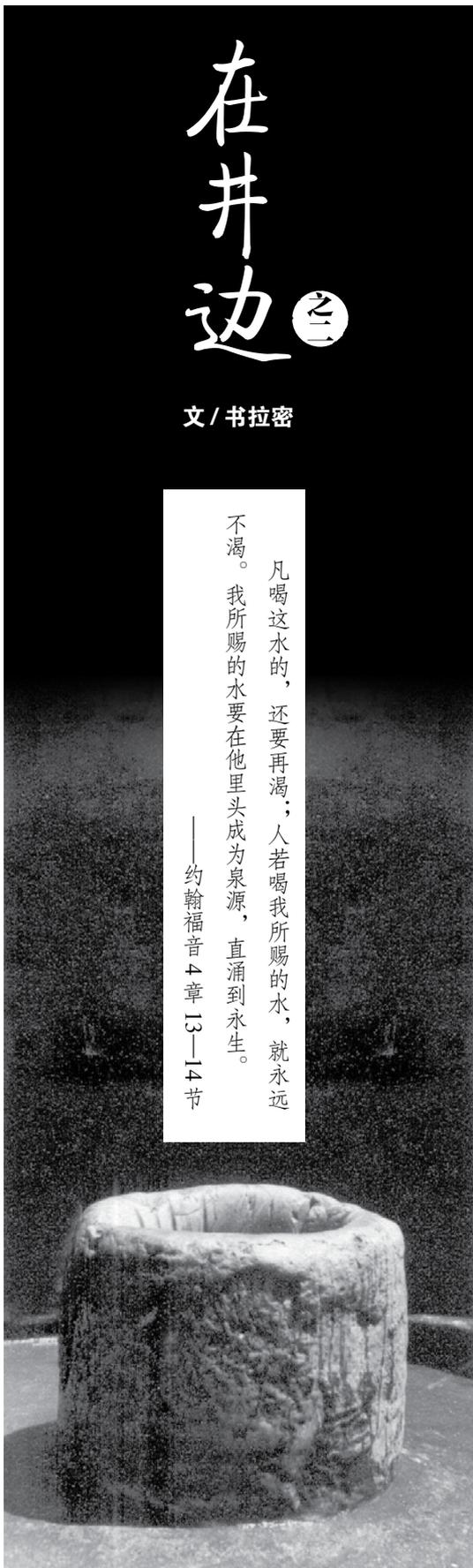
（本文转载自共识网。经过本刊的编辑）

在井边 之一

文 / 书拉密

不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约翰福音 4 章 13—14 节



虹姐的故事

凌晨，江一虹突然从梦中醒来，借着清冷的微光，她第一眼就看见美妮在鱼缸里漂着，露出娇嫩的肚皮，她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

她到底还是没能留住它。

算起来，从这只鱼缸里已经捞出过不下 10 条金鱼了，最早的一条是 6 年前养的，那时，她的公司刚起步。

如今，公司倒还算热气腾腾，金鱼却已经换了两三茬。

自打那条蓝紫色虎头金鱼死后，她再未向鱼缸里加入新鱼。最后只剩下一条鹤顶红“美妮”陪着她。

这一次，她没把鱼直接从水里捞出来，而是用条水管，将鱼缸里的水慢慢放尽，默默地看着那条白身带红顶的金鱼在透明的水波里一点一点地沉落下去。

可卡 HOPE 很懂事地坐在地毯上，陪她一起看金鱼沉落，嗓子里微微地呜咽两声，将爪子搭在她的脚背上。

江一虹拍拍 HOPE 的头，说：“没事儿，咱俩还在一起呢！”

一

江一虹 46 岁了，看着倒像 30 多岁的样子，但心态上仿佛已经 70 多了。

从小到大，她最拿手的事，就是读书。她读书，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当时只能凭着好成绩才能从老家那个小镇走出来，才有可能实现更高的目标。好在，她足够幸运，高中三年她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的前三名，高考时竟然未失手，没像经常考前两名的同学那样，发挥失常。她如愿地考到京城的一所大学读商业管理。

江一虹认为，这要归功于她良好的心理素

质。

母亲在她出生4个月时就去世了，然后，她被父亲送到奶奶家。6岁时，奶奶也去世了，父亲只好把她接回来一起生活。她回到所谓的自己的家，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一个比父亲小4岁的女人王香。她遵照父亲的指点，称王香为“妈”。但直到10岁，她才在书本上知道，按照家庭成员关系的准确表达，王香是她的“继母”。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个词，而这时，父亲也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江一虹16岁时，继母王香再婚，将她也一起带到了新丈夫庄景家里。王香自己也是在继母家里长大的，有过一个刁钻古怪的继母，王香就发誓自己成了家，绝不虐待儿女，哪怕是别人的儿女。自己受过的苦，不能让别人再受。当时决定再嫁的时候，她就和庄景谈好了，自己的事自己管，两人就是搭伙过日子，她愿意做些让步，只要对方能帮着她把三个孩子拉扯到18岁，其他的事，庄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惟独一件事后来起了争执，就是江一虹读书的问题。王香答应江一虹，让她读到高中毕业，那时，她已经在全年级排到前三名了，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和学生会副主席。每次开家长会，王香都感觉自己特有面子。但庄景不这么看。庄景认为女崽读不读书都行，读了也是白读，莫不如早点儿出去工作赚钱养家。这样的争执，差不多在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会出现。江一虹从来只是听着，一言不发。直到有一天，庄景说着说着，开始激动，伸手摔了一只碗在墙上，江一虹放下手里的碗筷，淡淡地回了一句：“爸要是觉得我上学上得不应该，就和妈再生个孩子吧，我退学回家帮你们带孩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庄景，直看到他扭过脸去，她才蹲到地上，把碎碗一片一片地捡起来。

江一虹说这话，是有内涵的，这内涵庄景自然是明白的，所以他胆怯，不敢再作声。王

香也是明白的，却非常惊讶。她揣摩着，江一虹一定是知道点儿什么，不然不会这么准确地打到庄景的“穴位”上。

许多年之后，江一虹回想起当年这场无硝烟的战斗，都会忍不住笑起来。而那个秘密，她始终不曾告诉过任何人，后来王香多次试探过，想知道她是怎么知道庄景是同性恋的。但她听了继母的试探，却假装出一副懵懂的神情，将话题巧妙地移开。有些场景，她始终不愿去回忆，慢慢地，那些记忆都随着少年时光，被她一起抛弃在故乡的小镇上了。

离家去京城上大学的前一天晚上，她对王香说，我知道你当年是为了把我们养大才又嫁的人，等我毕业了，赚了钱，我就把你们接走。

她第一次看见王香在她面前流泪。

可惜这个心愿她没能实现。

二

江一虹的大学读得很幸运，成为中国最后一批不收学费的大学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最热衷的不是学生会的各类选举——她始终觉得那种气冲斗牛的激昂姿态过于幼稚和造作，而是做小买卖。她虽然喜欢读书，却不是书呆子。她很早就培养出一种敏锐的能力，在街上走一圈，逛几个小店，她就能迅速地捕捉到市场的需要。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更没有淘宝，江一虹完全靠着细密的计算和对金钱的热情赚来她的第一桶金——500元人民币和20美元。当时，500元钱相当于一位大学讲师三个月的工资。而这却是江一虹在一个学期赚到的，那年，她22岁，上大学三年级。她从老家批发来各种风味干果和小点心，按类分包，插上统一的牌子，取名为“甘の味小吃”，听着仿佛出自遥远的日本，却在各宿舍的门口卖得异常火爆。临毕业前，她已经在各个大专院校做起批发生意来了。不过，她毕业后，做的几个职业，都与食品无关，

倒是经常和电脑什么的有关。可算是直接地一脚就踏上了时代的最前沿。

毕业后，她先进入一家高校的电化中心做助教，其实就是做中心和副主任不愿做的各种杂活。

如果当初，江一虹愿意靠着一张脸蛋吃饭，她完全可能在那个二流都算不上的大学弄个处长做做，但她的自尊心太强，也太看重自己的智商。对照 21 世纪中国知识女青年的标准——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笑，她似乎有点儿迂腐，或者换个更通俗的词儿，就是——有点儿想不开。

刚毕业没多久，继母王香带着江一虹同父异母的弟弟外出参加婚礼，出车祸去世，一车人走了五个，有两个和她有关。在整个后事处理的过程中，江一虹感觉自己似乎一直很恍惚。自始至终，她没号啕大哭，也没涕泗连连，一副平静到冷漠的面孔，让七姑八姨的看着非常不满意，私下里认为她出去读了几年书，人变得特别没感情。

按规矩，晚辈都要戴孝，大热天的，粗布做的孝帽捂得人一头汗，江一虹被七姑八姨劝了不下五回，才算勉强戴上孝帽。她倒不是怕出汗太闷，实在是觉得那个样子太诡异，让她难以接受。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按规矩，由长子或长女先跪在棺材前面大放悲声，然后烧黄纸，然后摔碎一只瓦盆，是谓“上路”，并连喊三声——“走好哎……”。才算是完成整个葬礼程序的第一回合。

这一次，任凭大家说破嘴，江一虹就是不肯跪地上烧纸、摔盆和大喊，她觉得这些规矩真是太愚昧了，她无论如何做不来。正在彼此争执不下的时候，妹妹一彩主动申请，替她承担了本应由长女承担的烧纸、摔盆、大喊的工作，总算把家人的面子圆了下来。

事后，左邻右舍七姑八姨都认为，江一虹

的大学算白读了，连人情世故都不懂，估计日后找男人嫁出去的可能性怕是很小。

说起来，也算难为江一虹了，一场葬礼，往来的亲友关系极为复杂，有父系的有母系的有继母系的有继父系的，反正葬礼一结束，呼啦啦跑来吃饭喝酒划拳的就把当地一家酒楼的两层大厅都占满了。继父庄景事后一个劲儿地抱怨说，葬礼的花销太大了，收上来的那点儿人情费根本不够干啥的，房子又年年漏雨，而且刚上高一的妹妹一彩也马上要交学费了……一条一条摆明了是说给她听的。江一虹当时手边有几个钱，但她知道庄景不会没有钱，就轻描淡写地提了两句交通肇事方的赔款问题和遗产分配方案，庄景马上就不说话了。

临上火车前，她给一彩偷偷塞了 200 块钱，那差不多是她一个月的工资。

从老家回学校后，江一虹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堆在瓦盆里熊熊燃烧的黑色冥币，当时那阵浓密的灰烟呛得她嗓子疼，前后疼了快一个月也没好，一说话就咳得不得了。夜里也咳，声音之大之猛烈，经常把隔壁宿舍的人惊醒，以至于有人怀疑她得了肺结核。

她找了个时间，赶紧去校医院，一进诊室，就认识了前程似锦风光无限好的校医院第二副院长关北星。关北星的母亲是当时的教育局第一副局长，分管高校人事这一块。后来关北星借了好几次故到江一虹的单身宿舍去探望她的病情——就是最常见的慢性支气管炎。可惜关北星别有他图的探望最终也没结果，江一虹的表达总是淡淡的。关北星一直不知道，就是他的一句话打消了江一虹进一步推进彼此关系的念头，那句话就是——“我让我妈和校长谈谈，下学期调你进科研处弄个处长当当。”

江一虹心说，一个处长算什么，还要你妈帮？我要想做，凭自己的本事还怕做不成？！她就这么一清高，结果，一个被人看作好姻缘的机会就溜走了，一个有可能做处长并进而做

副校长的机会也溜走了。在电化中心做了小一年，她才知道，无论她多么辛苦能干，想要在那间不足 15 平米的办公室里做上副主任，三年五年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她除了有个本科学历外，什么靠山都没有。这时，她才回过神来，明白关北星当初的那句话里藏着多少诱惑和机会。不过，这时，关北星已经和外语学院的女教师进入婚礼筹备阶段了。那位女老师嫁入关家没多久，就荣任外语学院某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而江一虹还在电化中心委委屈屈地做着小科员。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快两年，江一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她找了个机会辞职，跑到中关村去卖电脑。就像中国 90 年代那些最早下海的先行者们一样，她为钱吃了不少苦，当然，那些苦最终也被存折上的金额抵销，剩下的就是在出书、受访时用以渲染的说辞与谈资了。然后，她开办了自己的电脑公司。然后，她的公司被收购合并，她成为重要股东，其实就是每天拿

着钱，早早地开始了退休生活。这一年，她正好 40 岁。

江一虹不怕做事，就怕不做事。如果没有事情做，一门心思地只是吃喝玩乐，五湖四海地逛悠，一旦停下来，她就异常惶恐，感觉自己和死了差不多。

结果，虽然手里有钱，她却总是时不时地感觉心口发慌。后来，偶然一个机会，她也学着微博上几位大 V 的架式，开始做天使基金和慈善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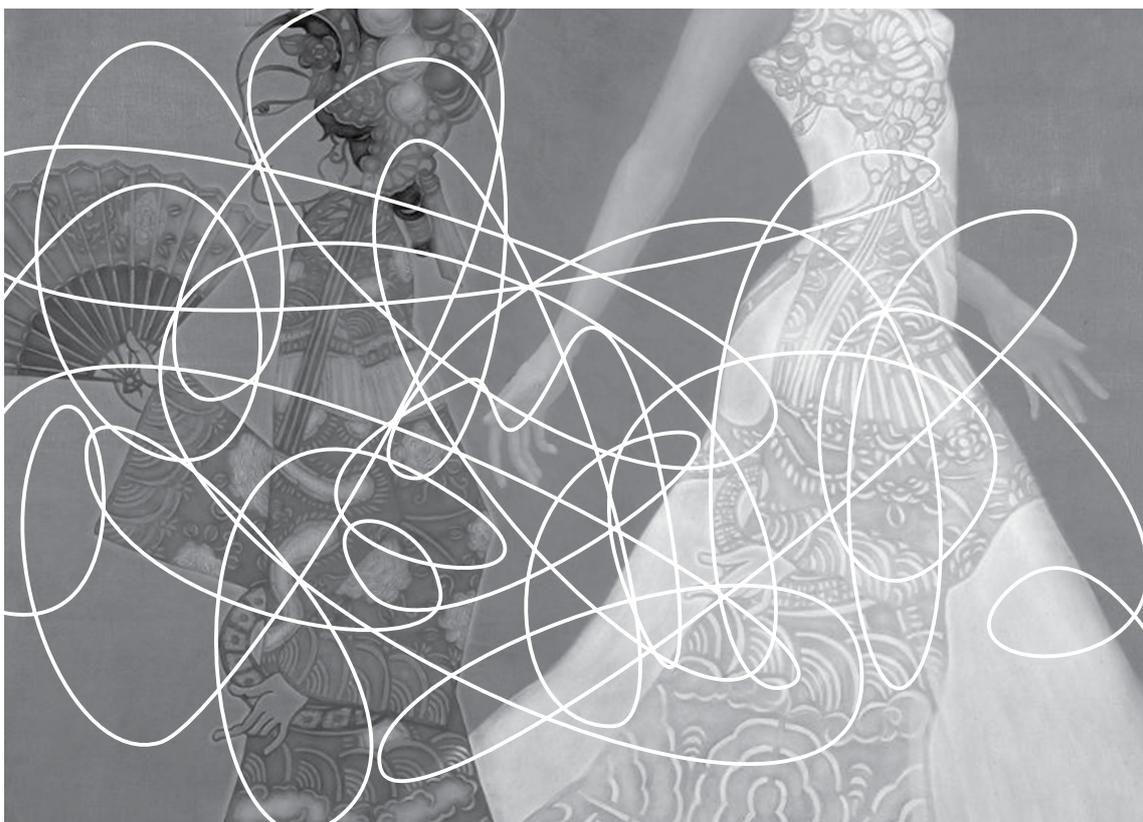
江一虹从来不缺找事做的能力，一时身兼十五六职，好像每天都在忙忙忙。

她最有名的天使投资是给两个做游戏软件的年轻人 20 万元启动费，两年后赚回了 400 万。

她最有名的慈善活动是帮助西北某干旱地区建立“水过滤工程”，让一些长年喝污染水的儿童能每天喝上一壶净化水。

对于前者，她认为自己是送钱的天使；

对于后者，她认为自己是送水的救世主。



她经常和一些有钱的朋友提起那个地方——“你都无法想像那地方的孩子有多可怜，一年到头洗不上一回澡，一年到头喝不上几口干净水，那叫一个渴！”然后，她继续说，“怎么样，也跟着捐点儿？”

35岁那年，江一虹结了一次婚，一个月后便离婚。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会离婚，她也从不曾告诉过别人。据说那个背景身份皆不明的男人后来到爪哇岛做诗人去了。

至于江一虹，身为成功人士，即使大龄、离异、单身，她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似乎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乎，她竟然就到了无人敢对她的婚否提出任何异议与建议的境界，这位大龄离异单身女性因为钱多，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无需时时处处回答婚恋一事的自由。

站在某个能被人认出来的地方——通常，如果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娱乐圈人士，即使那人很有钱很有权，也很难做到在哪儿都能被人认出来，普通大众往往只能依靠那人拎的包、开的车、表现出的派头来猜个大概。可惜，普通大众往往都眼神不济，对名牌名款什么的了解也不算多，即使有所了解，也会本能地按照自己的狭隘理解，认为那可能是从动物园、雅秀之类的地方淘来的假货，或者是做了二奶、当了富二代官二代才拥有的资财，很少会认为那是大干苦干加巧干硬累出来的财富，以至于尊敬的心一时半会生不出来。

有点儿不幸，江一虹就属于这种。

站在某个能被人认出来的地方，她总会惹起如今那些没发迹半发迹一点点的老同学的羡慕嫉妒恨。每到这时候，面对一桌子的人，她一边用金色小调羹吃着奶白色的银耳燕窝，一边轻描淡写地提及她当年在中关村卖电脑时一些可笑的趣事，或者被合伙人卷跑创业资金上百万的惨痛往事，以及西北老少边穷地

区那些饥渴的孩子……说者是有意，听者也有心，大家在哈哈一笑或唏嘘不已中，对财富及财富拥有者的隐在憎恨多少能消解一些，知道江一虹的钱不是大风吹来的，不是靠脸蛋赚来的，是吃苦吃来的。

何况，每次聚会结束，江一虹都会主动买单，还会特别为出席者预备些精致喜人的礼物带回家。对于那些一直财力不逮的老同学，她也会慷慨解囊，逢年过节寄点儿钱过去表示一下关注与关照。

一时间，人送外号“女宋江”。

三

在认识凡克之前，江一虹先认识的萧菲。

那天，接到妹妹江一彩的电话时，江一虹正在给 HOPE 面前的盘子里倒狗粮。

她听见江一彩的声音里透着惊慌，立时涌出一股子烦躁。她特别不喜欢他人的紧张感，那会让她陡生窒息，进而惹她发怒。

她忍着怒气，问怎么了，一句话刚落，那边就哭上了。是女儿茵茵的事，体检结果说，好像是急性白血病。

江一虹听着，手一抖，半袋狗粮洒到盘子外面，HOPE 本来正想伸头吃呢，马上坐了下来，疑惑地看看她，不知道主人动的是什么心思。

江一虹冲着电话说，赶紧买票，来北京！

她带着一彩和茵茵，在北京医院再次做体检。

一番焦虑的等待后，总算拿到单子。江一虹和江一彩恭恭敬敬地坐到医生的对面，等着医生开口，仿佛生死都在他手里一般，似乎只消他说句话，单子末端明明白白写着的那行字就会立时消失似的。

那个医生戴着口罩，眉毛繁乱，让人都看

不清眼睛的形状。乱眉毛的医生心不在焉地瞟了一眼化验单，拿起来左右掂掂，又看看她和一彩，例行公事地问，谁是家属？

她听着这话，心里当时一凛，回答说，我是。

医生随即低头，在病历上刷刷地写了几笔天书，然后和化验单一起推到她们面前说，去办住院手续吧，这是急性白血病，往好了说能活10年，往不好了说也就一两个月，家属想好怎么处理后续。

一彩听着，当时就晕了过去。

乱眉毛的医生说，这可真是，孩子跟她又没关系，她着这个急干吗呢？

医生把身材滚圆、穿着一身地摊质料衣服的江一彩当成江一虹家的保姆了。

江一虹后来问萧菲，你拿化验单给医生看，他也这么说话吗，怎么听着那么混蛋，一副欠扁的样儿！

萧菲那时的头发已经都掉了，她轻轻地搔了下头皮，回忆说，好像，没有，那天当班的医生先做了一番她和凡克的思想工作，才小心翼翼地检查结果告诉他们。

江一虹说，你瞧，这种事让我们遇上了吧，这种人也让我们遇上了。

萧菲两只手勾在一起，对着窗外那轮金黄的夕阳比划着，慢条斯理地说，指望人，一准靠不住，医生也一样。

江一虹便想起凡克那双晶亮亮的眼睛来，逗她说，凡克也靠不住？

萧菲回头，背对着窗，嘿嘿一笑，冲着她摇着一支手指，向上指指说，我只信上帝能靠得住。

江一虹不是太喜欢听萧菲没几句话就提她的上帝，姑且不论是否真有一个神乎其神的神，就是真有一——嗨，怎么还会让你得了这个病呢？——这句话，是她与萧菲熟悉了之后，才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

萧菲听着这样仿佛尖锐的问话，倒是一脸的坦然，说，不是每年都有个比例么，这次我占上这个分子了，就等于有个分母被解脱了。然后她回头对靠在床边的茵茵，嗨，不过，你可以争取重新做一个被解脱的分子！

所谓被解脱的分子，就是寻找成功配型的骨髓移植，如果成功，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实现血液再造功能，继续活下去。

当然会有费用。

对某些人来说是天价。

对江一虹来说，钱不是最难解决的，最难的是，谁有这样的骨髓？而且，还愿意主动提供？

这么想的时候，她才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最简单的道理——钱的确不是万能的，有钱也买不来生命。

萧菲说，生命不是钱买来的，生命是上帝给的。

江一虹说，那让上帝再给茵茵一次生命吧！

萧菲说，那就向他要吧，他一准会给！

说完这话20多天后，医院方面通知江一虹，找到茵茵的配型骨髓了。捐献者竟然是凡克——萧菲的丈夫。萧菲刚入院时，凡克就到骨髓库中心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本以为也许萧菲能用上。但萧菲等了三个月，仍然没有合适的髓源。江一虹有点儿想不明白，自己的亲人救不了，却能救一个陌生人，这种生命逻辑隐约透着一点儿怪诞。

四

茵茵做完移植手术后，还在隔离室。

那天，江一虹夜半在家睡觉，突然接到一彩的电话，说萧老师走了。江一虹拿着电话一时没反应过来，喃喃地说，萧老师，哪个萧老师？一彩说就是那个萧老师，信耶稣的那个。

江一虹坐在一堆被子里，懵懵懂懂地问，

她走了，去哪儿了？她问的这话一说出口，立时就明白过来，没等一彩再说话，她急忙说，等着，我这就去！那时是后半夜3点，她从车库把车开出来，一路直奔医院。

后半夜的北京城，依然灯火通明，车与人俱少，仿佛一个美丽的梦中之城。江一虹想起有一天和萧菲说起她这半辈子做的许许多多的事，说起那些喝不上水的孩子，她看见萧菲的眼睛湿了，听见萧菲说，虹姐，渴的不只是孩子，还有你。

那天，本来她要反问这是什么意思，却被某件事打断了，后来，就没来得及再问，没想到，就差那么一句，就成了永远搁浅的问题。

有些事，有些人，要提问要关心，都要快，不然就来不及了……她恨恨地想着，在平坦的平安大道上猛轰油门。

江一虹赶到的时候，人已经送进了太平间。

她站在凡克旁边，心思空洞地帮着他收拾床上床下的物品。看见一本《圣经》，她想也没想，就说，这书送我吧。

凡克哑着嗓子说，好。

自始至终，她没敢看凡克的眼睛。

靠在医院花坛边的长椅上，有清凉的风拂过。她想，萧菲再也没机会呼吸早晨的空气、倾听鸟鸣、触摸露水了。她记得，萧菲说最喜欢的时光就是凌晨，万物刚刚苏醒，她可以和她的神面对面。

她一直把这种表达当作一个美好的童话故事，真希望自己也能那么单纯——就像王菲的歌里所唱。

此时，她坐在一片鸟鸣之中，想着一个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有一种透彻骨子的苍茫。她突然看清了一件事，似乎，萧菲身上特

别缺少那种拼命要活下去的愿望，在她的记忆中，萧菲从未表达过强烈的求生之情，就像她也从未表达过任何抱怨和哀苦一样。

我在等待一个节日——有一天，她小心翼翼地问萧菲，如何看待最后的时刻，萧菲面色安详地回答她。那样的安详中透着一点羞涩的期待，仿佛她面临的不是死亡，而是与恋人的相会。那一刻，萧菲特别美，苍白无血的皮肤似乎都在发着光。

江一虹羡慕这样的表达，她深切地知道，她之所以会让自己那么忙碌，一个人没完没了地做那么多事，只有一个原因，她希望自己忙到可以什么都不想的地步，然后，才能不吃安眠药就睡个好觉，一直到天亮。否则，后半夜醒来，孤零零地直望天花板，想着如果此刻死在这里，根本就没人知道，难道不是世上最恐怖的事吗？

她再次想起那句她无法理解的表达——“渴的不只是孩子，还有你”，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渴吗？

她叹口气，顺手翻开手中的书，有两个字闪电一样跃进她的眼睛：“我渴！”她吓了一跳，砰地一声合上了书。

这太不可思议了，巧合得有点儿……像童话。

她咬咬嘴唇，又翻开一页，看见上面赫然写道：“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她四面看看，没有萧菲说的那位可以与她面对面的神，她微微放下下心来，抖着声音，把这句话大声地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读的时候，她好像闻到了晨露清冷爽朗的气息，鸟鸣也更悠远了。■

（敬请期待下一期中篇小说《在井边》之三“凡克的故事”）

幸福的战士

——写给守望者

文 / 张鹤

当黑夜降临的时候，你感觉到无助吗？独伫高处，仿佛显眼，却微小如一片剪影；
当繁星升起的时候，你感觉到孤单吗？守卫着苍茫大地，似乎没有一个伙伴。
你不是指挥千军的元帅，只是一名执行口令的士兵。
守望，是选择，是职责，是使命！

在这样的暗夜里，
有人漠然沉睡，有人辗转切齿，有人暗设网罗；
在这样的暗夜里，
有人低首轻泣，有人举手祈祷，有人束腰起行；
在这样的暗夜里，
你迎风而立，四面观望，不敢稍息；
你的手中，只有一枚号角，那是你唯一的武器。

沉默的守望者，是清醒的，
知道暗夜无边里，仍有微弱的星光值得瞩目；
执着的守望者，是冷静的，
知道繁星升起时，会有暗袭的寒风令人惕慄；
但守望者依然愿意，
伫立高处，守候黎明。
因为守望，是选择，是职责，是使命！

有谁能像你呢？
似乎错失了安逸的酣眠，
似乎承载着守夜的劳苦，
却是幸运的士兵——

杏花

晓

听过暗夜里虫的低鸣和草的细语；
看过群星间奔流不息的银河；
触摸过大气在一片叶子上的晶莹呼吸……
当黑暗渐隐，晨光微晞，幸运的你，
最先看见夜昼的更易与分离，
就仿佛参与到创世的第一日。

仿佛孤独的守望者啊，
你是最幸运的战士，
因为你点数过群星的灿烂，
群星必会珍惜你的心愿；
因为你企盼过黎明的曙光，
黎明必会照亮你守望的那片热土。

还有什么，
比这样的守望，
更让一个战士幸福？

2012年11月27日上午
为北京守望教会祈祷所得





2012年圣诞节期间，北京守望教会各牧养小组、团契、芥菜种主日学等分别以不同形式举行了以传福音为主的圣诞活动。图为部分牧养小组平安夜室内赞美、布道活动的照片。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什麼？”我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耶 1 : 11—12



耶穌對他說：“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太 22 : 37—40

